

---

# 说 八 股

---

启 功 张中行 金克木 著

---

中 华 书 局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说八股 / 启功等著. -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ISBN 7-101-02263-4

I. 说… II. 启… III. 八股文-研究 IV. H1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5910 号

- 书 名 说八股  
作 者 启 功 张中行 金克木  
责任编辑 王 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刷厂  
版 次 2000 年 6 月新 1 版  
200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5½ 字数 /100 千字  
印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2263-4 /I·329  
定 价 10.00 元

# 目 录

说八股 .....	启 功 (1)
引言 .....	(1)
八股文的各种异称 .....	(4)
八股文形式的解剖 .....	(7)
八股文的基本技巧和苛刻的条件 .....	(17)
选和批 .....	(34)
八股文体的源流 .....	(36)
八股文的韵律 .....	(40)
最著名的游戏八股文 .....	(46)
余论 .....	(48)
试帖诗 .....	(53)
《说八股》补微 .....	张中行 (59)
八股新论 .....	金克木 (74)
引子 .....	(74)
八股评罪 .....	(78)
八股文“体” .....	(96)
八股文“心” .....	(122)
《四书》显“晦” .....	(144)
编辑后记 .....	(166)

# 说 八 股

启 功

## 引 言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陈词滥调”或说“死套子”、“滥调子”的代称，使人厌弃、遭人反对的一切坏事物的“谗谥”、“恶谥”。我曾遇到过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用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了。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个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的谗谥，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

譬如有人用苛刻的不能忍受的条件挟制别人，俗称给人“穿小鞋”。做服装的单位、卖鞋的铺子，都有功而无过，鞋的本身也无善恶的分别。即使是小尺寸的鞋，小孩需用，何坏之有！用挟制人的手段去虐待别人，好比给大脚的人

## 2 说 八 股

---

穿小鞋,使他不能走路,那属于挟制者的罪恶,与鞋无关。八股之成为谑谑、恶谑,虽不像“尺寸小的鞋”那样本身毫无责任,但形式太死板,苛刻条件太多,那究竟是限定型、设条件者的责任,实与文体基本形式或说各个零件无关。近代有人嘲笑作律诗好比带着脚镣跳舞,但跳芭蕾舞人穿的硬尖鞋,也不比脚镣舒服多少!况且古今作律诗的人有多少,作品有多少,它们是否从来未曾有过文学艺术的作用?是否只是一堆用过了的废脚镣?恐怕也不见得。外国有“十四行诗”,为什么必须十四行,为什么十三、十五就不可以,恐怕也禁不得追问。

八股的基本形式很简单。开头“破题”,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次是“承题”,即简单地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三是“起讲”,是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题目的用意所在,或说是内容大意。以下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反复罗列优点缺点,利处弊端。最后收场结束语。无论一百分钟的“两节课”、三小时的“大报告”、小组会的即席发言,乃至酒席之间评论一项菜肴的烹调做法,或运动场上解说员对某项比赛的实况解说,假如有人给它录下一段一段全部的原词,然后分出局部,各立一个名目,恐怕并不少于“破承起讲,提比后比”之类。因为文体来自语言次序,某种常见的次序又多是实践中选择出来的。选择的标准又常是由效果好而定的。用久用多了,成了传统,成了套子,沿用的人也忘了它的所以然。假如我上两节课,讲一篇文

章或一项问题。每段之后,有人在旁边高唱“破题”、“承题”、“第一股”、“第二股”,不但要全场哄堂而笑,我自己也会苦笑着“心悦诚服”。这只能说形式的自然形成,谁也不会认为每人每次的“两节课”、“三小时”所讲内容必然都是“毒草”吧?

再做个具体例子: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都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卢沟加了新桥,蓟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有人曾提出:为什么股必须“八”?回答是:是这种文章形式中常见用八条论点来讲明问题,或说用八条的比较多。至于必须八条,那属于发命令挟制人时所规定的苛刻要求之一,在早期考场中也不完全这样。相题作文,题中两项论点,即作两大扇;题中三项论点的,即作三大扇,也被允许,并非从来未见的。只是愈往后来,要求愈苛,应考作文的人谁也不敢冒险去作罢了。更有只有六股的,童生(青少年初次应考的)的考卷,作不出八条的只作六股也可以。还有些偏僻小县,文化教育很差的地方,根本找不出什么能作文章的人。但全国各县都有“学额”,需要凑够数目。因此能作破、承几句,即算及格。一次遇到一个考生在承题之后写了“且夫”二字,考官就批道“大有作起讲之意”,把这人列在第

一名。这便是一股都没有,不是也算及格了吗?

又有人提出:为什么八为标准?这我也答不出,但知八数在民族习惯中非常习见。为何习见,我也说不清。且看《易》有八卦,肴有八珍,淮南八公,蓬莱八仙,汉末清流有八顾,周代贤人有八士,舞有八佾,塔有八角,荀子说螃蟹六跪二螯,总算破了八数,但校勘家根据生物实际现象,还是把它校改成为八跪了。最坏的,骂人的话有“胡说八道”一词,八道怎讲,究竟道之为八,又何坏之有?用这词的人也说不明白吧?

## 八股文的各种异称

### 一、八股文

这种文体中首先是“破题”、“承题”、“起讲”三个小部分,这三小部分合起来也被统称为“冒子”,只是为说明题意。重要的在后部,逐条逐项去发挥,把那个主题从上下、前后、正反、左右,讲得面面俱到,常常要说好多条,但常用八条。由于每条怕单说不够,常变换地、相对地配上一条陪衬,用以辅助加强前边那个论点,使它不致孤立。既配上了一条,便成了一副对联,一篇中便有四联。两条相对,好比人有两股(腿),一篇最多不过八条,所以称为八股。八条的

限制,也不是这种文体最初所有的。

## 二、八 比

每两股既然必要相衬对比,所以每两股叫做“一比”,那么每篇中实际只容下四比。大约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名实不符了!

## 三、制艺、经义、制义

科举考试是皇帝命令去考试“士子”的事,皇帝的命令称为“制”,皇帝命作的文艺便叫做“制艺”。考试的内容是要士子讲明所学的某种经书中的某项道理。讲解经书中道理的文章叫做“义”,今天的教科书、教材还叫“讲义”,以经书中某项道理为题目去考试士子,这种试卷文章叫做“经义”。古代作经义还没有“八股”体裁,明清科场也有考《五经》题目的“经义”,文体并不全用八股,这属于狭义的“经义”。《四书》既被列为经书,在《四书》中出题作八股文,也曾被广义地称为“经义”。广义的“经义”,既是皇帝命作的,也曾被称为“制义”,与“制艺”一称有时混用。举人、贡士、进士的“举、贡、进”,都是向皇帝举荐、贡奉、进呈的意思,所以科举又称制举,科举的文章又称制举文章。古代考取人材,分科分类去选拔,所以称为科举、科考等。明清以来,试多科少,混称科举,已名不副实,讲解经义更流为滥套了。



#### 四、时文、时艺

八股文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是后起的文体。很像律体诗在唐代是新兴的诗体,所以唐代称律诗为“近体诗”,以别于以前的“古体诗”。八股文相对“古文”称为“时文”也是同样道理。八股既称“制艺”,牵连也称“时艺”。

#### 五、《四书》文

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种类很多,殿试用“对策”;特别考试如康熙、乾隆时曾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则考“律赋”和“排律诗”。还有皇帝对翰林院范围的文官随时进行“大考”,题目、文体也常由皇帝临时指定。清末废除八股后改用其他文体,这里都不去说它。清代绝大部分的时间、绝大范围的考试中,最主要的考试内容是《四书》,所用的文体是八股。所以从起码的童生进学考试到最高的殿试之前,即县、府、院试,乡试,会试三大级的考试主要部分都离不开《四书》题的八股文,所以八股文又称为《四书》文。按讲《四书》的文章并不是都是八股文,而用八股文形式作的文章也不全是《四书》的题目内容。但是习惯已久,“心照不宣”,《四书》题目,八股体裁,已经牢不可分了。清代乾隆时皇帝命方苞选明清人所作《四书》题目的八股文共四十一卷,名为《钦定四书文》,照样有总批有夹批。从此《四书》题的八股文称为

“《四书》文”更加“名正言顺”了。

## 八股文形式的解剖

### 一、题 目

八股文既以《四书》题为主要内容，以下俱以《四书》题为例。

少数字的题，又称“小题”，多句或全章的题称为“大题”。有一字至一句的，如“战”（《论语》）、“妻”（《孟子》）、“是也”（《论语》）、“匍匐”（《孟子》）、“少师阳”（《论语》）、“去其金”（《孟子》）、“节彼南山”（《大学》引《诗经》）、“子路不说（悦）”（《论语》），至于五字或再多的，不再举例。有一句的，如前举“节彼南山”、“子路不说”都是整句，如“战”、“妻”等就是句中摘出的一字了。

还有两句三句以至全章的，全章中有的可分几节，例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是一章中分三节。出题为了简单，只写“学而时习一节”，或“学而时习二节”（即至“乐乎”，或写“学而至乐乎”）。若写“子曰学而全章”，则是自“子曰”至“君子乎”了。

“战”是摘“子之所慎齐战疾”句中的一字，“匍匐”是截

去“匍匐往”的“往”字，还有整句中截去半句的，固然都等于儿戏；即使那些一章中取一节或两节的，也已不是孔子孟子诸人当时的完整意思了。

还有更荒唐的是截搭题，即截取句子的头尾，或前一句的尾搭上后一句的头，或截前一章的尾搭后一章的头，更有隔篇截搭的。举例来看：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有人止取“王速出令反”五字，于是考生都作成王快出命令使人造反，成了笑柄。这是上下句的截搭。“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是《论语》中《季氏》篇的末句，“阳货欲见孔子”是《阳货》篇的首句。有人截成“君夫人阳货欲”，就更不像话了。

大家习知截搭题为儿戏，却不想即出单句，原意也不完整。但这类出截搭题法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整段整章的题，前代人几乎都作过了，考生念过，遇到同题，可以抄用。考官很难记得那么多，辨别那么快。于是出这种缺头短尾、东拉西扯的题，可以杜绝考生抄袭的弊病。这也是清代后期这种现象才渐渐多了的缘故。不难想象，如果在雍乾时代，法令严苛，像那出“王速出令反”之类儿戏题的人，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 二、破 题

顾名思义，“破”即是解开、分析的意思，翻译密码叫做

“破译”，猜谜语叫做“破谜”。文章开篇先把题义点明，叫做“破题”。从唐代人作律赋、宋代人作经义，直到明清人作八股文，开始点明题义的那几句话，都被称为破题，只是唐宋人作法没有明清人在八股文中那样死板罢了。

怎说死板？八股文的破题，规定只用两句。也有三句的，多半是有一个长句中有略顿处，像是三句的。这两句主要是概括题义、解释题义，但又不能直说题义。直说的等于重复说一下，叫做“骂题”。作得好的，常是既透彻又概括。很长很复杂的题目，要用简单的两句把它点明；短到一两个字的题目，也要用比题字多几倍字数的两句话把它说透。

在科举考场中，考卷数多，阅卷人少。题目一律，文体一律。阅卷的时限又短促，每日要看若干本。阅卷人的精神情绪，不问可知。所以有人阅卷，一看破题已可预见到全文的水准。很简单，一本卷子，头两句即不通顺，下文怎能忽然变好？况且即使后边较好，而开头不通，一座没顶的房屋，也难算合格。因此阅卷者的注意力很自然地多投在破题部分。作者对破题部分也多费煞苦心，极力把它作好。还有仓卒之间测验一个人才智，出一题令被测验的人去“破”，破得好，便过了这一关。可以算是最短最快的考试，前人记录的也非常多。

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的作法，和作谜语极其相似。有谜面，有谜底。破题两句即是谜面，所破的题目各字即是谜底。进一步讲，整篇的八股文几百字就是谜面，题目那些字即是谜底。因为少数的几个字或几句的孔孟的话，翻来复

去地硬敷演成篇,不过是用变着花样的字面(字、词)、挖空心思的论点,上下左右正反前后地开辟通道或堵塞漏洞。从其中看出被考的人对《四书》和朱熹的注解念得熟不熟,钻得透不透,想得全不全。出题人拿出一字半句,类似零头碎块,作者也能把它说全,说圆,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的士子“说谎”和“圆谎”的技能才算及格,才是可靠的官员材料。什么是“圆谎”,比如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尧学天,谁知道,谁看到。如遇此题,也要写得逼真活现,岂非圆谎!下面举些破题的例子:

“子曰”二字题,破说:“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这是不露出谜底的任何一字而把“子”(孔子,至圣先师)、“曰”(孔子所说,至理名言)二字说得不但非常透彻,而且绝对不能移到别人身上,这是最标准的破题。又因为不露谜底题字,可以叫做“暗破”(各种巧立名目的破法不必详举了)。

“大学之道、天命之谓性、学而时习之、孟子见梁惠王”,这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每部书的第一句,合起作题目。这四句毫无关连,破说:“道本乎天(切题中前二句),家修而庭献也(切后二句,在家里学习,在朝廷贡献)。”又如“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论语》记了八人,题目截去末一人季骈)题,有人作了破题的上句说:“纪周士而得其七”,缺一个下句。有人续出来说:“皆兄也。”毫无联系的七个人名,还故意缺少一个,用三字凑成了两句“废话”。少数字也破两句,多数字也破两句,

有情理的破两句,没情理的也破两句。以上都是郑重的场合中所作的冠冕堂皇的废话。

还有公然作游戏的破题:“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孟子》),破曰:“王请度之。”这也是《孟子》的一句,本意是请王自己忖度,这里当作“王请”、“度之”讲,度又是徒步行走的意思。“君命召”即是王者邀请,“不俟驾而行”即是不等得车来就徒步走了。这是特意作少数字的破。又有人看到一个秃头人走过,指向另一人说:你能以这秃头为题,作一个字的破题吗?回答说:“髡。”《论语》“虎豹之髡”朱熹注解髡字说:“皮去毛者也。”

也有故意作长破的,如题“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论语》),破说:“圣人憎御人之人,恶其以善为恶、以恶为善、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以贤为不肖、以不肖为贤者也。”三十七字,实只两句;“之人”为一句,“者也”为第二句。其中顿号处,都是小停顿,不能算句。又有出“三十而立”题的,破云:“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

以上都是公开取笑的事,如真在考场中作,必然要被罚的。但郑重的考卷中所作破题,它的原则和技巧,与这类游戏是并无两样的。

还有误解题义,作成不合理的破题的。一考官出“非帷裳必杀之”题,这是《论语》的一句话。帷裳是朝、祭用的礼服,尺度可宽。如非帷裳,宽了必须削剪。“杀”即削剪之义。一人作破题云:“服有违乎王制者,王法所必诛也。”把杀字解为杀人的杀。虽然错了,但考官因为他维护王制、王

法,就许可算他及格。

又一考官出“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这句出于《孟子》,是说开始征收商旅税的人,为统治者聚敛钱财,是个贱丈夫。考者误解为征讨殷商的周武王,作破题说:“以臣伐君,武王非圣人也。”考官因为他侵犯了周武王这位统治者的偶像,就把他判入劣等。

更有对题目字面乱作解释的,如题为“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作破题的人说:“记圣人之鸟处,甲出头而夭侧头也。”把燕破鸟,把居破处,申破甲出头,夭破天侧头,可算荒谬而离奇的了。又有一位学政考一省的生员,出“鳖生焉”题。这是把《中庸》“鼃鼃蛟龙鱼鳖生焉”句,截去前五字,已不成话。生员作破题说:“以鳖考生,则生不测矣。”字多双关,令人失笑。以鳖考生,可以讲作用鳖的问题来考生员,也可讲作派鳖来考生员。则生不测,可讲作生员莫测高深,也可讲作则发生不测事件了。结果学政被革了职。

### 三、承题、起讲

在破题后,用三句承接破题所说出的意思,这部分叫做“承题”,它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三句为标准。

承题以下,引申、讲明题义,或并说明题目内容的背景等等,这部分叫做“起讲”,又称“小讲”,最多不得超过十句。

所谓的句,比较灵活,有时一句中的许多顿处,可以不被算做一句。如上文谈破题中那个“御人以口给,屢憎于

人”题的长破，有许多小顿处都不认它为句。为了说明一篇中各部分的关系紧密，下边联贯举一篇为例，分出各部分来谈：

### 狗 吠

（出《孟子》“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是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见《公孙丑·上》。）

清 蒋棻之

物又有以类应者，可以观齐俗矣。

（以上是破题。狗吠上有鸡鸣一词，所以说出“又有”。孟子当时是说齐国富庶，不是凭空为说狗吠，用“观齐俗”可以笼罩全题。）

夫狗，亦民间之常畜也，乃即其吠而推之，其景象果何如耶？

（以上是承题。大意是狗本是民间常畜，其吠有何可说？孟子所以提出狗吠，是为说明齐国富庶，而富庶的景象究竟何如呢？这样写，既承上讲明为何提出狗吠，又引起下文的地步。因为只抱狗吠二字而说，必然只表现狗吠的声音；这里扩展到狗吠的背景范围，就不愁没有可说的了。）

若曰：

辨物情者，所以观国俗；睹物产者，所以验民风。

吾尝入齐之疆，而窃叹其聚俗之盛也。

（以上是起讲。从齐国之内，民风国俗说起，民生富



庶,当然养的狗就多了。这样写,先铺开齐国的环境,狗所生存的背景就不致落空。起讲即可开始“入口气”。“若曰”即是说孟子当时即是这样说起的。从此以下,全要体现孟子的口气,也就是所有议论,都是孟子说的。八股文这种特殊的讲解经书义理的文体,要“代圣贤立言”,文中所论,都必须是替圣贤说话。从破承到起讲,总起来是一大部分,也被统称为“冒子”。)

岂但征之鸡鸣已哉!

(这种单句或小段都是文中的引子、楔子或黏合剂。用在前边的叫“领题”、“出题”,用在中间的叫“过接”,用在后边的叫“收结”,还有下文的或暗藏下文的叫“落下”等等。这里“岂但”一句即是第一比以前的“领题”。明代曾把这部分的话称为“原题”。八股的苛刻要求之一,是不许“犯上”或“犯下”。例如孟子原话是“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题目只出“狗吠”,如果文中讲了鸡鸣如何,就算“犯上”;如讲了达乎四境如何,就算“犯下”。这里写岂但鸡鸣就完了吗?下句潜台词是还有狗吠呢!又可引出狗吠。如说它犯上,但它却是否认鸡鸣的。)

#### 四、八股、四比

以下接用《狗吠》一文的中间部分为例:

自功利之习既成,而人争夸诈。故斗鸡之外,尤多走狗之雄。

(以上第一股,从狗吠问题上想起走狗,走狗问题上又配上作陪衬的斗鸡。这里只提出狗,并不沾吠。)自山海之资既启,而户饶盖藏。则吠夜之声,不减司晨之唱。

(以上是第二股,与第一股合为对联。从人民收入富裕说到养狗的渐多,狗吠之声,不减鸡鸣。仍没正面露出狗吠,又仍在暗中用鸡鸣陪衬。)

分沥粒之余甘,而驯扰优游,不过与彘豚并畜。乃暮桥相传,而人为之守望者,狗亦共之徼巡。盖风雨晦明之间,嗶嗶者终宵而未静矣。

(这是第三股,也是第二比的上联。进入了全篇要正面发挥的重要部分。沥粒余甘指洗米的剩余,与彘豚并畜是说养狗和养猪一样简单。人在晚间或守望或巡夜,狗亦随着出力。嗶嗶是狗叫之声,因此常常整夜可以听到。这里既说出狗的用处,也说出狗的叫声。)

抚胎伏之无伤,而尘囂角逐,亦只与牛犊同群。乃夜扉既闩,而人乐其安居,狗尚严其戒备。盖草露寒凜之际,狺狺者达旦而未休矣。

(这是第四股,是第二比的下联。说狗的繁殖增多,可与牛犊同群奔逐。每到人家入夜关门之后,人已安居,狗还在戒备。露水满地的草丛中,发出狗叫声音,到晓不停。狺狺也是狗叫声。这两大股,从狗的生活、繁殖、功用,归到吠声。嗶嗶、狺狺更是形容狗叫的常用专词。)

瞻之以影，听之以声，非其见闻习熟而狰狞欲啖者，一若有异言异服之讥。

（这是第五股。狗从人的影、人的声，辨别是否熟习的人。如是生疏的人，便凶猛地去咬。这时它的作用很像古代国境上遇有特殊语言、特殊服装的人要加以稽查一样。讥在这里是审查之义。前边两股已正面说出狗的功能，和吠声的广泛。似乎已无可多说的了。这里又提出狗能识别熟人生人，对生人进行拦阻、又吠又咬的情形。）

深巷之中，蓬门之下，苟其一唱噪然而嘈杂齐喧者，并若有同声同气之助。

（这是第六股。前边说了狗在较远范围能加守护。这里说一个小户人家的门前，一狗一叫，众狗齐叫，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态度。）

由是国风十五，而卢令志美，独夸东海之强。

（这是第七股。从今天的狗追溯到古代的狗。《诗经》十五国风的“齐风”里说到“卢令令”，卢是田犬，令令是犬带的铃铛声音。齐国在东海之滨，卢令载在齐风，可以说为东海地方增强了声誉。）

甚而食客三千，而狗盗争雄，尝脱西秦之险。

（这是第八股。说齐国的孟尝君有三千门客，曾用鸡鸣狗盗的手段，逃出了秦国。前三比把狗的能力、功劳、讥查、咬人、吠影、吠声，乃至嗷嗷、狺狺的声音特色都写得既详且尽，到了最末，好像已无可再说了。作者忽然抬出狗的光荣历史，辉煌地载于《诗经》、

《战国策》，有根有据，可以说是毫无遗憾了。只是还有一个小漏洞，是作者忽略了的，下一章里再作详说。）

苟使民居寥落，安能群吠之相呼；倘非万室云连，岂必村厖之四应也哉！

（这是用对句作结束，说明“相闻而达乎四境”的原因。即是说，如果齐国国内居民寥落，即有狗吠也不能连成一片。正因为齐国富庶，万家相连，才有吠声相应的盛况。这是中间暗藏着“达乎四境”的下文。这种收结，称为“落下”。明代在篇末有一段可以自己发挥见解的话，叫作“大结”，清代取消了。）（此篇引自《目耕斋偶存》）

## 八股文的基本技巧 和苛刻的条件

在前边各项叙述中，已经可以见到八股文中一些个苛刻的要求，现在在介绍作八股文的基本技法中，也会随处遇到。这真如佛书所谓“如油入面”，无法专项去提炼了。说到基本技法，也即是初学入门者的基本练习，不是八股专家所评论的什么风格、什么义法，“大家”如何、“名家”如何的问题。专家的评论，常常比较玄虚、抽象，有时有些具体的

指点,又常是文章中间的夹批。问题在于有些是作者自己已刊刻的作品,印出来表示向人求教,其实这些无异于请人注意的自我宣传。另有些是中试之后把考中的文章刻印出来向人夸耀,这种作品多半经过修改或另作,原篇中的毛病已然不存。又次是书坊把中试的作品搜集刊印以供其他应试人作样本去学习。像《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等人所选所批的,即是这种坊刻本。以上这些刊刻本中的批语当然都是说好不说不坏,所选的作品也必是优秀的至少是合格的。因此,如果想找修改错误、批点瑕疵的样品,是极难得到的。所以在废除八股文后已达一百多年的今天,要想真正谈出这种文体作法中的甘苦和窍门,其难也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只能据我个人耳食所得的一鳞半爪加以介绍而已。

### 一、换 字

宋代传说有人应考,题目是“圓坛八陸賦”。应考人文思枯竭,只写道:“圓坛八陸,八陸圓坛。既圓坛而八陸,又八陸以圓坛。……”如此写了些句交卷,考官在后嘲笑性地批曰:“可惜文中尚不见题。”故事见于宋人笔记,大约并非捏造。因为这类笑柄直到清代嘉庆中还有具体的例子。有一个八十余岁的老童生应考,题为“周公谓鲁公曰”(出《论语》)。老童生写道:“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考官照顾他年老,算他及格入学。可见“死于句下”,对题面各字之外束手无策,是初学作文者的第一难关。

于是善于诱导的塾师多半从换字教起。

我见到一本村塾启蒙的书，名曰《八股启蒙》，作者署名谭鹏霄，作了些各式的小题，词句也都浅显易懂，纯粹是向童蒙示范的作品。可贵的是书的前面附了一部分《字眼使用》。大致介绍如下：

破各圣贤称名  
破虚字(此条漏刊标题)  
从师教学考古好问类  
诗书易象礼春秋类  
礼乐制作类  
致知力行言语事功类……

(以下还有十九类，内容包括伦理、天地、器物、草木、鸟兽、战争、政事、名人等等，大都几项事物合成一条标题，亦无精确分合的原则，大约随手拈出，只是向童蒙示范而已。)

看他所谓的破，只是代字。例如他首先说：“破题有一定破法，如孔子则破‘圣人’，或单破‘圣’字，如‘圣心’、‘圣训’之类是也。与群圣比论处，则破‘至圣’，所以别于群圣也。颜子、曾子、闵子、子思、孟子则破‘大贤’，其余子贡、子张、子夏、子游诸贤，凡注称孔子弟子者俱破‘贤者’或‘贤人’……惟子路或破‘勇者’，子贡或破‘达士’，须相题而用之。……”

又如：

“姑言”，意未尽而姑且言之，宜用于次句。“慨

世”，慨叹世事单用“慨”字。“转核”，核，考核也。核字略实。“首”，凡书中第一事用之，如“首举”、“首论”、“首推”之类是也。

又如：

“天”破苍、苍昊、天心、维皇、於穆、帝载……“日”寅宾、寅饗、出日、纳日……“日月”升恒、薄蚀、出暘谷、入虞渊、积阳之精、积阴之精、昭回云汉、昭临下土、晦明嬗代、居诸递更。

不必多举，已足看到它的浅陋可笑。但是这本书的可贵处即在展示出从前教童蒙入手学作文，特别是学作八股文最初入门的真实情况。譬如在舞台后面参观初学武功和舞功的男女幼童，那些弯腰抬腿的功夫，相当残酷。恐怕一般看戏观舞的人，是不易见到的。我想宋代那位作《圆坛八陛赋》的人，如果曾遇谭鹏霄这样的塾师，学过一些换字方法，也不致只翻复四字留为笑柄了。又这本书的作者虽然首先说“破题有一定破法”，好像这部分《字眼使用》只是专为作破题的，其实不然。只要看《狗吠》那篇例子，不难了然，贯串全篇处处都在用替换字面的手法，尤其在两股相对偶的部分，更不容雷同重复，于是愈可见出换字的重要作用。从这本《字眼使用》里又可看出少数字换成较多数字的例子，当然反过来题中有较多字数的典故、成语处，也可用少数字的词来替换的。这书里讲虚字的部分，连某个虚字宜用在上句下句、第一句第二句都加以注明。这并不是过分轻视童蒙，实是指示在文中“口气”的问题，这真是教作八

股的人门秘诀。

## 二、对 偶

汉语中为什么有对偶,对偶是怎么兴起的,它的利弊何在,应不应该废除,都不是我个人此刻所能解答的,也不是这篇文中所负的责任。现在谈八股文,八股文中有对偶,是历史的事实,对偶也是八股文技巧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下只谈怎么对和怎么样学作对的问题。

八股文从“破、承、起讲”以后,进入文章的主要部分后,即要分股,每两股成为一副对联。单看一股(上联或下联),句子和散文一样,并不都成骈文、律赋那样“骈四俪六”的句式。但再看另一股,就必定与和它平行的那一股字句长短、虚字实字、人名地名等等都完全相当。这在前举《狗吠》那篇例子中已经看到。以下要谈谈初学作文的童蒙,怎样作入门的练习。

大家都知道对联是实字对实字,虚字对虚字。例如天对地,人对物,是对非,去对来等等,很容易明白,只是它们还有一个附加条件,那是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前文谈过,有时有人突然向学生或别人出个题,令作“破题”,仓卒之间,有人便能作出很巧妙的破题,可算是最快的考试,最短的考卷。对对联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塾师出词句令学生作相对的联语,自然是功课的组成部分。有时家长亲友也常向子弟出对令对,朋友谈笑中也常出难对的词句找人去



对。这比只作破题的短小考试更短更小了,可算是微型的考试。

一个词、一句诗找出可对的字句,究竟还比较简单,若是长篇大套的句子,句句都对上对联,就不太容易了。无韵的骈文,或有韵的赋,看起来句句对偶,初学人自然望而生畏。其实八股文对偶的一比一比中,散语较多,运用比较随便,写完了一股,还须比照着前股的尺寸,给它去配出下一股,岂不是自己找麻烦?有时两边凑合长短,真要费许多力量。当然也有些一股中有骈句,和下股的骈句字数不太相同的(参看后边尤侗的文中第五六两股)。当时的塾师们创造了一种歌诀一类作对联的启蒙书,下边介绍一些例子:

康熙时有一位车万育做了一本书,叫做《声律启蒙》,按照《佩文诗韵》分韵部,上平声十五韵、下平声十五韵,每韵作歌诀三段。如把那一段当作一首长短句的诗来看,便是每韵三首,三十韵共九十首。这种书也有的刻本书名中有“撮要”二字,可见初稿可能段数要多,大概在传习中,这种简本也够用的,所以还没见到过不“撮要”的本子。试看:

#### 一东(上平)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三尺剑,六钧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宫。  
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园春雨杏花红。  
两鬓风霜,途次早行之客;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翁。

#### 十五咸(下平)

冠对带,帽对衫,议颡对言谗。行舟对御马,俗弊对

民严。鼠且硕，兔多兔，史册对书箴。塞城闻奏角，  
江浦认归帆。河水一源形泐泐，泰山万仞势岩岩。  
郑为武公，赋缁衣而美德；周因苍伯，歌贝锦以伤谗。

这种歌诀，念起来非常顺口，易背诵，易记忆。童蒙读起来可以懂得字、词、句怎样相对，又可从长短句的配搭受到声调和谐的启发。不但有三字、五字、七字句，也有四字、六字句。念熟了，背惯了，就无形中打下了作诗作赋的基础。再结合换字方法，运用这里的任何句式都可以翻出不同的对联。韵脚都是平声，作为歌诀比较好念，而其中每个“上句”又都是仄脚，倒过来就是仄韵的句子，把仄脚的句子用在“下联”，便是仄韵的对联或仄韵的诗文的句子。

从唐朝的考试就有作诗一项。唐朝用“试律诗”，是五言六韵（每句五字，每两句为一韵，共十二句）。清代用五言八韵诗，叫作“试帖诗”（每首共十六句，本文最后附带介绍）。《声律启蒙》这类歌诀既对于学作诗、赋、骈文有用，即对于学作八股中的对偶句子也有用。在今天既不再有人作狭义的八股文，但还有人作旧体（或说古典体）诗词，熟读它们，也会受到有益的启发。有人研究古典诗词时，在解剖那些作品的技巧问题上，也不见得没有帮助的。

类似《声律启蒙》的书，著名的还有康熙时李渔的《笠翁韵对》等，不再详举。还有一种叫作《时古对类》的书，失作者名。从二言类起到十七言类止，全是对联。例如：“太乙、长庚”，“雨线、风梭”等等。中间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的对联都是不可分开的整句。至于八言常是两个四言拼成，九

言常是四五言或五四言拼成的。其余如十言常是四六言的,十一言常是四七言的,不必多举。最后十七言,有五五七的句子,还有长短句的如:“二老海滨居,一在南,一在北,不期同归西伯;八元应运出,或为兄,或为弟,何意均成帝师。”则纯粹是八股中的一比了。

### 三、相 题

这里的“相”字是“了解”、“端详”的意思,也就是“相面”、“相术”的相。有了题,必须先仔细揣摩题的出处,即是作为题目的这个词、这句话,乃至这些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在什么环境中说的,有没有不同的解释等等方面都考虑到了,然后再揣摩这个人、这些话的语气神情。例如有人作“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题,第一股立论写从旁人看出“不如”的道理,第二股是写从自己看出“不如”的道理(原文从略)。又如“学而时习之一章”题,一般看来,是平列的三条道理,有人偏要把它们分出次序,以为“学而时习”的“悦”是根本,以下的“乐”和“不愠”,不能与之相等。因为有些“游心物外”的人也会乐,“放达自恣”的人也会不愠,究竟全不如学习的“优游涵泳不期然而然”所得的悦(原文从略)。这真是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甚至可说是牵强附会的“胡说”,但在八股这种“没话找话”的文体中又不得不占满篇幅。早期的八股文本无字数的严格限制,有人作二三百字的短文,有人作一千余字的长文。到了清代后期,严

格限制到七百字,超出了就算不及格。因此有的说也须写那些字,没的说也须写那些字,又不是仅仅换字所能敷衍的了。

这种钻空子的相题办法,愈钻愈奇,有时也能言之成理。例如有人出“伯夷隘”题(见《论语》),一考生卷有一股云:“隘又莫隘于绝兄弟之伦,中子既已承桃,何以不还奏埙篪之雅。弱弟早偕出遁,何以不同甘薇蕨以终。则父命天伦,亦两无据。”考官感觉其说可怪,问他这说法的根据。回答是:春秋时人皆称伯夷叔齐偕隐首阳,至战国时,乃只伯夷孤行,而叔齐中途而返了。再问出于何书,回答是:“想当然耳。”考官认为乱说,要加扑责。考生说:凡《论语》中皆夷齐对举,至《孟子》中则单言伯夷,无一连及叔齐的,请告诉我何原因。考官也无辞以答,就算他过了关。这种真是“读书得间”,找到了缝子。

前边举了学作换字法和学作对偶法的书,而这种揣摩经书题旨、钻研古人语意的书,也颇不少,著名的如《五经备旨》、《四书备旨》等等,专琢磨《四书》的还有《四书味根录》等等。它们的形式是在木版刻的每页书面上横分几层,无论什么书的正文(连注)占最下一层,甚至有些被压到板面的三分之一的,上边无论三层四层,每层各自排列着某方面的资料,从词句的解释、典故的原委、故事的背景、哪句话的精神、哪条道理的讲法、哪一章的综合宗旨、哪一节的部分论点等等,各自纳入某些个横栏中。因此这种书的板面必然是头重脚轻,头长身短,俗称叫做“高头讲章”。这种书的

用处是预先把书中的某字句以至某章节都设想周密,分析细腻。摆在那里,供作文章的人去吸取,甚至去抄袭。因为这类“高头讲章”中从词藻、典故到原话的意旨、所讲的道理等等都给预备好了。在今天看来比有些“赏析”还全面,只是缺少今天的“文艺理论”而已。

在当时有一种口号,包括了“作学问”的重要内容,就是“义理、词章、考据”。乾嘉时虽具有科学头脑、不信宋儒理学的“朴学大师”戴震这样的人,也居然举过这三大项,更不用说一般打着桐城古文旗号的八股先生了。这三大项仍是为应科举作文章而说的。所谓“义理”,即是琢磨出孔孟以至宋儒的思想论点;“词章”即是作文章的技巧,从词句、辞藻、章法、层次以至逻辑推理等等的锻炼;“考据”的作用即是对历史故事、典故出处不要弄错。清代学者江永作的《乡党图考》一书刚刚刻出,有人偶然先得到一读,在应考时遇到出《论语》中《乡党》篇的题,他便抄用了许多论点,考官也没有看过江永的书,就对这本考卷大加赞赏。这便可以证明“考据”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了。

当时的导师,从塾师至学政等等指导后学作科举文章的人,常提出平日要“积词”、“积理”的口号。平日多积累有用的词藻,作文时可以不致枯燥;平日多积累对某些“义理”的论点,以免作文时没有那么多用以“分析”的说法。所谓“义理”,不过是《五经》、《四书》中古代圣贤所说的道理,最古有伏羲画卦、文王演易、周公制礼等等的传说,较后除《论语》直接记述孔子所说的话,还有许多关于孔子的传说,什

么删诗书、作春秋等等。翻看《五经》、《四书》，古代人的语言简单，历代解释有许多异同，从元代至清代都以朱熹的注解为标准，到了末后，如果曲解了孔孟的论点（如钻了孟子未提叔齐事的空子），都能过关，而朱熹的解释权，却是丝毫不许动摇的。

#### 四、口 气

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所以题目的话是哪个圣贤说的，作文者从“起讲”起就要站在那个圣贤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替他把题目的那句话再加阐发、分析，说出几十几百句那个圣贤没说过的话。虽然那个圣贤没说过具体的那些话，而替他说话的人所说的又句句说得“逼真活现”，体会出符合（也就是“迎合”）那个圣贤意旨的话来，而所根据的解释，又必定要出于“朱注”的。

清代学者焦循曾把科举八股比作演戏，又有一个士子作不好八股，有一位老师给他一本《牡丹亭》剧本看，于是他作的八股水平大大的提高。因为戏剧台词，都要深刻表现剧中人物的性格，正和作八股“代圣贤立言”的道理一样。

代言、模拟口气的办法，最常用的是“若曰”（当然并不只用这二字）一词，像前举《狗吠》一篇的入口气处即用这二字，是代孟子说的。“若曰”二字见于《书经》，八股用来作交代关系，表明身份，说明以下是某人说的，但又是作者替他说的。古人怎么说的呢？“像是这么说的”。即此二字，就

包含这些层的作用,还具有退步余地。如果有人质问说古书中并没见那位古人说过这样的话,作者还可以搪塞说:古人是“像这么说的”呀。

用滥了时,也会用乱了。一个考官出“虎负嵎”(见《孟子》)的题,一考生在起讲后分三段来说,全是虎的口气。第一段开始说:“虎若曰,我所积畏者妇(指冯妇)也,今尔众,其奈我何!”第二段是:“虎若曰,我所甚惧者搏也,今徒逐,其奈我何!”第三段是:“虎若曰,我所失势者野也,今在嵎,其奈我何!”真是“匪夷所思”。考官要加惩罚,帮着阅卷的人说,这人一定怕老婆,所以说“我所积畏者妇也”,互相大笑,这生员也过了关。

## 五、磨勘

与“口气”问题相邻或相联的就是时代问题。比如说,代孔子说话时,用了秦汉唐宋人的典故或成语,就不算合格,理由是孔子怎么能说出或运用他死了以后的人的话呢?其实这不过是苛刻挑剔的一个环节而已,孔子所说的只有那几个字,凡是作文者加以“代言”的任何话,岂不都是孔子死后的话嘛!即使中试以后的文章,还有一关要过,即是“磨勘”。“磨勘官”(官名)逐一仔细检查,从字的笔画规范与否查起,哪句语法(当然不是按葛郎玛的标准)通不通,哪个典故错不错,皇帝名讳避没避,“丘、轲、烹”字避了没避,直到口气的合不合等等,都在检查之列。当然这些问题在

考官阅卷时已在留意范围之内,但谁也不能没有疏忽的时候,这种补充检查自然也是势所必有的了。也有考官学识不够,因此误加挑剔的。有作文者用了“佛时”(见《诗经》)一词,考官误以为“西土经文”,看见“佛”字即以为与佛教有关;又有人用“贞观”(见《易经》)一词,考官批说:“贞观是汉朝年号。”他不但不懂贞观一词,还把唐代说成汉代。这些笑柄既反映了八股文无理取闹的挑剔,又反映了考官的没知识,足以说明了科举“选拔人材”只不过一句空话而已。

前边《狗吠》一文末一股的按语中曾说到有一漏洞。不知蒋弼之这篇文章是自己练习作的“窗课”,还是考场中的试卷。如是试卷就有被磨勘的危险。原因是孟尝君入秦被留,用门客鸡鸣狗盗的手段得以逃出这件事与孟子说齐宣王的时间谁先谁后。孟子书中记齐宣王的事,史书记载都是齐湣王的事,于是孟子的说“鸡鸣狗吠”这事的确切时间已有问题,成了疑案。万一孟尝君的事在孟子的事后,那么“鸡鸣狗盗”的典故就不许用在孟子语气之中,这是漏洞之一;又“鸡鸣狗盗”都是真人假装的,这文里当作真狗的历史,便成了以假当真,这是漏洞之二,也会有被磨勘的危险啊!

又周镐作“我将去之”题(见《孟子》),起讲说到太王将去邠时,对其耆老的惜别的心情:“天下黯然销魂者,别而已矣。”“黯然”二字是南朝江淹的《别赋》中的句。这文大概是自己的习作,如果遇到磨勘,必定被挑剔出来(周镐此文见《棗山文稿》)。



## 六、钓、渡、挽

这类名词，是作八股文时某些特定手法的术语。这些手法，都是作“截搭题”中用的。例如前边举过的“王速出令，反”的截搭题，现在已不知当时人怎么作的文章，姑借此作例来说，文中应该包括两个重要层次，一层是王速出令，一层是反（返）什么。从破题记，就要概括这两层的五个字，直到分股阐发之前，也就是在“领题”的地方远远地暗示或提醒，“出令之后还有反呢”，这个伏笔好比钓鱼，所以叫做钓。渡是从上文引起下文，挽是从下文关照、回顾上文。由出令怎么就会引出反的论点呢，当然要有一些引起的话，就叫做“渡下”；说完了反，再说这是王令教作的，即是“挽上”。关于这种启下承上的部分，流传有名的有三个故事：

一是“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两句毫无关系，如何写在一篇文里，还要使它们互相联系（截搭题绝大多数是截取相连的字句，像这里还可以截“乎诗”，但不可以截“鸟文王”。前举用“学、庸、论、孟”每书的首句合起为题令人做破题的事，是一种临时测验借用的题目）。这个作者在作了“夫人不如鸟，则真可耻矣”，正在没法接上，反复朗诵这句时，隔壁有人听到后说“如耻之，莫若师文王”，他使用上了。这件事，记录者说是在承题部位黏合上下文义的，也即渡挽的手法。

二是“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题，作者写道：“一

叩而原壤痛，再叩而原壤仆，三叩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沉沉，一阵清风，化为阙党童子。”如果说作这种文的是向出这种题的人开玩笑，那也是出题人“咎由自取”。

三是“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写题时，即简化成“王如好色至有托其妻子于其友”）题，作者写道：“王的好色，与百姓同之，而不与王之臣同之者，王之臣自有其妻也（一作“自有其妻子故也”）。”以上是渡下。再后边写：“王之臣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不托于王者，以王的好色也。”以上是挽上。出儿戏题，作儿戏文，到这个地步，也就足以说明八股考试的没落、堕落。但反顾那些就算“一本正经”的题和文，“没话找话”和“东拉西扯”，与这类的本质上又有什么不同！

## 七、附谈纯粹的儿戏题

前谈儿戏题，还是偶一出现的，基本上还是《四书》上原有的文词，只不过是胡作截搭罢了。至于乾隆皇帝，屡次出题，文臣都知道出处，一次出了一个“灯右观书”的题，用来“大考翰（林）詹（事）”。彭元瑞算是最为博学的，也不知出处，就请示出处，皇帝大笑说：“今天可难倒彭元瑞了。”原来是昨晚皇帝在灯右看书，想起用这四字为题。如此难倒文臣，未免近于撒赖了。

彭元瑞作学政，考四个府属的学生，出“洋洋乎”、“洋洋乎”、“洋洋乎”，各注其出自某篇。主管人说还少一个题，彭

元瑞说“少则洋洋焉”(《孟子》)。这不是集中地作出题游戏吗？彭氏还有许多用若干题中若干个首一字拼成一句话，切合当时某一事的，更属无聊，他被那样“难倒”，也算毫不冤枉吧！

同时的鲍桂星(字觉生，号双五)也曾集中地出游戏题：把《四书》中的话任意割取少数字为题。如“顾鸿”(“顾鸿雁麋鹿”见《孟子》)、“驱虎”(“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见《孟子》)、“及其广大草”(“及其广大，草木生焉”见《中庸》)、“见牛”(“见牛未见羊也”见《孟子》)、“礼云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见《论语》)、“十尺汤”(“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见《孟子》)、“七十里子”(“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见《孟子》)、“谷与鱼”(“谷与鱼鳖”见《孟子》)、“下裘水”(“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见《中庸》)、“宝珠”(“宝珠玉者”见《孟子》)，这分明是无理取闹。有考生每题作诗一首，但不知是以诗代文写在卷上，还是另外作诗来进行嘲笑，大概还是属于后者。今举六首：

“顾鸿”诗云：

礼资全不在胸中，扭转头来只看鸿。一目如何能四顾，本来孟子说难通。

“及其广大草”诗云：

广大何容一物胶，满场文字乱蓬蒿。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鱼包变草包。(鲍字拆开是“鱼包”二字，“草包”讽鲍氏无知。)

“见牛”诗云：

屠刀放下可齐休，只是当年但见牛。莫谓庞然成大物，看他觳觫觉生愁。（“觉生愁”，可解为“觉得生愁”，实因鲍氏字觉生，双关讽刺鲍氏。）

“谷与鱼”诗云：

秋成到处谷盈堆，又见渔人撒网回。不是池中无别物，恐防现出本身来。（“本身”指鳖，亦即指鲍氏。）

“下袭水”诗云：

真成一片白茫茫，无土水于何处藏。侮圣人言何道理，要他跌落海中央。（按：不但这种割裂题是“侮圣人之言”，即那些郑重其事似的一词半句乃至单句半章的题，又何尝不是“侮圣人之言”呢！）

“宝珠”诗云：

拣起明珠玉任沉，依然一半是贪心。旁人不晓题何处，多向红楼梦里寻。

以上举出许多话柄和笑柄，并非仅只供读者一笑，而是为说明死套子中也有漏洞和八股文题目割裂的不合理。一词、半句、单句等割裂的小题固然不合理，即使不完全的半章或不相同的连章大题，又何尝合理？不用等到光绪三十一年，岂不早已该废了吗？奇怪的是，康熙曾经下令废除八股和禁止妇女缠足，却遭到大诗人王士禛（渔洋）的坚决请求，才“收回成命”，可又怎么讲呢？

## 选 和 批

我们都看过《儒林外史》，里边写了许多应举的士子们的故事，还写了马二先生和匡超人书铺选文、批文的事。这是科举生活和八股流行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选，当然是指选取可资学习的模范作品，它不但包括明清各大名家的八股名篇，最受读者欢迎的更在于当时考取中试的文章。古今一理，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一时的风气，科举考试所用的八股文更具时代性、时期性。某一科被取中的文章作风，尤其是正要应考者所必须注意掌握的。它们反映这时期考官阅文的标准，也就是即将应试者的投机对象。所以当时新被录取的中试文章，被称为“新科利器”。“新科”指的是最近这次考试，“利器”是指这类文章好比打仗的刀枪、开锁的钥匙，也即是正符合这时期考官胃口的特效药。

当时的“书坊”，包括今天的出版社、编辑部、印刷厂、售书店，只是缺少今天的固定编辑成员。书坊老板出版这种选本，自然成为畅销书，但须有高手来选、编、评、点，要求的条件是选得符合投机之用；编得有吸引力，名列鼎甲，做了高官的当然列前，有些名次虽然低而名头较大的也应编入；评和点是紧密相联的一件事，评的恰当明显，说出真正优点

所在,对参考者说哪里是最应注意处,这是读者所最需要的。出版还要快,当时没有版权法,谁先出谁赚钱,所以匡超人批的快,大受老板欢迎。评语写在纸上的叫做“批”,有对应文句夹在行间的叫做“夹批”,写在横栏上边的叫做“顶批”,写在篇后的叫做“总批”。辅助批语的标志是圈点,当然文中有句读,停顿处用逗(是扁点),整句处用圈。较好的句子,在逗处重一个扁点和句处重一个圆圈。再好的,在句中每个字旁加一扁点,再好的每个字旁加一圆圈(注意,每句中连用点或圈时,首一字不加点圈,以显示那是句首。如“夫天地者”,“夫”字旁绝不加圈点)。这种圈点更富于直观性,除了语言评论之外,还有圈点的标志,一目了然,哪是最好处,哪是次好处。专从技巧方面讲,它们比今天长篇的赏析文章,还较多地富有直观性。从前也有许多人用这种方法、方式去选评古文,评点小说,甚至有评点全部《史记》的,被称为“评点派”。

至于所用的评语也很灵活。比如文中议论虚实处,评论点出,即写一“虚”字或一“实”字。或评其主宾处,即写“此处是正面著论,是主”,“此处是反面作衬,是宾”,乃至更多更详,就可以类推了。后边的总评,不但要总体指出文中的好处何在,令人信服,还要词句典雅,显出评者的文笔水平。现在不再举例,因为这种评点因文而异,又因评者而异,并且必连原文才能说清,如果举例,太费篇幅,所以例子从略。

## 八股文体的源流

八股文的远源,一般地常追溯到北宋的王安石、苏辙诸家的“经义”,南宋陈傅良诸家的“舆论”内容也即是“经义”。还有从破题等技术方面,又追溯到“律赋”等文体。还有从明代篇后用“大结”,借发挥经义引到陈述、评论政治问题,又牵涉到“策问”等等。总之,可以追溯比附,却又都不全像,其实不难理解:皇帝需要层层官员,招来自己可用的“人材”,重要的不外乎两方面条件,一是思想合乎要求,一是能有政治头脑。招来的方法之一即是科举考试。思想的标准,要统一于孔孟之道,那就是看被招来的人能不能合标准地理解“经书”的思想,便用讲解经书的办法来测定,讲解形式即是“经义”。了解被招来的人有无政治头脑,便用“策问”的办法,考他们对于某些政治问题的见解和有什么处理办法。根据策问所作出的答案,即是一条条的“对策”、或成大篇的“策论”。应考作文章的人都必然具有许多古代文章技巧的素养,在作文或答卷时随手运用出来,就自然形成了多项功能、多种形式拼合而成的综合文体,逐渐定型于八股文,成了明清科举考试各种文体中的最主要的部分。

八股文在反映思想上,吸取了“经义”的原则,即主要的是讲解经书中孔孟的道理。文章自然都要有次序、有条理、

又有逻辑性,也就要有主题、有发挥。这就形成有破题、有起讲,到分条议论的分股。对偶、声调是古代文章的艺术手法,也是汉语文学技巧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也逐渐纳入八股的做法中。又要了解应考人的政治头脑,就在文章最后安排一个“大结”,以起政策答案的作用。

这种合成的过程很长,到了明代初年刚有雏形,到了弘治以后,才渐渐具备八股文的各项条件而成了定型。《明史·选举志》: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五经命题,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一般说,好像定了型就稳定了,但并不然。各个部分有先无后有的,也有先有后无的。各部分的字句也有由多转少的等等。例如破承起讲部分,句数随着各时期而变动;大结由痛快发挥经过逐渐缩短,以至完全取消。后人追论八股文的源流,往往抓不准。这条相合了,那条又不合了。譬如拿一家祖孙三代的照像来看,必然有共同点,也必然有相异点。要知按模型轧出来的瓷器,机器生产的用品,如果极仔细地检查,也必都有一些不同处,即使有极小的一点,也算不得完全相同,何况逐渐形成的一种文体呢?

总而言之,八股文体是由陆续沉淀积累而成的。当它刚刚沉淀形成,又被人嫌它的密度不够,又再加以挤压,加上更多的苛刻条件,并再削去大结,以钳制议论之口,接着减少破承起讲的句数,又再限制全篇的字数。初期童生习作的“六股”,到了很后时期,正式试卷中六股也被默许了。概括说来,自北宋到明中叶,是八股逐渐成形时期;自明中



叶至清末叶是挤压以至萎缩时期。光绪三十一年,这位姓八名股先生的肉体,正式寿终,但他祖先传给他的遗传基因,却并未由于他死而断绝,在他子女内外孙辈子女身上仍然潜伏着,从艺术形式和技巧上或隐或显地不时冒将出来。

讲八股文的专书,清代有阮元的《四书文话》(未刊行)、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又有1930年章中如的《清代科举制度考》、1958年商衍璠先生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附带谈八股部分。(本篇拙作除注出者外,事例资料都是根据以上各书。只为说明问题,不再详注卷页。)

阮元的书未见传本,内容不可知。梁章钜的书有刻本,内容多是品评优劣、举出利弊,没有全面基本法则的介绍。因为当时凡读书应举的人都必然学过八股,所以并不需要从头讲起。后两种讲科举制度,连带讲到八股文,并不占主要位置,因而也不求详细。此外像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中曾有意地记过八股文的源流,以后其他人的笔记书中也间或有谈到的。凡涉及八股文形成过程的,都追溯来源,但比起来看,又都有对不上、套不全的感觉,甚至成为疑案。八股文究竟从哪里掉下来的?所以这里不嫌辞费地作些说明。

以上是说八股的来源。任何文体流行久了,没有不生流弊的。明代中叶有些自命会作“古文”的人不屑以八股自居,而标榜能以古文笔法作八股。其实他们所谓的古文笔法,只不过是有一股中用古文句调去作罢了。但八股不可能没有相对的另一股,那么两股相对,必然又是一双长联。

清代中叶阮元有一段话说：

时文曰八股者，宋元经义四次骈俪而毕，故八也。今股甚长，对股仿此，偶之极矣。震川（归有光）辈矜以古文为时文，耻为骈偶。孰知日坐长骈大偶之中而不悟也。出股数十字，对股一字不多，一字不少，起承转合，不差一毫，试问古人文中有此礼否？

以上一段见扬州博物馆藏阮氏手写条幅墨迹，不见于《揅经室集》，但集中另有《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一篇，略谓：

明人号唐宋八家为古文，为其别于四书文也，为其别于骈偶文也。然四书文之体，皆以比偶成文，不比不行，是明人终日在偶中而不自觉也。且洪武、永乐时四书文甚短，两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弘治、正德以后气机始畅，篇幅始长，笔近八家，便于摹取。

按清代《钦定四书文》即自“（成）化、（弘）治”的作品选起，而明代茅坤以来重视“唐宋八家古文”，缘故也很清楚了。

再后，发生了滥调的弊病。有人讽刺性地作了一段空话的滥调说：

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溯往事以追维，曷勿考载记而诵诗书之典要。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思入时而用世，曷弗瞻黼坐而登廊庙之朝廷。

这两大股中，全是空洞而且重复的词句，但平仄抑扬，深合八股的腔调。当时被称为“墨派”（考场中的试卷，应考人在

卷子上用墨笔写,为了防止考官认出应考人的笔迹,所以专派人用朱笔抄出考卷上的文章,让考官去评阅。墨笔写的叫做“墨卷”,朱笔抄的叫做“朱卷”。考场外私自练习的作业,当然也属墨卷范畴。随便运用滥调,常被称为“俗调”,有人用“反话”称它为“脱俗调”,也就等于说“俗调”,又简称“墨派”)。滥调的形成,多数由于模仿或套用。例如有一塾师作“鲁卫之政兄弟也”题,说:“谓鲁之政即卫之政可也,谓卫之政即鲁之政可也。”其徒仿效来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题,说:“谓弥子之妻即子路之妻可也,谓子路之妻即弥子之妻可也。”见者无不大笑(见《坚瓠集》)。这时八股文体已正式破产了。

## 八股文的韵律

八股文既然是吸取古代若干项文体综合而成,它又用了骈体文中长联式的对偶,那么骈文的韵律手法,自然会附带引进。乾隆中曾一度明令不许用骈体,大概指的是四六形式的纯粹骈体,并未禁止在对偶中和谐声调。下面举乾隆时人周镐的一篇为例,同时也解释了篇中的大意,为层次技法的参考。

## 逸民伯夷叔齐

清 周镐

有逸于商周之际者，民之望也。

（以上破题）

夫夷齐之遇，不为民不可，同为民而又不忍也。民而称逸，此其所以为夷齐乎。

（以上承题）

且自古圣人并起，莫盛于商周易姓之交。生文武以为君也，生三仁又生十乱以为臣也，天生夷齐何为也哉？曰以为民也。夫君臣不易得，民则滔滔皆是，安用圣人？不知有易代无易民，苟任其互兴互废于其间，民彝之性先亡，君臣之统愈乱。圣人适遭其变，不敢自外于民，而又不忍自混于民，于是有逸之一法，所以立民极存民心也。故鲁论叙逸民而首举两人焉，曰伯夷叔齐。

（以上起讲。这篇起讲做的较长。“故鲁论”等十七字有人称它为“原题”，也可称为“领题”或“出题”，联在起讲之尾，又可成起讲的一部分。）

首阳之薇蕨<sup>仄平</sup>诚甘<sup>平仄</sup>，则北海高栖<sup>仄平</sup>，奚为引领<sup>平仄</sup>就岐山<sup>平仄</sup>之养<sup>平</sup>。知姬宗行善<sup>平仄</sup>，夷齐非有违心<sup>平仄</sup>也。载木主而东<sup>仄平</sup>征<sup>平</sup>，死父难欺<sup>仄平</sup>；三分服事<sup>平仄</sup>之孤忠<sup>平仄</sup>，入地应伤扣马<sup>仄平</sup>。

（以上第一股。说明夷齐并非原来就想隐居，也并不反对文王，只是认为武王伐纣的行为不太合理。）

<sup>仄</sup>鎬<sup>仄</sup>洛<sup>平</sup>之<sup>平</sup>屏<sup>平</sup>藩<sup>仄</sup>可<sup>仄</sup>慕<sup>平</sup>，则<sup>仄</sup>墨<sup>平</sup>胎<sup>平</sup>华<sup>平</sup>胄<sup>仄</sup>，奚<sup>平</sup>不<sup>仄</sup>承<sup>平</sup>祧<sup>平</sup>裘<sup>平</sup>孤<sup>平</sup>竹<sup>平</sup>之<sup>平</sup>  
<sup>平</sup>封<sup>平</sup>。知<sup>仄</sup>盖<sup>平</sup>世<sup>平</sup>功<sup>平</sup>名<sup>平</sup>，夷<sup>平</sup>齐<sup>平</sup>不<sup>平</sup>屑<sup>平</sup>萦<sup>平</sup>怀<sup>平</sup>也。告<sup>仄</sup>武<sup>平</sup>成<sup>平</sup>而<sup>平</sup>班<sup>平</sup>  
<sup>仄</sup>爵<sup>平</sup>，桓<sup>平</sup>裳<sup>平</sup>虽<sup>平</sup>贵<sup>平</sup>；八<sup>仄</sup>百<sup>平</sup>会<sup>平</sup>盟<sup>平</sup>之<sup>平</sup>侯<sup>平</sup>服<sup>平</sup>，戴<sup>平</sup>天<sup>平</sup>宜<sup>平</sup>愧<sup>平</sup>从<sup>平</sup>龙<sup>平</sup>。

(以上第二股。说明夷齐原来就没有做官求荣的心，  
 受武王酬勋封爵的人，比起夷齐，应该有愧。这一比  
 是从夷齐正式去做逸民之前说起。)

且夫

(这是“出题”，也就是进入正面题旨的起手处。)

不得已而逸者，其逸最苦；

(以上第三股)

不必逸而逸者，其逸最奇。

(以上第四股。这是一小比，也起着引入正面题旨的  
 作用。)

<sup>平</sup>谓<sup>平</sup>夷<sup>平</sup>齐<sup>平</sup>生<sup>平</sup>不<sup>平</sup>逢<sup>平</sup>时<sup>平</sup>，时<sup>平</sup>则<sup>平</sup>何<sup>平</sup>害<sup>平</sup>于<sup>平</sup>夷<sup>平</sup>齐<sup>平</sup>也。千<sup>平</sup>古<sup>平</sup>非<sup>平</sup>常<sup>平</sup>  
<sup>平</sup>之<sup>平</sup>举<sup>平</sup>，数<sup>平</sup>见<sup>平</sup>则<sup>平</sup>安<sup>平</sup>。放<sup>平</sup>桀<sup>平</sup>南<sup>平</sup>巢<sup>平</sup>，来<sup>平</sup>世<sup>平</sup>不<sup>平</sup>闻<sup>平</sup>口<sup>平</sup>实<sup>平</sup>。况<sup>平</sup>军<sup>平</sup>  
<sup>平</sup>士<sup>平</sup>倒<sup>平</sup>戈<sup>平</sup>而<sup>平</sup>反<sup>平</sup>斗<sup>平</sup>，筐<sup>平</sup>筐<sup>平</sup>载<sup>平</sup>币<sup>平</sup>以<sup>平</sup>迎<sup>平</sup>师<sup>平</sup>，天<sup>平</sup>心<sup>平</sup>亦<sup>平</sup>可<sup>平</sup>知<sup>平</sup>矣。  
<sup>平</sup>夷<sup>平</sup>齐<sup>平</sup>素<sup>平</sup>属<sup>平</sup>布<sup>平</sup>衣<sup>平</sup>，去<sup>平</sup>就<sup>平</sup>不<sup>平</sup>妨<sup>平</sup>自<sup>平</sup>决<sup>平</sup>。即<sup>平</sup>周<sup>平</sup>旋<sup>平</sup>二<sup>平</sup>姓<sup>平</sup>，岂<sup>平</sup>有<sup>平</sup>  
<sup>平</sup>靡<sup>平</sup>名<sup>平</sup>失<sup>平</sup>节<sup>平</sup>之<sup>平</sup>嫌<sup>平</sup>。此<sup>平</sup>亦<sup>平</sup>何<sup>平</sup>须<sup>平</sup>于<sup>平</sup>逸<sup>平</sup>者<sup>平</sup>，而<sup>平</sup>夷<sup>平</sup>齐<sup>平</sup>乃<sup>平</sup>不<sup>平</sup>忍<sup>平</sup>  
<sup>平</sup>不<sup>平</sup>逸<sup>平</sup>也。殷<sup>平</sup>民<sup>平</sup>也<sup>平</sup>欤<sup>平</sup>哉<sup>平</sup>，如<sup>平</sup>独<sup>平</sup>夫<sup>平</sup>何<sup>平</sup>；周<sup>平</sup>民<sup>平</sup>也<sup>平</sup>欤<sup>平</sup>哉<sup>平</sup>，如<sup>平</sup>  
<sup>平</sup>旧<sup>平</sup>君<sup>平</sup>何<sup>平</sup>。以<sup>平</sup>暴<sup>平</sup>易<sup>平</sup>暴<sup>平</sup>之<sup>平</sup>言<sup>平</sup>，直<sup>平</sup>欲<sup>平</sup>澹<sup>平</sup>麾<sup>平</sup>旄<sup>平</sup>仗<sup>平</sup>钺<sup>平</sup>之<sup>平</sup>心<sup>平</sup>，勉

嗣王于养晦。故义人扶去，深恐阻挠大计，而又羞  
蒙杀士之名。斯岂普天率土之恒规所得强而拘  
也。逸焉已矣。

(以上第五股。反复说明这次政变原与夷齐无关，夷齐本可不逸，而又不忍不逸。因为如果坚持做殷民，那个独夫纣王实在不配拥护；如果便作周民，又对不起旧君纣王。在阵前骂了武王是“以暴易暴”，竟没被杀，且被称为义士而扶去，在这种两难而微妙的处境中，只好逸吧！)

谓夷齐所事非君，而君则何弃于夷齐也。我周鼎  
革之初，怜才甚笃。商容复位，下车首拔名贤。矧  
朝鲜拜访范之师，东夏留象贤之客，王度亦恢宏  
矣。夷齐分异周亲，出处无难从便。即黄冠旋里，  
亦备新朝顾问之资。此又何容于逸者，而夷齐乃  
不敢不逸也。遗民也欤哉，呼之亦可；游民也欤  
哉，应之亦可。我适安归之叹，直欲破街壁负图之  
策，警百尔以偷生。故摘餓奇踪，其文不载尚书，  
恐彰胜国耆英之丑。此岂崇德报功之盛典所得罗  
而致也。逸焉已矣。

(以上第六股。站在周朝立场来说，灭殷立国以来，

做了许多礼贤之事，夷齐当然会被重视。本不必逸，而夷齐乃不敢不逸。他们兄弟曾发出无处可去之叹，足以反映周朝并不高明，这便能使那些投降派自愧偷生。《书经》中没记夷齐的事，大概是照顾殷朝归顺之臣。可见武王的酬劳，对夷齐并无作用。夷齐只好逸吧！这一股拿归顺周朝的殷人对比，衬出夷齐只有逸的一条路了。《论语》原文这一章开头便说“逸民伯夷叔齐……”，并没记载这话出自孔子，所以通篇不“入口气”。既出《论语》，必是周人所记，用“我周”二字，也就符合记录《论语》者的立场和他的口气了。这一比，正面发挥夷齐必逸的理由。）

盖天下惟民最贱，壶浆箪食，反颜结新主之欢。逸以耻之，而德与怨两无所任。西山片石，犹恨在囊中也。腥闻易染，紂不能兴渊藪之波；大赉难辞，武不敢赐鉅桥之粟。

（以上第七股。一般的民，对任何统治者都不敢不表顺从。而夷齐的逸，从君民两方说，都无德无怨。即首阳山也属多余的，因为夷齐的超脱，竟使紂王的虐政不能加到他们；武王的恩赐，也不敢给到他们。）

周室惟民最顽，纪叙图功，乘衅煽多方之变。逸以谢之，而畔与服两无所徇。黄农之宇宙，何异在今日也。墓木受封，死不愿效比干之烈；宝龟见兆，生不轻为小腆之愚。

(以上第八股。殷民归周之后,仍不太顺,被称为顽民。他们私自记录小邦的政事。而夷齐的逸,超出了叛与服的两端。他像是处在黄帝神农的天地里。他死了也不会像比干墓木的受封,活着也不做顽民写自己政事的笨事。这一比从夷齐已逸之后发挥,说明他们逸的伟大。)

呜呼!自有夷齐而民心可以不朽矣,此其所以为逸民之冠欤。

(以上收结。《论语》这一章记许多逸民,首先提出的是伯夷叔齐。此文最后用冠字结束,点明这一章中诸人的次序,也表明夷齐在逸民中的地位。)(本篇引自《接山文稿》)

按汉语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赋词曲,乃至四字匾额,作为声调的细胞,或说最小的单位,常是两个字为一个盒子。两个盒子叠放时,上个的底如是仄,下个的底宜是平。三盒叠放时,三个底宜是“仄平仄”或“平仄平”。例如“闰余成岁,律召调阳”,“余岁”是平仄,“召阳”是仄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霞鹜飞”是平仄平,“水天色”是仄平仄(“与共”是衬字不算)。相连的盒底如果有接连相同的,就破坏了律调,就不好听。普通骈句,有时也会夹有不合谐律的句子。详见拙著《诗文声律论稿》。

后边再举一篇著名的游戏文章,即清初尤侗以《西厢记》句“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为题的一篇八股。尤侗文风以华丽见长,和当时的王广心一类,号称“尤王体”。当然也都很讲求声调的和谐。其实一般的八股既须用排偶也就



必然不能不和谐,只是没有他们的突出。到了前举周镐那一篇不但突出,而且更加集中了。

以下举尤侗文章的故事通俗,不作解释,非专为介绍声调,也不再标平仄。

## 最著名的游戏八股文

### 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 清 尤侗

想双文之目成,情以转而通焉。

(以上破题)

盖秋波非能转,情转之也。然则双文虽去,其犹有未去者存哉。

(以上承题)

张生若曰:世之好色者,吾知之矣。来相怜,去相捐也。此无他,情动而来,情静而去耳。钟情者正于将尽之时,露其微动之色,故足致人思焉。

(以上起讲)

有如双文者乎?

(以上领题,亦称出题)

最可念者,啁莺声于花外,半晌方言,而今余音歇矣。乃口不能传者,目若传之。

(以上第一股)

更可爱者，衬玉趾于残红，一步渐远，而今香尘灭矣。乃足不能停者，目若停之。

(以上第二股)

惟见盈盈者波也，脉脉者秋波也，乍离乍合者，秋波之一转也。吾向未之见也，不意于临去时遇之。

(以上领题，亦称出题)

吾不知未去之前，秋波何属。或者垂眺于庭轩，纵观于花柳，不过良辰美景，偶尔相遭耳。犹是庭轩已隔，花柳方移，而婉兮清扬，忽徘徊其如送者奚为乎？所云含睇宜笑，转正有转于笑之中者。虽使觐修眄于靚面，不若此际之销魂矣。

(以上第三股)

吾不知既去之后，秋波何往。意者凝眸于深院，掩泪于珠帘，不过怨粉愁香，凄其独对耳。惟是深院将归，珠帘半闭，而嫣然美盼，似恍惚其欲接者奚为乎？所云渺渺愁余，转正有转于愁之中者。虽使关羞目于灯前，不若此时之心荡矣。

(以上第四股)

此一转也，以为无情耶？转之不能忘情可知也。以为有情耶？转之不为情滞又可知也。人见为秋波转，而不见彼之心思有与为之转者。吾即欲流睐相迎，其如一转之不易受何！

(以上第五股)

此一转也，以为情多耶？吾惜其止此一转也。以为情少耶？吾又恨其余此一转也。彼知为秋波一转，而不知吾之魂梦有与为千万转者。吾即欲闭目不窥，其如一转之不可却何！

（以上第六股）

噫嘻！

（以上过接）

招楚客于三年，似曾相识；

（以上第七股）

倾汉宫于一顾，无可奈何。

（以上第八股）

有双文之秋波一转，宜小生之眼花撩乱也哉！抑老僧四壁画西厢，而悟禅恰在个中。盖一转者，情禅也，参学人试于此下一转语！

（以上收结）（本篇引自《西堂杂俎》。《制艺丛话》刻本，漏掉了一股。我藏有一册抄本，全是《西厢记》句子为题的，作者都题为唐寅，可疑是伪托的。）

## 余 论

前边已经谈过，八股文是陆续积累古代各种文体中的局部技法，拼凑而成的一种文体。不但那些局部技法无功

罪可言，即开始拼凑的人，以及拼凑成的规格，也无功罪可言。如议罪，那就是有意特定用这种规格去考试士子的统治者，他们不但用此套子，而更设许多苛刻条件去“难”人，致使八股这种文学形式蒙了恶名。统治者不但害了士子，也害了一种文体。明末有人作诗有“断送江山八股文”之句，明亡后还有人写一柬帖贴于朝堂：“谨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祯夫妇两口，奉申□敬。晚生文八股顿首拜。”可见世人对八股的谴责。

清初有个医学家(当然是中医)徐灵胎，号洄溪，著有许多首“劝世”的“道情”(一种民间小调)，总名《洄溪道情》，其中有刺时文一首云：

读书人，最不齐。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材计，谁知道变作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便道是圣门高第。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臂高低，口角嘘唏。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要知道这位徐灵胎也是读过、做过八股的人，他没做官，还可以说他比较能客观地看八股。稍后的文豪袁枚，是翰林官，既做知县，又是八股大家，刻有《袁太史稿》，总算得过八股好处的。他也记录这首道情，刻入《随园诗话》。是迫于舆论，不得不跟着嘲笑一番呢？还是反衬自己高明，不同于那些末流呢？还有梁章钜也是个翰林出身，做了大官，也做

过考官，还著了一大部《制艺丛话》，“一本正经”地评论明清各家八股文的优缺点，而在他的《丛话》中也引了这首道情。袁枚没做大官，没操文柄，抄了道情，尚可理解；而梁章钜则不但在做考官时用这绳套套了多少士子，还要著书立说，颂扬这根绳套，最后抄了这道情，不但否定了八股，否定了他的著作，也否定了他自己，却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八股文害了多少士子，而受害更大的，实是皇帝。“崇祯夫妇两口”，固然是受害最明显的证据，从本质上看，用《四书》中零章断句来强迫人东拉西扯，还要算“代圣贤立言”，分明是“公开造谣”，“假传圣旨”，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封官任职。既然自己令人造谣，自己还以为选拔人才，所选的那些人和他们做的官，自宰相一级直到地方县令，都是久经锻炼说假话的人，这样从朝政到吏治，能够好得了吗？明眼人看来，不必等到崇祯死后才算“断送江山”，从开始用那文体、用那题目、用那做法、用那条件去套人的人，早已种下了“断送”的根源！

八股文被利用来束缚士子并从根本上成为说谎造谣的大训练，流弊自然不可胜言，但世上事情并不全都这么简单，还有它的另一面在：也不知从何时何人起，许多士子称科举八股文为“敲门砖”，这个词也包括其他科举考试所用的文体。拾起一块砖头去敲门，门里的人听见出来开了门，客人手里的砖头也就扔掉了。可见应科举的人对科举本身的态度，更无论对八股文体的态度了。所以明清历朝科举出身的人，也就都是作过八股的人，并不都是专会欺诈骗

的人,也有许许多多具有各方面的才能,为国为民作过若干好事的。但又可断言,那些人的各项才能和所作的好事,绝对不是从八股文中学来的。

有人反问:“你不是说过八股文体并不负罪责吗?”回答是:“并不矛盾。”试看周镐文章的声调流利铿锵、分析深透周密,这些文章技巧,岂不都是从古代文学传统中学来的!尤侗的文章,代《西厢记》的张生立言,岂不是剧本外的一出小品戏吗!我还要问:骈文中几个单句之下用几双排句,然后再接单句,俗称“宫灯型”,上下绳穗单,灯架四框偶。或说“乌龟型”,上下、头尾单,前后四腿偶。还有五七言的律诗,也是首尾可单,中间必偶。这些模槽,传了一千几百年了,今天作旧体诗的人还用五律七律之体,这问题岂不值得研究民族文学史、民族文化史的学者好好深思吗?

传统也好,模槽也好,前边谈过的《字眼使用》那本“换字法”的书,可以上溯到《尔雅》,“初、哉、首、基”等字都同于“始”,“林、丞、天、帝”等字都同于“君”……下沿到《骈字类编》,两字两字的词,可以分别换着用。从唐朝的《白孔六帖》、宋朝的《太平御览》、明朝的《永乐大典》、清朝的《图书集成》,下到后世的蒙书《龙文鞭影》、《史鉴节要》等等,哪个不是作文用典的资料!高头讲章式的《诗韵合璧》,上端横栏中所列的《类腋》之类的书,又哪个不是修饰辞藻的大型“小抄”呢?再大到《四库全书》,前边的上谕是破题,目录是承题,提要是起讲性质,经史子集正目、存目是八条腿,馆臣的进书表是尾巴。

戏剧例如皮黄的《空城计》，诸葛亮出场自述是破题，派将是承题，马谡违背指挥、王平预报地形是起讲；诸葛亮在城上与司马懿对唱是两大扇，斩马谡是收结。即到大鼓书、牌子曲等，开头几句，也必要笼罩全篇，等于破题。

建筑方面如四合院，大门、二门、过厅，是冒子。游廊四面，盪顶两座（东南、西南）、厢房两面，是提比、小比。正房一套，包括暗间、耳房，是主要的龟背部分，也即是中比大段。照房或群房是收结。诸如此类的现实所反映出的思想方法，似乎都有“基因”。听说有人用老鼠作试验，把“基因”打破捣乱，于是有尾生背上、腿生五条的，但其为尾为腿，依然故鼠，而无鸟爪鱼尾的。基因之伟大，其顽固之可恨，有如此者哉！总之，八股文体各部分，各器官和它们的功能，都是从遗传基因而来的。定型的、程式化的八股文，则是人为的，由捣乱而产生的畸形老鼠。用八股去考试天下士子，犹如勒令天下人以畸形老鼠为主要的食品肉类而已。

再回到文章技巧问题方面来，即以换字法为例，非但无善恶之可言，还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条件。某个民族语言的词汇多，足以说明这个民族文化的丰富，而绝不证明他们野蛮。况且无论讲话或作文章，只有几个词来回用，听者读者一定厌烦。古今若干好的文学作品，没有不是善于变换运用词汇的。有趣的是，像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曾举沈伯时《乐府指迷》所说的加以贬斥。沈氏说，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当然这些“不可直说破”和“须用”的提

法,实在太死,但是换字法却是作诗文词曲乃至说话讲演的人,不但都绝对不可避免,而且是修辞手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必远举古代《江赋》、《海赋》之类为例,即以《人间词话》所推崇的苏轼《水龙吟》咏杨花词,整首全是拟人化、比喻法。最后才落到“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通篇是一个大换字,只是活而不死而已。至于说纯文体形式(不算思想内容)对国计民生有多大的关系,恐怕很难直接连得上。“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故曰:“并不矛盾!”

## 试帖诗

在科场考试中,与八股文并行的一种文体,就是“试帖诗”。考试所用的文体,本有多种,如赋、论等等,但最主要的,一直与科举考试制度相终始的,八股文外,要数试帖诗了。

试帖诗又称为“五言八韵诗”。它的形式,即是“五言排律诗”,只是增加了一些特定的条件:

a. 必须五言句。

b. 必须律调句(在一些名家试帖诗集中,也偶有一二拗句的,但在正式考卷中许不许有拗句,尚未见明文)。

c. 必须十六句。



d. 首尾各二句可以不用对偶外,其余各联必须对偶。

e. 限定以某字为韵。例如以“东”字为韵(题下注“得东字”),通首必须严守东韵。如某句韵脚用了“冬”韵中的字,叫做“出韵”,便不及格。

f. 一般律诗,首句用韵的,那个韵脚字,可以用邻近韵字,叫做“撞声”,但试帖诗是不许可的。即使不用邻近韵字而仍用本韵中字的,也只在名家试帖诗集中偶一见之,考卷中许可与否,也未见规定。但所见绝大多数作品(包括所见的中试朱卷和试帖诗集)都是首句不入韵,而且“仄起”(即句中第二字为仄声的)为多。揣度其原因,大约是因为既称“八韵”,如果首句用了韵岂不成了九韵了。那么不用首句入韵的格式,自然是保险的。首句仄起,旧时称为“正格”,首句平起的,旧时称为“偏格”。正格、偏格的说法,本无道理,也无根据(见拙著《诗文声律论稿》),而从前流行甚广,自必被试帖诗所采用。

g. 诗的前四句中要把题目大意包括进去,类似八股文的破题。后来逐渐演变成为要包括“题字”,例如下面举的《敦俗劝农桑》那首作品,前四句里即嵌进这五个字。但死板过甚的条件,总有行不通的时候,所以有些作品中,也就不全包尽题字了。

h. 诗的末尾要“颂圣”,即是末二句处一定要扯到赞扬皇帝,歌颂时政上,即使强词夺理、牵强附会,也都在所不惜。这在窗课诗集中并不全有,但在考试上则必不可少。这末二条在苛刻条件中,实属出奇的。

试帖诗形式举例：

赋得敦俗劝农桑 得敦字 清 杨庚

(此题式首称“赋得”，题下注“得某字”，即是以那个字为韵。所用韵字，有在本题中取字的，有不在本题中取字的。“敦俗劝农桑”是唐玄宗的一句诗。本诗作者是清代嘉庆时人。)

耕织

鸿图肇，农桑

风诏温。

巡春民用劝，函夏俗同敦。考礼钦

祈谷，歌豳重采蘋。公田皆雨及，

法驾屡星官。

推四风清圳，纍三月满盆。笠看黄壤聚，稊到绿云

屯。安土齐趋业，蠲租叠沛

恩。万年衣食裕，

寿寓迈羲轩。

(书写的格式是：题目低两格写。诗的正文也全低两格写。有涉及皇帝的字句，即把指皇帝的字提高到低两格的那个高度，叫做平抬，那也是全诗的最高横线。如遇提到比当时皇帝更高一层的字句，便写在比这个横度高一字处。遇再高一层的，便再往上提。本首诗中：风诏、巡春、法驾、恩、寿寓各处都是指嘉庆皇帝的，所以都提到平行度处。鸿图、祈谷都是指嘉庆以前就有的政令，所以比风诏再提高一字。四

推指皇帝亲耕籍田时，亲自扶犁向前三推，回来再推三次，叫做三推三返。雍正增了一推一返，所以这里提到四推时，也要比指嘉庆的话再提高一字。寓即字字。这首诗中，随处都是需要拍写的字，末尾的颂圣，就不显得突然了。）

考试做完八股文还要加上试帖诗，从形式上看，好像是诗文并重。仔细看来，实在另有缘故。八股文中自从明末清初删去“大结”之后，全篇中即没有应考者自己立场的语言，因此在文中也就没有地方可以安插对皇帝表颂扬的话了。皇帝下令考了一番，竟连一句颂扬的话都没听到，自是缺典，也不甘心。那么试帖诗的“颂圣”尾巴，正可起画龙点睛的妙用，也就弥补了前边八股文之不足了。

至于试帖诗的做法，当然仍是翻来复去地嚼那题目中的字。在词章修养高的人，可以用各样换字法去变化字面。从文体类别看，试帖诗基本上属于咏物诗，但所咏的不限定某一物，而是咏“题”，题目中所有的几项内容，都要从它们的上下、左右、前后、正反、内外各个方面挖空心思去拉拉扯扯。看起来也不失巧妙有趣，实际上它正和八股文一样，没有作者自己的任何思想、感情，更不用说发为议论了。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举例。

由于这种诗都要扣紧咏“题”，于是形成了一种特别的腔调。有一首游戏性的“剃头诗”，虽然只做了四韵（八句），却能写出试帖诗体的神髓。诗曰：

闻道头堪剃，何人不剃头。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

头。剃自由他剃，头还是我头。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中间两联，最具试帖诗句法的特点。结尾二句，尤其可见神完意足，滴水不漏之妙。有人说这是清代初年讽刺剃发令的作品。按清初时试帖诗还没达到一律滥调的程度，前人笔记所记，也没有明确指出时间，年代远近，已不可考了。

#### 附记：

先师励耘老人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之日，谨以习作一篇为献。先生生于清季科举未废之时，举业既属士子唯一出路，八股文自为必读必习之艺。于是其文体形成之缘起与夫瘤弊积累之所在，莫不一一了如指掌。间尝请益，深蒙详加剖析。时当神州沦陷之际，先生口诵周铁山《逸民伯夷叔齐》一篇，琅琅然声出金石，盖感时寄慨，如赋变雅焉。功亦或退而拟作，犹忆一题曰《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一题曰《国人皆曰可杀》，每呈函丈，必蒙笑而阅之。迨数其股数，又复诧曰：“何以俱只六股？”对曰：“总扯不长。”先生掀髯笑曰：“小考六股亦可矣。”追念当年提命，虽末艺之微，笔墨之戏，其拳拳之谊犹有如是者。今距登堂受教之初，已近六十年，而功衰退废惰，寸进不加，瓣香回向，不知涕泗之奚从也。启功谨识。

原载 1991 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五、六期

今春南开大学来新夏教授寄示所撰《依然集》（文史丛

谈),引及清代乾隆末叶仁和曹斯栋所撰笔记《稗贩》一书。其卷五“墨义”一条,叙述历代科举文体问题。来教授特引其中“明洪武十七年太祖与臣下定制,文须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又号八脚辞”。功按昔人探讨八股,多谓始于北宋,此为追溯远源。雍乾之际方苞奉敕所编《钦定四书文》所最早只及“化治”(成化、弘治),足见益不远攀宋人。此述明祖之谕,当是八股文之嫡亲祖称。惟曹书此篇统叙“墨义”源流,非逐处引用原文,又未注其出处,幸记“洪武十七年”,待于《明实录》中搜索之。(又承来教授见示《稗贩》原书,附此致谢。)

又八股文之风,曩以“清真雅正”为标准,但未见详加诠释者。晚清张之洞撰《輶轩语》,于卷三论时文谓:“宜清(原注:书理透露,明白晓畅),真(原注:有意义,有剿袭),雅(原注:有书卷,虽鄙语,有先正气息,无油腔滥调),正(原注:不倣诡,不纤佻,虽偏锋,无奇格)”。著者又云:“四字(指“清真雅正”)人人皆知,然俗多误解。今特为疏明之。不惟制义,即诗古文辞,岂能有外于此!”

一九九八年冬 启功补记

## 《说八股》补微

张中行

《说八股》是启功先生写的一篇文章，刊于1991年第五、六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补”有二义，一是画蛇添足，乃出于我，非原文所有；二是原文中已有微，我不自量，加点油醋，可美其名曰补充。“微”也有二义，由启功先生方面说是微言大义，由我方面说是鸡毛蒜皮。破题完，说缘起。是今年(1991)，在一次酒饭的聚会上，我遇见启功先生。他很少主动拿自己的作品(包括法书)送人，这一次却例外，酒尚未入唇，就递给我一份复印件。我一看，题目是《说八股》，字数超过三万，不禁大吃一惊。惊之后是喜。何以既惊又喜？因为时至今日，八股已成为绝学，没有人肯讲，甚至没有人能讲；而我，是一直认为很需要讲。理由有次重要的，是益知。八股，我们喜欢它也罢，不喜欢它也罢，总是一种重要文体，几百年来，有无数的读书人在它上面费过心思，单是看作史实，我们也应该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理由还有重要的，是益智。这是指古为今用，详情留到后面说。说到用，这里想岔开一笔，说说十年以前，我也讲

过一次八股(是口讲,不是写)。那是奉编辑室头头之命,为从事编辑工作的一些年轻人讲的。用意也有浅深两种:浅是从事编辑工作,嘴里常说八股,应该见过正牌八股;深是用为殷鉴,从中吸取一些免疫力量。为了避免空口说白话,从大革命时未舍得烧掉的《巧搭文府》之类八股选本中选了三篇,包括节题、截搭题、难作题三种;又为了避免枯燥,除分析、讲解选文以外,还说说来源、变化、精髓、趣闻等。费力不小,效果却很不佳。我想,原因的少一半是八股的形貌和气味,年轻人会感到离自己太远;多一半呢,是我没作过八股,领会不深,就必致讲得不深不透。启功先生得陈援庵先生指授,是作过八股的,如果他肯讲,那就再好没有。可是推想他不会讲,因为一,这要费大力量,单是找资料就不容易,已经是门外有汽车、门内有空调的时代,谁还有兴趣保存马二先生的选批本呢;二是未必有兴趣,这样的大举就太难了。但是他竟写了,看文后的附记,知道是纪念陈援庵先生诞生一百一十周年,才拿出这样的舍身精神的。总之,看到这篇文章,还没往下涉猎正文就心情激动,并未加思索就迸出一句:“我要写文章介绍。”不想言者无心而听者有意,过了不很久就有电话来问是否写成。其时我已经读了一遍,撰文介绍的兴趣大增而胆量大减。原因很简单,是有如看他的法书,除了喊“好,好,好”之外,实在说不出什么。可是偏偏问是否写成的电话又来,只是几个“好”字当然不能交卷,不得已,只好找出复印件,再细读一遍,希望由八股的花样中悟出点办法。语云,急中生智,居然从第三节中找

到个秘诀，曰“没话找话”，化为具体办法是东拉西扯，能够沾点亲带点故的就请来入座，这就是题目所说的补加微。

时至今日，应该怎样看待八股，问题很复杂。由浮面看，八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种文体，就是昔日，也几乎是绝大多数人看不起。也是几乎，编书目，编文集，都不收。单是名号就不怎么冠冕，如制艺，表示是遵命文学；时文（或其前还要加“烂”），表示是一时不得不用，用过就扔。世间事，任何一件都有个来由，八股之受鄙视也有，那，我想，是一，不能写自己的情意，恰好与为文之道相违，言非心声，由言者方面说是必无动力，由听者方面说是毫无价值；二，组织程式化与思路之无可无不可相违，尤其日久天长，必使人生厌；三，正如昔人所常说，它是敲门砖，门开了，砖当然要扔掉，正如今代之写学习体会或检查，通过了也就不想再吟诵。但是这情况，正如启功先生所说，“不但这种文体不负责，还可以说它是这种文体本身被人加上的冤案”。这种近于翻案的看法，启功先生举了不少理由，我想总且简而言之，是任何表达形式（或说任何体裁），都既可以表达造反，又可以表达磕头；八股之所以只表达磕头而不表达造反，原因很简单，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只许磕头，不许造反。进一步，或深追一层，是喜欢磕头，痛恨造反。执笔为文的人也属于小民一流，愿意腾达，至少要活，拿起笔，何去何从，就明若观火了。这是泛说，推衍到具体，情况还会更严重，比如明朝嘉靖年间，山东乡试，某士子作“无为而治一节”（《论



语·卫灵公》)题,一阵发神经,末尾来几句“大结”,说:“继体之君,未尝无可承之法;但德非至圣,未免作聪明以乱旧章。”高高在上者大怒,结果就逮讯毙于杖下(见《四勿斋随笔》),这是造反之下,连逆耳之言也不能容忍。语云,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无怪乎历代无数人作八股,都规规矩矩代死圣贤立言,讨活圣上喜欢了。

就真只能代死圣贤立言,不能说说自己的吗?根据上面所说任何文体都既可以表达造反又可以表达磕头的文论,自然只能答“也能”。为了说明也能,举一二旧事为证。一件,记得出于《茶余客话》,总当在清朝初年,一士子名马世俊,应试落第,无以卒岁,到明臣降清的大名人龚鼎孳那里告帮,文人求乞也要雅,拿自作的一篇八股文请看,题目是“而谓贤者为之乎”(《孟子·万章上》),其中有这样几句:“数亡主于马齿之前,遇兴王于牛口之下,河山方以贿终,功名复以贿始。”伤时愤世,写得沉痛,这位大名人感动得至于泪下,慨然解囊,送了八百两银子。可见为文用八股法,不但可以写自己的,还可以写内心的最底层的。另一件就更上一层楼,见于《甲申传信录》,原文是:“赵玉森至王孙蕙(案都是朝内不小的官)家,涕泣自言:‘受崇祯恩深,然国破家亡,实自作之孽。予捐性命以殉之,理既不必;将逃富贵以酬之,情又不堪。’”意思是既不想为旧朝死,还想在新朝作官。我旧学荒疏,想不出,像这样的意思,除用八股法表达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使难以出口的成为音调铿锵像是也理直气壮的妙文,是八股文的独得之秘(其次才是骈文),

因而专就表达能力说,我们也不当小看它。

应刮目相看,理由还可以说得细致些。内容限定代圣贤立言,没什么可说的;只说表达方面,值得颂扬的不少。其一是兼容并包。这是说,它吸收了长行(佛家语,指非韵文)文字的所有表达技巧。最突出的是熔散行与骈体于一炉。所谓八股,专看一股,如起比上,散行,是唐宋八大家,及至向下看,起比下,虽仍散行而处处与起比上对称,又化为《文选》,真是岂不妙哉。大块头之下还有零碎的,如可以忽而诘屈聱牙,是典故;忽而雄辩,是诸子;考场之外,还可以通篇四书,如传说乾隆末年某士子出家,其妻作八股文表示感伤,开头部分是:“攻乎异端(《论语·为政》),我丈夫也(《孟子·滕文公上》)。夫良人者(《孟子·离娄下》),所仰望而终身也(同上);今若此(同上),吾未如之何也已(《论语·子罕》)。”又是岂不妙哉。其二是无中生有。这是指本来无话可说,却能说得像煞有介事。八股题有所谓小题,可以少到一个字,比如子曰的“曰”,有难作题,比如“寡人好色”(《孟子·梁惠王下》),都难于下笔,因为没有什么意思好说。可是八股高手有办法,手头有一篇“子见南子”(《论语·雍也》),可以为例。在孔子一生的行事中,见南子(卫灵公的夫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因为南子漂亮而不规矩,所以子路不高兴,急得孔子起誓,说:“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以此为题,有什么话可说呢?要没话找话。可是如流行的歇后语所说,“管丈母娘叫大嫂子”不成,因为孔子是至圣,所行要既有理而又堂皇。请看清朝来鸿璜的一篇,开头

两股是这样写的：

中彝召娄猪之丑，方将辜惟窥客，徒作官女之招摇；而赏识及于贤豪，转乐睹上国衣冠之色。

征车兴衰风之歌，不闻开阁招贤，重沐大君之恩宠；胡片席偶停沫土，反足动掖庭景仰之思。

两股，上股由南子方面下笔，下股由孔子方面下笔，都既典雅堂皇而又不离颂圣；可是具体对号，又像是缥缥缈缈。这是没话找话的大本领，恕我说句狂妄的话，包括现在所有率尔操觚的诸公诸婆在内，念了这个，就只能望洋向若而叹了吧。其三是化难为易。适才说的无中生有也是化难为易，这里易标题，是想说更高一级的难。最典型的例子是“破题”。破题的小难是必须意同语异。大难是因为常有超常题。计有三种：一种是小，如上面提到的一字题，会苦于撑不开；一种是大，如某某全章，会苦于笼不严；还有一种是截搭题，如“斯焉取斯子贡问”（《论语·公冶长》），会苦于合不拢。但世间事就是这样怪，譬如演杂技，要骑独轮车才有人看，作八股也是这样，常常要在破题方面大显神通，偏偏是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要让人看着像是易如反掌。举一点为例。一字题，《论语》第一个字的“子”，某人破曰：“鲁论之于至圣，特书子以冠其篇焉。”截搭兼大题，《论语·公冶长》的“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合下二节”（案为“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某人破曰：“勇者不必仁，足民知礼者可类推矣。”还

有更怪的截搭题,《制义丛话》引《坚瓠集》,主司试六岁的莫如忠,以《论语》的四个篇名“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为题,莫破曰:“化隆于上,而有僭非其礼者,俗美于下,而有犯非其罪者。”都不只交了卷,而且显出思路的巧。对照现在,幼学生作《我的志愿》,老学生作《我的体会》之类,究竟太容易了。其四是妙不可言。这一段应该由启功先生写,他没写,我这篇小文标明补,不得不勉为其难。但究竟是难,只好取巧,用旁敲侧击法。先乞诸其邻,是六十年以前了,一次,听友人李君的尊人闲谈,由现代文谈到八股文。他在清朝中过秀才,自然是作过八股文的。他说现代文没有技巧,没有味儿,看着没劲。至于八股,那微妙之处,简直可意会不可言传。当时听了,以为这也是一种癖。后来接触一些八股文,才想到李老的所谓微妙,并非故神其说。用老子的话说是其中有物。这物是什么?我望道而未之见,只能说感觉。这是来自各种文体,而有不同于任何文体的一种味儿。这味儿,还是说我的感觉,是一种别扭劲儿,或说古奥而生涩。为什么要走这一路?也许是想避熟?总之,年深日久,它就有一种特殊的调调,考生合,考官欣赏,都是在这调调上聚会,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相视而笑,是都体会到妙;至于局外人,包括我们大量拿笔杆的,就必致莫明其妙。大量人不明,就明者说,就更加妙不可言。这妙,是深微的巧加特殊的味儿,难以言传,想举事以明之。一件,来于故事。某主人用重资请个有名的先生教儿子举业,连试不中,烦个与先生有深交的人询问原因。先生说是图厚待遇延续,故意

不让他中。问如果让他中,有什么办法,先生说非常容易,只是把某处的甲虚字换成乙虚字就成了。另一件,见《茶余客话》,说知县孙肇兴欣赏夏曰瑚的八股文,说必中,但又说:“如此破法不得元。”索笔为易一破,后来中了探花。如果是现代文,不动内容而只是改换星星点点的字句,是不会有化臭腐为神奇的效果的。总之,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认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因为,即如借对(如“枸杞”对“鸡鸣”)之类,终归可以用耳目摄取,至于八股的妙处,就非鼻子不可。

以上都是由表达能力方面说。但表达是为内容服务的,而说到内容,只问事而不问理,那就想说好话也难于张口了。因为无论看文还是看写文的人的心理,都是用空话、大话、假话以讨考官、也就是皇帝的臣仆高兴。著文,撇开自己,眼看皇帝,心想皇帝,还能写出什么来呢?只能是空洞无物。其实,如果正反两面都算,由表皮往里看,也会找到物,而且不少。那是巧言令色,强词夺理,借歌颂以表示甘心为奴才,等等。奴颂主,主得意;由主以外的人看,就一文不值了。

这样说,八股文就有了既不可轻视又应该一脚踢开的两面性。两面难于调和而又不能不兼顾,此本节开头所以说“问题很复杂”也。

我也是秀才书驴券,稿纸写到十张才说到启功先生的

《说八股》。从俗，我要写点评介。但这大不易，因为说不胜说。无已，只好用老子的办法，曰损之又损，只说我以为最值得说说的三种优点。

其一是“博”。这还可以扩大到题外，兼点一下人的博，因为文是人作的。但这要损之又损，只说上堂会讲班马李杜，下堂会讲金石碑板之外，还旁及不入四部九流的八股文，闲逛大街，只见所书牌匾高悬店门之上的人，总当惊叹不止吧？且说人的博经常表现在文的博上，如《启功丛稿》、《论书绝句》之类，读过的人几乎都有这样的观感：“真高！别人办不了。”这篇《说八股》是出奇兵，连我这有四十多年交谊的人也没有想到，在这已经为人忘却的领域，见闻竟也如是之广。具体说，许多收八股文的文集（包括选本），他看过，不少讲八股文的书，他也看过。而且记得，所以一旦有兴致介绍，就如数家珍，面面俱到。不只俱到，而且老尺加一，讲了有近亲关系的试帖诗。总之是博。至于具体如何博，恕我用广告家的技法，夸了半天都是闲篇儿，重要的是请君自己掏腰包，去尝试。这样偷巧也有理由，用禅门的话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其二是“精”。这是指有见识，即看得深，讲得透。这方面，例也是举不胜举。随便抓两处，都是我认为可以称为独到的。一处是为八股文喊冤，前面曾经提到，这里再引几句：

譬如有人用苛刻的不能忍受的条件挟制别人，俗称给人“穿小鞋”。做服装的单位、卖鞋的铺子，都有功

而无过，鞋的本身也无善恶的分别。……八股之成为谗谥、恶谥，虽不像“尺寸小的鞋”那样本身毫无责任，但形式太死板，苛刻条件太多，那究竟是限定型、设条件者的责任，实与文体基本形式或说各个零件无关。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冤有头，债有主，刀可以切菜，也可以杀人，如果误用而杀了人，那总不是刀之过。八股文的所以名声不好，是因为它遵在上者之命，经常杀人而不切菜。所以评八股文，借用佛家常用的术语，“能”（表达）与“所”（被表达）应该分别对待，“所”不佳，“能”则未必毫无足取。再说另一处——其实是多处，只能举一处。这是对八股文作法的分析，先看实例（清蒋棻之作，题为“狗吠”，出于《孟子·公孙丑上》的“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破题、承题、起讲三部分写完，第一股之前有这样一句：“岂但征之鸡鸣已哉！”以下是启功先生的讲解）：

这种单句或小段都是文中的引子、楔子或黏合剂。用在前边的叫“领题”、“出题”，用在中间的叫“过接”，用在后边的叫“收结”，还有下文的或暗藏下文的叫“落下”等等。这里“岂但”一句即是第一比以前的“领题”。明代曾把这部分的话称为“原题”。八股的苛刻要求之一，是不许“犯上”或“犯下”。例如孟子原话是“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题目只出“狗吠”，如果文中讲了鸡鸣如何，就算“犯上”；如讲了达乎四境如何，就算“犯下”。这里写岂但鸡鸣就完了吗？下句潜台词是还有狗吠呢！又可引出狗吠。如说它犯上，但它却是否

认呜呜的。

这既解析了此篇，又可以指导悟其他篇，推想马二先生复生，本领也不过如此吧？

其三是多有风趣。八股文是干巴巴的事物，可是到启功先生手里，就讲得到处使人发笑。还是上面说过的道理，文由人来，启功先生的为人，从头到脚，从言谈到举止，都是充满风趣的。这风趣满则溢，于是举八股文之例，就拉来尤侗的《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案为《西厢记》曲文），文长，不录。抄另外两处。一处是《三十而立》（《论语·为政》）的破题，文曰：“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另一处是《王如好色至有托其妻子于其友》（《孟子·梁惠王下》）的渡下，文曰：“王之好色，与百姓同之，而不与王之臣同之者，王之臣自有其妻也。”其下还有更妙的挽上，文曰：“王之臣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不托于王者，以王之好色也。”看到这样的妙文，推想就是程朱陆王，也当为之破颜吧？

论赞完，照应题目，还应该说些自己的，以还“补”之愿。想分为体用两个方面，体说两项，用说两项。以下依次说。

其一，八股误国，不少人这样说，我认为事实并不是这样。理由很多：（1）不是说它有用，是说它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论性质，它是山呼万岁或歌颂君王明圣一类，作用的充其量是使君王更骄傲，更为所欲为。祸国殃民的直接原因是君王的专制加无知（专制必自信为有知），比喻为红花，八股文不过“一个”小小的绿叶而已。（2）说它小，还可以从可



无而不必有看出来。这是说,有八股之前,八股死亡之后,歌颂君王明圣的妙文或臭文,必是同样随处可见,只是形式不同罢了。(3)隋朝不以八股取士,亡得比明清快得多。(4)即以清代而论,“避世厌闻文字狱”的时代,不作八股甚至取消科举制度,读书人就会走陈胜吴广或明治维新的路吗?我看,其上者不过坐在屋里写《说文解字诂林》或《随园诗话》而已。(5)八股文是敲门砖,就是善于作、死后谥为“文”的诸公,如张文襄之类,作《书目答问》,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道术也不是从八股文来。其下者,作小官,刮地皮,然后买田纳妾,就更与八股文无关了。所以,重复前面的话,冤有头,债有主,祸国殃民的首犯是一个人为所欲为的专制制度,往八股头上安是不合适的,或甚至说因果倒置的。

其二,想说个更偏的偏见,是韩柳以来的所谓古文(指总的精神,个别篇要另说)并不像一般文学史宣扬的那样好,原因是:由内容方面看,也是代圣贤立言(只是形式不那么鲜明、死板);由表达方面看,也是讲气势(分别只是躲对偶)。圣贤之道,未必对,未必是自己的,所以其价值至少是可疑。表达方面的气势呢,有如京剧演员的台步,是造作而成,就表情达意为人的一种日常活动说,来路,会有不自然的成分,去路,会有唬人的成分。也许就是因此,所以《制艺丛话》引乾隆年间大名人朱珪的话说:“五十余年,出入中外(案指京官和外官)……乃悟时文即古文,古文即经解。”说“即”,意思欠清楚,因为二总不能成为一;不如说“近亲”,即

有传承关系。为篇幅所限，只举最足以表现近亲关系的一点点节录的文字为证。

夫圣人抱诚明之正性，根中庸之至德，苟发诸中形诸外者，不由思虑莫匪规矩，不善之心无自入焉，可择之行无自加焉。……《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无过者也。自明诚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不勉则不中，不思则不得，不贰过者也。（韩愈《省试颜子不贰过论》）

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为仁义礼信者，以为吾所当为而已矣。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霸者之道则不然，其心未尝仁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尝义也，而患天下恶其不义，于是示之以义。其于礼信，亦若是而已矣。（王安石《王霸》）

都是以玩弄腔调的文字颂圣，听来气势很盛，用事实对证则内容空空（如哪里去找这样的圣人和王者？），这样的文章下传，程式化的程度增加，不就成为八股了吗？

其三，透过面皮看心，人都是（信和行）功利主义者，所以最后要转而说用。用的一面是取，即执笔治文，可以相机利用八股文的技法。这，有些笔尚未健的男士和女士，会希望我谈些具体的，金针度人。可惜我办不到，不是因为想留一手，是因为不好谈。千头万绪，难于下口，一也；神而明之，难以言传，二也。所以只能说一点点原则或要点。其实

最重要的不过是一点，即化难为易之法。这可以正用，其上者是思路往多方面驰骋，其下者是没话找话，而如果在这方面能有所悟，那就任何题目，甚至没有题目也可以成文。还可以歪用，如应时风要求，不得不写自己不愿意写的，手中有八股技法，那就颂圣骂己，把臭的说成香的，同样可以金声玉振。化难为易之外，还可以加两种次要的，一是小至一字一词的不含糊，二是成篇之后要有味儿，即用鼻子嗅也感到不坏。说这两项次要，是因为要求太高，不容易，也就只好放松。

其四，用的另一面是舍。这主要是内容方面。八股文的皮肉是代圣贤立言。为什么要这样？显然是活圣上爱听这个，所以深入到骨，不过是君王爱听什么就写什么而已。这样看，不管形式而专问实质，古往今来，各种体裁的八股就太多了。太多，是因为可以多获得钱和权，以及世俗之名，等等。也有所失，是经常要把自己的所想藏起来。如果相信文者也是志之所之也，那就要走舍八股一路，即说自己的，不看在上者的脸色行事。这大概不容易；不过，如果相信志比八股的所得更贵重，就只好勉为其难。其次应该舍的是表达方面的程式化（布局方面）和气势化（格调方面）。这两化都离不开造作，也就不免要牺牲思路的本色和语言的本色。我觉得，为文有如为人，以本色为上，那就思路应该行云流水，行文应该平实自然，更通俗些说，应该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这看似容易，其实不容易，那是因为，真八股寿终正寝，还会有八股精神以及准八股精神

作祟,举例说,上场就某某教导说,紧接着还要来个必须指出,不就是八股的阴魂不散吗?所以心里应该办个法会,驱除。此外,还有在内容和表达的夹缝中的,是大家熟知的空大假。说了等于不说是空话,芥子说成须弥是大话,顺风臭十里说成逆风香百里是假话,三种都是八股的拿手戏,会随着八股的形体之亡就无影无踪吗?我看未必。所以应该以八股文为镜,将成文,已成文,都照一照,没有,大佳,有,就坚决消除。或曰,已经到了家用电器充满居室的时代,哪里去置办这样的镜子?曰,启功先生这篇《说八股》之所以有大价值,其原因中的一个较重要的,就是给大量的鄙视八股而未识八股真面因而笔下不免掺有八股的人送来一面镜子。送到,有一句启功先生该说的话他没说,我要补微,说,常常耍笔杆儿的诸位,来,照照吧!

## 八 股 新 论

金 克 木

### 引 子

在下忽然不顾衰年，不惜余力，作文论八股，真是何苦来哉！不免照八股格式先“破题”。

问：何为而作此论也？

答：不是作挽歌，是作悼辞。无挽留之意，有哀悼之情。悼两千几百年来“士”的读书应考做官的道路与八股同亡，五百年间文体传统结晶木乃伊随八股化为乌有。多少年，多少人，“枉抛心力作词人”。今天，八股之名，知道的人不少；八股之文，见过的人只怕不多了。考试虽存，大非昔比。科举与文体虽是学者常识，未必为一般人注意。何妨略说，分作两股。

春秋时代，诸侯争霸，招贤纳士，出现了一条不由血统或战争而能参加统治集团的做官道路。走这条路的人中名声最大的是孔子。他周游列国，提供咨询，传授门徒，著书立说，尊为圣人。战国时代，这些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声势浩

大,最后一名是秦始皇的丞相李斯,辅佐皇帝统一天下。秦代统一文字,设立官学(博士官,“以吏为师”),堵塞了游学游说的进身之路。西汉时代,保留博士传授官定“经”书。另辟非由血统或军功而能做官的道路,即地方名流推荐与皇帝当场面试相结合的“选举”。殿试献策最有名的是叔孙通、贾谊、董仲舒。东汉时代,民间讲学之风大盛。做成或做不成官的读书人成群结队议论政治,和掌权太监进行激烈斗争。魏晋六朝之后,唐代规定文人单由科举考试做官。虽是单行线,仍须大官推荐,未灭汉代“两结合”余风。宋元明清这一千年内读书做官的人便只有应考的一条路了。考试科目中,历代都保留了春秋战国和汉代的廷试对策。可是长期都不重视,徒有虚文。所重视的是另外科目,出题作诗文。唐代重诗,宋代重文。宋代开始考“经义”,摘《五经》句出题,要求考生作文解说。南宋朱熹编订《四书集注》,将《论语》、《孟子》两书和《礼记》中《大学》、《中庸》两文合编加注。元代开始考“四书义”,从《四书》中摘出考题而以朱注为解说标准。明代确立文体,就是通称的八股文。考试科目不是只有八股。做官道路也不是只有应考。在清朝做官就有血统、军功、科举、捐纳、保荐这几条路,都是古已有之的。

汉文文体的发展和这条读书做官道路密切有关。汉赋、唐诗、宋文都为做官扬名所必需。八股文体兼骈散,继承了战国策士的言论,汉魏六朝的赋,唐宋的文,而以《四书》为模范。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

部汉文文体传统。八股文结构不是仅有八“股”。它的开头是“破题”，接下去是“小讲”，随后有八“股”分作四对的“比”。“起比”、“中比”、“后比”加上“束股”一对。各“比”之间还有联接承转的话。“比”后是结语。全篇本来只有二三百字解说《四书》义，体式定后越来越长。清朝先定五百字，后限七百字。全篇文意不许越出题外。但出题是《四书》句，一句、半句、几句、全章都可以，上下不连气的“截搭题”也可以，所以不许“犯上”、“犯下”，又不能不照应小题目的上下文。结构之外，传统各种文体有不少特点在八股文里集中了，凝固了，于是僵化了，成为木乃伊，不能变化发展，又捆在《四书》上不能动，所以一废科举便消灭得尸骨无存了。

以上两点悼意化为下面四篇文章。

第一篇是《八股评罪》。八股有功没有？不成问题，没有。八股有罪没有？不成问题，有。问题在于有什么罪？有多大罪？我不会作评价，也不会作断语，只是考察一番，并举八股片断为例。例子是清代诗人王渔洋（士禎）和袁随园（枚）的。

关于八股本身，只作为文学现象来考察。有两篇，分论《八股文“体”》和《八股文“心”》。这可以算是两股。从两方面说一些不知有没有人讲过的话。举的片断八股的例子是明代汤若士（显祖）、徐文长（渭）和清代尤西堂（侗）、高兰墅（鹗）的，兼说“红楼外史”高君的词以为对照。还引《论语》一章以见八股结构之源。

八股与《四书》不可分。《四书》不但出八股之题,而且出八股之体。八股文又叫做“四书文”。《四书》是朱晦庵(熹)的“述而不作”的著作。元明清五百多年间这是“显学”,但又可以说是“晦学”,因为一者是晦庵之学,二者是明受尊崇,实作招牌,真意不明,以致八股一废,晦庵之学随之而晦。究竟《四书》和八股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实际意义或功能或体式是什么?也许还是晦而不显,需要费力探索。因此,最后一篇是《四书显“晦”》。前文引过《论语》中一章。这里再引《孟子》的片断。为说明八股实有和皇帝对话的对策性质,引了清顺治六年状元刘克猷(大壮)的殿试考卷答“策问”中的精彩部分。由此可见从《四书》到八股的“一以贯之”。

以“八股”为题,始于“评罪”,中辨“体”“心”,终于“显晦”,取名为“论”,实是闲谈。能力有限,又不能去图书馆查考群籍,八股取材多出于清梁章钜的《制艺丛话》,更受限制。不过,不同于八股的只敷衍旧义,而对少量“取样”加以剖析,说是“新论”也许还可以。这两个字又是抄汉代桓谭的书名,用来作题目也合乎八股题必引现成文句的规定。我当然决不是妄自比拟古人,也未见过那部失传的古书,这想必是无需声明的。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 八股评罪

八股定罪已久,还有什么可以评说?

自从本世纪初清朝廷废科举以后,八股文销声匿迹。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汗牛充栋的八股文选本和《闾墨》(考卷刊印本)以及为作八股用的入门书参考书忽然之间消灭干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更是“臭名远扬”,“永世不得翻身”了。何必再提?

八股文从前称为“时文”。名家的文集都不收容。刻印“时文”稿也另作一集。乾隆皇帝钦定官修的《四库全书》只将明朝的八股文选出一集作为标本,其他一概不收。可见最高主考皇帝并不认为八股文是上等文学,名义上尊崇,实际上鄙视。奉诏编这部选集的方苞是清朝“时文”一大家,又是“古文”一大家,桐城派的开山祖师。连他也不重视八股。在搜罗他的集外文的《方望溪遗集》中有篇《李雨苍时文序》,开头便说:“余自始应举即不喜为时文,以授生徒强而为之,实自惜心力之失所注措也。每见诸生家专治时文者,辄少之(瞧他不起),其脱籍于诸生而仍如此者尤心非焉(嘴里不说,心里不赞成)。”他还在别的文中鄙薄八股,明显认为这只是敲门砖,中试“脱籍”做了官以后就该抛弃。此外对八股不满甚至声讨者更多。大学者如顾炎武,在学术

著作《日知录》中，大文人如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各自发表了不同的谴责。由此可见，八股的地位表面上极高，实际上极低，所以一旦不用于考试做官立刻便成废物。唐朝人应考的诗，宋朝人应考的论，还能流传，与八股大不相同。八股已成垃圾，还有什么可说？

然而在五百多年的长时期内，无数读书文人为学作八股而花费无穷心力，这岂不是一大文化现象？读文学作品当然选高而弃低，研究文学史都要“细大不捐”见其全貌，以免依据片面便下断语不能恰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古文家王安石的。为什么八股要请他为祖师？“拗相公”王老先生确曾讲过经义，有新说，但留下的“经义”文大概是托名代撰的。陈言老套的八股为什么要以他为旗帜来标榜？八股是不是“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原形不出世，“元神”未必散，岂可置之不理？

要追查，首先要论罪名。不是洗刷而是定罪量刑。一笔抹杀不是理想的办法，而且往往没有实效，甚至适得其反。

八股的罪看来不过这么几条。

一是限制了思想，其实只是限制读书人的思想，限不住文盲。指定《四书》加朱熹的《集注》为标准，不许“越雷池一步”。于是别的书都不读，不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头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徐灵胎《道情》）。于是思想不出《四书》，祖师只有朱熹，思

想都僵化了。

二是糟踏了文学,其实糟踏的是书本上的文学,毁不了口头流传的文学。读书人钻研学习刻板定式的八股文加上同样刻板定式的试帖诗,头脑僵化,不仅不会灵活思考,而且不会写文章。八股文只要调子对,不管语句是否通顺。“天地者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久矣夫,千百年来已非一日矣。……元后即帝王之天子。苍生乃百姓之黎元。庶矣哉,亿兆民中已非一人矣。……”(见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丛话》亦引)这两股文何尝不对仗工稳音调铿锵?这样堆砌相同词句作花架子,摆气势派头,岂不是“干净彻底全部”的废话?这样的“时文”占了读书人的时间精力,占了文学的上风,诗词歌赋论文小说由八股文人去作,还能有八股老套以外的新发展?

三是害了朝廷,毁了国家。以八股取士,中进士点状元的都是书呆子,会作破题、小讲、对偶,不懂治国安邦,背诵经书,不知实际。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怎么能办好事?对外不能抵抗外族,让皇帝安稳坐朝;对内不能振兴经济,让朝廷多收赋税;朝廷用的都是这种书呆子,江山怎么坐得稳?老百姓更不必说,在这样的大小官儿的治下,只有倒霉受苦,有冤无处诉。翻来复去背诵模仿《四书》和朱注文句,一心揣摩皇帝恩威,考官好恶,当时风气,文章作不通,官又怎么当得好?“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徐灵胎《道情》)

一伤思想,二害文学,三毁国家,八股的罪名不外这样三项吧?这都是事实。几乎是从有八股以来就有反对者。他们的说法未必有多少在这以外。现在八股已经“盖棺”,这也成为“定论”,并没有错,用不着翻案。但是我们不应停留在这里。当八股“在朝”行时之际,指出缺点,说它坏话,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都好。当八股已经“入土”或“火化”之时,作“史臣曰”的论断就需要全面一点,客观一点。仍然持一面之词就不妥当,而且也不是前进一步深入一层了。判罪之后就要量刑,那就不应该是一律“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了。不妨摒除意气考察一下八股的罪行究竟有多大。

首先是八股亡国论。这个罪名太大,帽了不合头。文章和书本和以读书求做官的人都没有那么大的本领。中国历代社会中的思想文化不是占人口中极少数的识字读书人能包办的,不是更稀少的哲学家思想家能全部代表的。八股文不过是上骗下、下骗上的蒙混人的工具,负担得了那么大的责任吗?八股四书文起于元朝,是由蒙族皇帝批准推行的;成于明朝,是中期才完成的;以后到清朝,由满族皇帝制定程式体裁,还陆续有小的变动;到道光以后就衰微了。光绪时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无心做八股了,取消八股是顺理成章的了。蒙族、满族以及明朝汉族的皇帝中有哪一位是会作八股的?仅仅是乾隆皇帝喜欢舞文弄墨以配合或粉饰他的“十大武功”,下诏出了些主意,那也是给人家去作,和自己不相干的。对国家兴亡第一要负责的不是皇帝吗?他们都不是八股文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决不应当

把匹夫之责和帝王将相之责等量齐观混为一谈。

明朝八股兴盛,汉族朝廷亡于满族,所以明清之际的读书人把明亡的罪责一归之于王阳明(守仁)的讲“良知”的哲学,二归之于八股文章。读书人总喜欢过于看重书本,不读书人又对书本有神秘感,所以书本不是被吹捧得过火,便是被咒骂得难听。书本力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是有限度的。不是书本自身起作用,更不会突然见效。明朝之亡是亡于皇帝太监的腐败。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他自己应负最大责任,不能怪八股。洪武、永乐两位开国皇帝是雄才大略得天下,残暴统治定天下,不是仗八股文。永乐皇帝的得力军师是和尚姚广孝,与八股无关。不上朝而修定陵的万历,刚愎自用又多疑残杀大将的崇祯,游江南的风流少年天子正德,信任乳母客氏及其“对食”配偶太监魏忠贤的天启,这些皇帝和另一些多半年纪轻轻只知玩乐把国家事推给太监和大臣的皇帝之中,有哪一个是会作八股的?恐怕连《四书》也不会读。刘瑾、魏忠贤等掌权太监未必认得多少字。严嵩和张居正等大臣会作八股,他们为自己和为朝廷搜刮老百姓的本领是八股教的吗?《四书》说“省刑罚,薄税敛”(《孟子·梁惠王》),他们照办了吗?明朝之亡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等人的起义。这些起义军人不但不会作八股,而且是痛恨八股文人的,因为文人是做官的胚子,欺压农民的预备队和啦啦队。起义军中的文人如牛金星、宋献策也不是八股好手,未必奉《四书》为宝典。明朝之亡又亡于满清。入关的摄政王多尔衮,率兵南下灭明屠城占地的豫亲王多

铎,帮助清兵得天下的吴三桂、洪承畴、范文程,哪一个八股文人?反过来,八股文人中效忠皇帝死而不悔的书呆子倒不少。例如拼去十族来多管朱家皇帝的家务事的方孝孺,谏皇帝而惨死的杨继盛、杨涟、左光斗以至于清朝的大时文家大古文家方苞都是。方望溪(苞)老先生只因文字狱中犯人戴名世的《南山集》内有一个方孝标被认为是他而下狱,几乎处死。皇帝知道了,不但不平反,反而“加恩免死”,叫他到“旗下”去给满人当奴隶。他能教王子念汉文书,却又好多嘴管闲事,得罪了几位王爷。幸而皇帝知道他的为人,免了奴籍,还给官做。他仍然“直言敢谏”乱出主意,终于归老林下,算是逃得了个“善终”。究竟他对于乾隆朝的治或乱起过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句评语:呆里呆气好多讲话,不过还是为皇上好,是忠君的。如此而已。这些俱见全祖望给方苞作的神道碑,大体事实不会假的,否则怎么能堂而皇之在墓前树碑。何况全祖望是黄宗羲一派的史学家?方苞命途坎坷,除文章外并无什么建树,对清朝的武功和内忧外患说不上影响。

总而言之,八股对国家社会有害,害处首先在读书人身上,对于不读书不识字的人,占多数的人民全体,为害没有那么大。八股的兴盛时期,起作用大的年代,不过是从明中期(成化、弘治)到清中期(道光、咸丰),即十五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大约四百年左右,明清之间还中断了一段。这时期民间文学发达,反八股的一部分文人异常活跃,逐渐形成了极有力的新思想、新风气。这已是现在人的常识,就

不必多说了。“老门生三世报恩”，“钝秀才一朝交泰”，写的不就是这时期的八股书生，不就是描绘他们的文学作品吗？朝廷皇族的更迭不等于国家的兴亡和社会的变革，书本及文人也不等于国家与社会，这还用说明吗？用不着了吧？若是国家兴亡由于八股，那么，清末八股消灭了，中国怎么不见兴盛起来呢？其影响所及不过是文事而已。对于其他只可能有间接影响。

八股误国论的又一方面是说朝廷以八股取士做官，以致大小官员都是书呆子，所以皇帝亡国社会退化。这也有事实为凭，但说法很不确切。由八股考取做官的并不全是书呆子。忠臣奸臣能干人废物都有。八股只是敲门砖，不能限制人做官以后抛弃八股发展才能。方苞说过，唐宋古文八大家中除苏洵一人以外都是早考中做官的，所以可以在做官以后抛弃时文作古文。（苏洵是苏东坡的父亲。《三字经》中说：“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这种说法还不能减轻多少八股之罪，因为毕竟是读《四书》学八股的书呆子比聪明人多，做不成官的比做成官的多，坏人和无用之人比好人和能干人多，用八股敲开朝廷之门以后发展才能的人少。要定罪大小需要考察中国两千多年来帝王将相和道府州县“父母官”统治机制及其运转的实际。为什么明清几百年乃至秦以来两千多年用书呆子废物做官的多，而居然一代又一代能机制不变，照样维持统治，而且农民起义成功以后还是照样不改变机制只换人呢？不说原理，只看事实。原理普遍适用，事实是中国自有特色，非罗马帝国

可比。

从秦始皇到清宣统,高踞统治全国宝座的帝王将相并不是科举出身,像明朝张居正那样的极少,这不必说。重要的是直接治民的地方官。这些官中糊涂的多,精明的少,能为老百姓办点好事如开封府尹包拯和海瑞、况钟的“清官”更稀罕,但是统治仍旧能长期巩固,为什么?有人埋怨中国老百姓太老实,软弱可欺,有人以为由于孔子老子教导了文官而其他圣贤如墨子等没起作用。不知那些只靠耳闻目睹和传说及习惯生活的不识字人并不知道圣经贤传那一套。把责任推到受害人一边,不说是为害人者开脱,至少是不合事实。官是只知捞钱,对上“多磕头,少说话”,对下多讲话少办事的,例外很少。统治不能只依靠他们。在统治机制的运转中起作用的也不是他们为主。还不可忘记,汉朝有藩王,唐朝有节度使,宋有藩镇,明又封王,亡国时有福王、唐王、鲁王、桂王,这些都是地方官管不了的。清朝中央集权不封王类似秦朝,但人口增多,社会复杂,所以统治机制也复杂化了。地方上汉人巡抚位高责重而权小,藩司理财,臬司秉刑,大权在统领“旗下”军队的满人总督“制军”手里。各处重地的“旗下”驻军是地方官管不了的。到太平天国时,汉人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是在已被或者将被起义军占领的地区活动起来的。清军统帅本是满人胜保和蒙人僧格林沁。洪秀全和曾国藩从不同的双方在十几年间削弱了满清朝廷的原来统治力量。太平天国亡后,汉人掌了军权,当上了有名有权的总督。淮军接替了湘军,李鸿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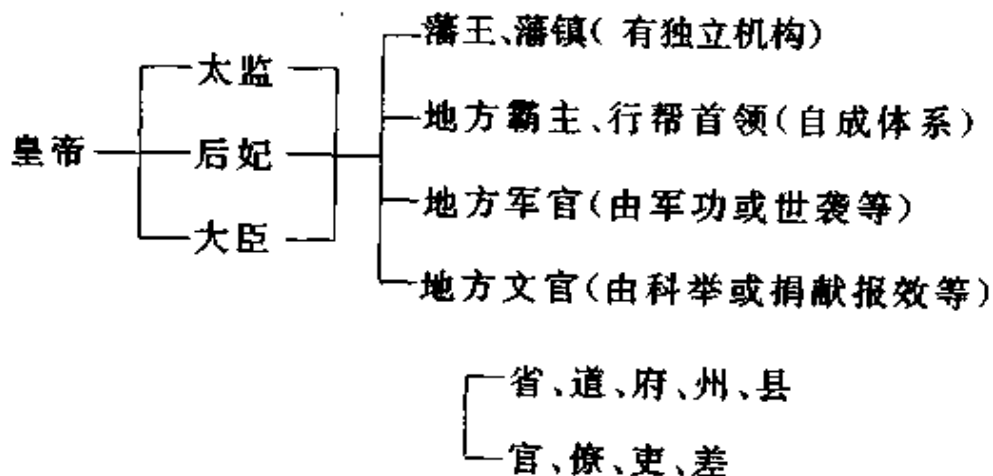
继承了曾国藩，又培养了袁世凯练“新军”，终于乘民军和新军起义之机代替了清廷。无数的地方小皇帝公然出面代替了从西周以来的天子。事实上，不论有没有一统的皇帝，从周秦汉以来就是这样的实际统治机制。书生贾谊上《治安策》所“痛哭流涕长太息”的就是天子统一的还不够。他想恢复秦始皇的一统中枢独治江山而以“仁义”为方略。这是地道的书生之见。汉文帝知道实际，所以称赞他而不用他，派他到长沙去了解藩王真相。汉景帝用晁错削藩国失败了。直到清初废三藩，还和吴三桂打了一仗，才去掉了高层的土皇帝，但并没有改变机制。要动摇这个政治体系非有更大得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并储备足够的人才不可。这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办不到的。因此，把帝国王朝的几千年传下来的统治要科举出身的八股书生文官全面负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皇帝在上面靠周围的后妃太监大臣，在下面倚仗什么人统治的？其一是官，文官武官大官小官都在内。其二是僚，是官的辅佐，也是实际起作用的。三是吏，是无官之名而有官之权的执行者。四是差，名为“役”而实是老百姓头上的顶头“父母”。所以官中的读经书作八股的书呆子只是这官僚及官吏加官差机构中的一小部分。他们离不开僚吏差出主意办实事。他们难得行善而作恶多端，但不能把罪恶都要他们承担。责有大小，罪有轻重，八股书生占的一份不会很大。

文官的“出身”，汉代是经地方绅士名流推荐，考核在其

次。唐代是经过科举考试,还要加上大官推荐。宋元明清都是以科举为正途出身,但旁门邪道不少。明清考八股而捐官不断。不能说当文官的个人会作八股。所以八股有罪,但不可扩大,扩大了,就减少其他罪犯的负担了。

两千多年的帝国统治机制以人为主。人在机制中的地位关系推动其运转。可列简表如下:



这些人中多半读书识字,所以老百姓很容易把书生和“官家”等同起来。治国和做官需要用文字通信息,但主要依靠的不是文字,一看《尚书》便知,越古越是这样。春秋战国时言语和文学并行,“言语”仍比“文学”优先,由《国语》、《国策》、《春秋》三《传》可见。孔门四学科的排列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

在这样的政治机制的运转中,无论采取什么方式作升官途径,实质不变。文学上考什么体裁,用赋,用策,用诗,用论,用八股,形式变化,实质效用变动很小。会作诗赋比会作八股四书文讲经义究竟哪样好些?对于做官和进行统

治都一样,差别有限。不过诗还可以作为交际应酬工具,对个人说比较优越些。会作策论,会讲治国安邦大道理,讲经论史头头是道,难道就能治国家管百姓?他去做官还是得依靠幕僚、胥吏、差人,还不能得罪那些管辖不了的地方霸主,少不了“护官符”。汉代萧何本来是吏,后成为宰相。《水浒》的宋江也是“郓城小吏”出身。京剧《四进士》里的宋士杰是被开革的小吏,会打官司,告倒了几员大官。包公也得有王朝、马汉当差抓人。张良是幕僚。李鸿章也当过曾国藩的幕僚。张之洞的幕僚中更有些近代名人。僚、吏、差都是专业化的,世代相传。差是奴隶,入另册,不能应考。僚是要学的。清代书中常有考不中便去“学幕”的话。“绍兴师爷”天下闻名。他们是“刑名”师爷,是问案子“司法”的,不但要懂得“律例”,还得有机谋,会从案子中为官为自己谋取利益。秦汉开始要人“学律”。“刑名”之外,以清代为例,还有“文案”师爷,是起草公文,当秘书兼参谋的。“钱谷”师爷是收赋税造假账的能手。这三类师爷都是要学习多年,有门户,有帮派的。除极少数能干的官以外,“官”总是以“僚”为灵魂,以“吏”为手足的。明是官使用僚和吏,实是僚和吏操纵官。秦始皇规定学律准备当官吏的“以吏为师”。“吏”(当时包括官)是官中之官,是官的老师。这一行是秘传的,没有课本。官出缺,有僚和吏可以“署理”代行,衙门不会垮。光杆子官,没有僚,没有吏,再没有差人、随从,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衙门不能发挥任何统治机能了。

八股时文不过是明清两代考试做官的工具。要说清楚

其政治机能不能不从明清上溯到秦汉的做官途径，亦即统治者维持其统治机制运转的人事新陈代谢方式。由此才可以定八股的“助纣为虐”罪的大小。八股里虽然包含着官和僚的秘诀，如揣摩题意，分析圣言，讲漂亮空话，装腔作势之类，但一般读书人学不到，起的作用不大。至于八股本身对文学及思想所犯下的罪行是一言难尽，但也不妨略察数例，只看清代前期。

清初蒲松龄是《聊斋志异》作者。他屡试不第，到古稀之年才得一贡生，相当于秀才。这是八股之过吗？八股影响他做官，并未影响他作文。《聊斋》是叙事为主。八股不叙事。他会作骈文。《聊斋》的《自序》中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八股是和骈文通气的，“八比”对偶即为骈体。《聊斋》中仿《史记》“太史公曰”体的“异史氏曰”和八股的“小讲”往往类似，一句一转，有起承转合。在《司文郎》中说到有趣的“破题”。不少篇涉及科举，对考试及考官颇致不满。从这些可以看出，他作八股文应当是同样有才华的。他应县考、府考可以高中，到省考即落第，说明决非八股文章作得不好，也不能全归之于命运不济，而多半是他的文章才华外露不合时宜，主司不肯或不便录取，甚至不能欣赏。《聊斋》中已有牢骚，书外另有一故事可证。

相传明万历时有一次试题是《不能死，又相之》。题出于《论语》，是有人批评管仲说，他本是公子纠的臣子，公子纠被齐桓公小白杀了，他没有殉节，反而归降了小白，当宰

相，辅佐他成为五霸第一名。考生中有一人自认文章好而落第。领回考卷一看，原来有一段对偶被一位房考官点断了句子。这人见“也”字就点断为一句，成为“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在上面批了“费解”二字，只说难懂，还没说不通。其实这两股“起比”应当读作：“既为纠也臣，则宜为纠也死。既不为纠也死，亦不宜为桓也相。”明白如话。古时在考卷中和记这故事的《丛话》中都是不圈点断句的。如我看的不错，这段文实在不难。“也”字当作衬字，不在句末，《论语》里就有“柴也愚”，“回也不愚”等等，所以并不难读，而考官竟不懂。蒲松龄若屡次碰上这样的考官，分在他的“房”里，他的不同寻常的骈文和拟人的笔调不中式是可以理解的。这不是八股文体之过。他的屡不中还屡赴考也可以理解。据说明朝有个唐皋也是屡考不中。他自己在书斋壁上题了几名话，也是对偶两股。“愈读愈不中，唐皋其如命何！愈不中愈读，命其如唐皋何！”后来竟中状元（《丛话》）。蒲松龄的赴考大约也有这种不服气之意。倘若他中了状元，做了大官，也许就不会写《聊斋》，至少很难写出《司文郎》那一类的妙文以及许多牢骚和谴责了。即使考试不用八股，他不作八股，也未必就能多写好书好文。这不是空谈，可举一例，蒲松龄的朋友王士禛，即清初有名的诗人王渔洋。

渔洋山人王士禛中进士，当尚书，还有谥号王文简公。他当时是诗坛盟主，提倡“神韵”的诗论，看过《聊斋》加批语，也写过类似的《池北偶谈》。他的八股文怎么样？引一

段为例。题目是《考诸三王而不缪(谬)》，出于《中庸》。原来的上下文是讲“王天下有三重焉”。朱注引吕氏说，“三重谓议礼、制度、考文”。题的上下文是“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这是《中庸》的语调，口气很大。《大学》说“平天下”。《孟子》还在讲得天下，定天下。《论语》说“天下”指的是周朝的天下，仿佛现在说世界。《中庸》说“王天下”和《孟子》不同，好像是天下既已定了。也不是《论语》中的周朝天下，周已归入“三王”成为过去了，此时至少已到战国末期，甚至是秦朝，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了。此题只是中间一句，“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三朝也是“三统”。王士禛的文中结尾两“比”如下：

夫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古之人垂以为训焉；而君子之不缪顾如此，则道之隆也。道之所在，三王治其先，君子治其后，合三统以成三重，而知《谟》、《诰》不必相袭，统以至人之学问而适见其同。

乾道资始，地道代终，古之人效以为则焉；而君子之不悖固如此，则道之至也。道之所在，天地为其隐，君子为其著，合三重以立三才，而知坛圻所以报功，配以王者之功名而不以为僭。

这里一点“神韵”也不见，只是贯串全章之意去阐发这七个字的一句题，其实是重复述说。他是中式做官的，不必天天忙于练习八股去应考了，有充分精力作诗写笔记小说。然而他的八股既不见才气，小说又赶不上《聊斋》，诗的理论

虽高，作品却不见高超，轰动一时，随即与一般诗人为伍。唱和很多的名诗《秋柳》，开头是“秋来何处最销魂？残照西风白下门”。很像“破题”。不过以“白下”（南京）隐指南明之亡，暗示遗老之不幸。这就是《秋柳》的“神韵”所在吧？可见八股作得多少，官运是否亨通，与诗文成就高低没有必然联系和重大影响。说不定蒲的不中反而比王的中式做官为幸运，当然这只是指文学成就而言，生活上就差得远了。

再举一例是袁枚。这是个风流才子，早考取进士，做了一任知县以后便辞官不做逍遥自在。他的诗名很大，比他的前辈渔洋山人似乎还传得较久。这也许要归功于他的《随园诗话》。他的诗论是将王渔洋的“神韵”改为“性灵”。两人都好像是针对八股文和试帖诗而发议论。袁和王一样是诗作比不上诗论。他也写笔记小说《子不语》，记“怪、力、乱、神”，仍赶不上《聊斋》。他会作骈文，也作“古文”。他的两段八股和王的那两段一比，笔调不同显而易见。一个拘束，一个流畅。王渔洋作《中庸》题，原来上下文及全书都是向有天下者献策，而王只拘守题目。袁作《论语》题《宽则得众》，讲帝王要对臣下及黎民宽厚，不要苛刻，这样才可以得到众人，使“天下之民归心”。袁文有两股如下：

当缔造之年天意苍茫，谓帝王之自有真，亦群雄所不服。乃数年而刻诈者败，又数年而失事机违民情者亦败。后舞前歌而登封受禅者仅一人焉。夫用人不过爵禄，杀人不过兵刑，何足消磨豪杰哉？及父老携杖而谈王风，史官援笔而为实录，不得不推本于豁达为怀，

推心置腹，当机立断，正直无私，以为有此数大德而当年足以平矣。

在委裘之日宝篆初膺，谓中兴之自有期，亦官家所乐闻。乃误于刑名法术者半，误于宦官宫妾者又半，风雨下通而馨香上奏者仅数君焉。夫前有祖宗之忠厚，后有子孙之经营，此际尤征学问哉！乃诏诰之事已烦，起居之注已定，莫不叹为法网何疏，嫌疑何寡，早朝宴罢，簪笑皆严，观其行此数十年而太平不必问矣。

袁不显用典而露才，王用经典语以炫学，两文正像两个人（不一定是两作者自己）。题目不同并非主要。一题“三王”，一题按上文也是讲夏、商、周。王拘泥于经。袁纵横于史。王的两股有点“合掌”重复。袁的两股，一说创业之君，一说中兴之主。他把汉高祖的“豁达为怀，推心置腹，当机立断”都装进去了，又把“刑名法术”和“宦官宫妾”等不是上古三代的事也装进去了。当然，王的题点出“三王”，袁的题没有明说主语，所以王不能讲以后历史而袁可不顾时代，但文章的语调不同不能说是只由于题目。袁用“委裘”，指先帝已逝，新君将立，典出《汉书》，不能望文生义，此外都好懂。全段文暗指一些史事，不知道也可以读下去，如同说话。王的文不然。读“监于有夏，监于有殷”，就得知《论语》里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读《谟》、《诰》就得知《尚书》中有《大禹谟》、《皋陶谟》以及周朝的《诰》。还有“乾道”、“地（坤）道”又得知《易经》。“三重”见上文。“三才”是天、地、人。所有这些在当时是常识，在



今天便会成为读文的障碍。古人诗文不用典的极少,越到后世越近于不可能不用典故和成语。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明显用典,不知典故就不能懂。一是暗中用典,不知典故也能读下去,不过可能误解。前者典雅,后者流畅。像八股这样死板拘束的文体中仍然有这两派,可见文体不能完全拘死活人。正如同词曲字字都考究音韵,仍然可有各种风格出现一样。汉文古典除了《诗》、《书》、《易》、《春秋》、三《礼》及较早的诸子因为前无古人或少古人而大致不定文格以外,以后便由这些作品树立文格。虽有变化如诗体变为五、七言以至长短句词曲,文分出四六言骈体及散体,但格式总是越来越繁越严,到八股而登峰造极,只有僵死的结果而别无出路了。说这是汉文文体发展的结果之一可以,说这是八股之罪也无不可。同时,从前面引的一些八股中可见词句总有别扭不通顺处,这是八股的通病,只讲腔调和字句格式不顾文法。例如袁文的“何足消磨豪杰哉”很顺。对句“此际尤征学问哉”就显得勉强。有人说文“不通才得中”,虽是激言,并非虚语,所以考卷“闱墨”少有好的,不如平时“文课”。

八股,甚至古代汉文文体的多数,有一重要情况是用于考试或上下对话。八股和《四书》流行几百年,本身不会有多少对国家社会的功罪问题,但对人说,用以应考就不同了。蒲松龄的考卷看不到了。上面引的王渔洋和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是否能中,那就要看一时的风气和主考官(代表皇帝)的好恶标准了。“房考官”是否看中推荐也很重要。

有人喜此,有人喜彼,这在古时叫做命和运气,今人可以叫做机会或“随机性”,佛家称为缘分,是难以预定的。《聊斋》里这类故事不止《司文郎》一处,蒲老先生想必是有感而发。倘若他做了大官就不知会怎么写了。王尚书士禎的《池北偶谈》中有什么这类例子,我记不起来了。

为了显出僵死的八股文体在有些人笔下也能发挥一种心情,多少有点“言志”的气息,再抄两段。

袁枚有一篇八股,题是《学而优则仕》。这出于《论语》,是孔子的门人子夏(卜商)说的,现在人还知道这句话。其中有两股,一说不学而仕不行,一说学不优而仕也不行。必须照说题意,又可借题发挥。

岂无豪杰之流不学而亦多事业? 不知:有才不学,则仓猝立功,纯杂与古人分半。无才不学,则奉行故事,功名与胥吏争长。君子以为,不学而仕与不仕同,学而不仕与不学同,故辞僚友而不疑,当大任而不动。其一仕也,上以报国家养士之恩,下以雪处士虚声之耻。

岂无迂阔之士信学而反多拘执? 不知:误以为优,则得诸野者必失于朝。不待其优,则贫于身者岂富于国? 君子以为,吾甚爱学,尝愿不优以留其学,吾尤爱仕,尝愿不优以重其仕,故郑重以赴功名,即酝酿以成雷雨。其一仕也,大则竹帛表生平之经济,小则文章抒黼黻之英华。

这不需要解说,更不需要注译,略知文言就可以读懂意

思,熟悉文言更能够欣赏其笔调。当时未必讥讽,但现在若用口头语说来说不定会引人发笑,还是在板面孔的文言中见笑意为好。题只有一句,所以只针对为学而当官的。再加一句“仕而优则学”,自然还会是强调学,又针对当官不学的了。子夏的原话可以有各种讲解。应考当然只能照朱熹的注,自己写文章就可以和骈文散文一样发挥。两股文中有些句子是本身相对,所以和另一股中的本身相对的句子字数不同。这是八股允许而四六律赋所没有的。这是紧中有松,便于发挥。

总而言之,从文体方面说,八股有罪可分两股说。一是这文体集中了汉文作文传统中的一些习惯程式又固定下来,达到极峰,因而僵死如木乃伊,不能再有发展。二是它成为中国科举传统中最后的限制最严的工具,又重腔不重意,不顾词句通不通,只准代言,不许露出己意,在狭隘天地里捉摸转圈子,于是重复说空话废话,对皇帝说假话,成为习惯,出现定式,永恒不变,因而也成为木乃伊。可惜人是活的,人活了,八股就死了。

## 八 股 文 “ 体 ”

讲到八股文本身,可以分两方面谈论,一是体,一是心,或者说是形和神,即文的“体”和文的“心”。

说形体又可分两层。一是文(语言)的形式,一是文(语言)的功能。实际上两者很难严格分开。

先讲形式,论八股文“体”。

中国汉语用作书面语言的文字是表意的单音节符号,和记音的拼音字母不同。这个特点使书面语可以独立发展,可以比拼音文字的书面语离口头语更远,仿佛成为另一种语言,也可以上口,但不能充分发挥口头语的功能,却可以有口头语所没有的功能,如文字游戏。从开始在龟甲兽骨上灼刻文字连缀成文句起就可能已和口头说话的句子有区别了。这区别比用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大。拼音文字不能大量只用一个字母或一个音(音节)作独立的表意语言符号,而汉字却可以。用拼音字母的语言表现词的转换和关系是用语尾变化,如梵语、拉丁语,或用词内音节变化增减,如阿拉伯语,其书面语要记音,都不能像汉文即汉语书面语这样以单音字为基础而本身变音或字与字连缀而变化。单个汉字可以或拼凑或分裂辗转孳乳变出很多样子,而且可以借用或转用,一字而多形多义,或者多字多音而一义,或者简化多字多音为一字,如“子”是“夫子”或“儿子”或“君子”,或者多字多音重复合成一义,如“伟大”,“在下(我)”,“云云”,而且可以一字本身变音或不变音而表达不同意义和语法作用,如“孟子见梁惠王”,“冉有季路见(现)于孔子”,后一个“见”字可不改音也可不加“于”,“解衣衣我”,后一个“衣”应改音也可不改。以单个音节的字为单位可以颠来倒去变换意思。句中词序既固定,如“子曰”不

能变为“日子”，又能颠倒，如“不我欺”即“不欺我”。可以变通，如“伤心”和“心伤”。可以缩短简化，如《论》、《孟》、《学》、《庸》。因地域广大方言众多以致一字可以各地各时读音不同而俱知其义。单字组合的成语和典故越来越多且有变换。虚字的或有或无也和口头语不同。书面通行语和口头通行语不一致，又如书面上可以简化词语及句法格式，成为通行符号语言，类似电报句子。如此等等。从一开始就独立发展的汉文，即书面通行语，在几千年间有很多发展变化。同是书面通行语的印度梵文和罗马帝国的拉丁文以及伊斯兰世界的阿拉伯文都类似汉字，而由于用拼音字母就没有用汉字才能有的一些花样。从比较语言学观点说梵语和汉语距离很远，但从文体学观点说梵文比拉丁文离汉文还近些。例如梵文诗中也有回文诗句，同音诗句，但总是别扭而且稀少，只算文字游戏，不能像汉文回文诗如“醒莫更多情，情多更莫醒”（纳兰性德）那样自然。梵文和拉丁文可以简化变化以便上口说话通行。汉文在口头上从来只能半文半白，很难用文言作长篇大论，上口就要繁化。汉文译梵文佛典往往可以逐字翻译，虽然古怪，仍能接受。例如“如是我闻”，去掉原文词尾，保存原文词序。由汉文译梵文便不行。如“道可道”，不加语尾便不可通，而又很难加。尽管梵文可以连用长复合词减去语尾仿佛汉文，仍不及汉文花样繁多，很难字字对偶。汉文的这种特色经历几千年，从甲骨文卜辞直到现代白话文，和文学形式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二十世纪末期汉文的这一传统才仿佛要同印度的梵

文一样“不绝如缕”，只怕到二十一世纪就会断绝，像古希腊文那样了。

八股文正是把这种汉文文体特点发挥到极端的典型。若没有汉文的这些特点就不会有八股文。怎么出单句、半句、截搭题？怎么作“破题”、“小讲”？怎么作整段对偶的“八比”（八股）？都离不开汉文特点。汉文能填充格式腔调似通非通而又通。戏词中有“马能行”、“地流平”、“开言道”之类。八股文中也有不少类似的半通句式。汉文容易“望文生义”，易懂又易误。这是难点，仿佛是优点，又是缺点。八股出题作文有时利用这类特点使人为难。清代一大文字狱即因八股考题“维民所止”被人告发为“雍正”砍头成为“维”“止”。

八股的特点首先是命题作文。出题和“破题”中花样繁多，非汉文不能有。例如，“子曰”二字可以出题。有名的“破题”是：“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现成的对偶句子成为“子曰”的恰当题解。前一句破“子”，后一句破“曰”。恐怕没有另外任何语言能照样翻译还成为这样有气势的文句。便是说成口头汉语也怕不行。“孔夫子说”怎么能是文章题目？只有尼采的书名《察拉图斯图拉如是说》可比，但也多了一个“如是”。有人汉译此书名为《萨天师语录》，这才像中国书名。“一个人成了多少代人的老师，一句话成了天下的大法”。这是日常口头讲的话吗？这怎么能独立？又如另一个故事说，《论语》中每章起头差不多都是“子曰”。前面为表明是另一章便加个圆圈，这个圈儿也可

作为题目。“破题”是“圣人立言之先，法天象焉”。说是圣人讲话(子曰)之前要模仿天圆的形象。还有，明朝诗人何景明(大复)是“前七子”之一，少年即出名。有人考他，出题为《梁惠王章句上》。这是朱熹注的《孟子》七篇的第一篇前半的篇名。何作的“破题”是：“以一国僭窃之主，冠七篇仁义之书。”前半指梁惠王是诸侯自称王，后半指《孟子》开头的标题。第一章中孟子开口便讲仁义，所以是“仁义之书”。照语法说这是一句，照文体说分为两句，互相对偶。诸如此类故事极多。其中的妙句一变白话就无意味，甚至不成文理，和《诗经》的“关关雎鸠”变成“水鸟(鱼鹰)嘎嘎叫”差不多了。

还有个故事。有个新任知府去谒见乾隆皇帝。皇帝问他出身，知道是监生捐的官，便面考他作“破题”。出的题是“周有八士：伯达、伯适(括)、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论语》)。皇帝还说已作上句是，“纪周士而得其七”，要他续下句。他随口对答：“皆兄也。”自然而准确。于是“龙心大悦”。没过一个月，这人就升了官。这里泄露了八股文体的又一特点是对命题的人作文。考官都是代表皇帝的，所以作文也是面对皇帝讲话。不论是直接间接，都要像孔子说的“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仿佛就在面前殿试，要“对大廷，魁多士”(《三字经》)。所以无论层层考试多么困苦，经受多少磨折，也有那么多人忍受，好像《圣经》中约伯接受上帝的考验。明末艾南英(千子)，清初蒲松龄，都有文描绘考场困苦。艾文详尽，见《丛话》，文长不录。

总之,八股文是汉文的文学语言和文体形式凝聚的样本,和用表意的孤立字形的汉文书面语密不可分,是不能翻译的,译出来只有无意思的意思。它本身的形式就是内容。汉文文学中很多这种情况,八股文是突出的例子。古诗文译成现代话,除讲故事和讲道理的以外,还像个文学样子能为现在一般人所欣赏的怕是不会很多了。汉文的这种书面语的模糊性和灵活性,起承转合的结构,抑扬顿挫的音调,在有意思又无意思、无意思又有意思的八股文中充分表现出来了。

现在讲功能。一方命题,一方作文,考生面对层层考官直到皇上,这就是八股的功能所在。功能决定文体,文体反映功能。

语言的功能是传达信息。没有信息可传达的语言便是废话。八股传达什么信息?信息都在题目里了,不许少也不许多,所以全篇都是废话。学作八股就是学讲废话,讲朱熹所解释的孔孟的话。为什么要讲废话?因为有人要听,要评论讲得好不好。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废话之间也大有区别。废话不废。学讲废话是一种训练,训练一种说了等于没说的说好听的话的本领。

传达信息必有双方,所以语言不论口头书面都是对话。自言自语是说给自己听,自己兼作双方。写稿时是作者,改稿时便成为读者。实际上写作时自己同时也在读。那么八股的听话对方是谁?作八股给谁看?向谁传达已经传出了的信息?对方是从阅卷的房考官到正副主考官最后到皇



帝。皇帝是当今的圣人。八股说古圣人的话给今圣人听。发蒙的塾师教作文和评作文时就代表圣人即当今的皇帝，并不是朱子，更不是孔子、孟子。有个故事（见《丛话》）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偶然有大臣之孙中式去见。皇帝叫他默写考卷，看后以为说错了。又调来进士前十名的考卷，发现都是一样说法，随即批示：十名都一样就不好处罚，若只有一个人这样讲就必定重罚，以后断不许讲错。文中之错确实是只有皇帝才看得出来而且认为严重的。原来题目是《子曰毋》，出于《论语》，是孔子弟子原思做了宰官，孔子给他“粟九百”。他不受。孔子说“毋”，不必推辞，可以给邻里乡党。这些文章都把孔圣人当作了有国君地位，又将鲁国君当作了周天子，全从国家公款立论，忘了那只是孔子说的话做的事，用的不是周天子的钱。皇帝自然要说是名分不对，借此立威，显出自己精明，使臣下小心。所以学八股，教八股，评八股，名为代表圣人孔子，实是代表当今皇帝，时时处处不能忘记了这位最高统治者，要仔细揣摩“上意”。立意不对，文章好也没用，还会有祸。因此，作八股也是练习“对策”，如何迎合上意。不用说这是学习做官之道，顶头上司直到皇帝是首先要重视的。

八股对话是讲废话而不像废话。这很难。怕出格闯祸就只好重复。最低级的是重复词句。据说有个老童生须发皆白还赶考。主考想一定要取他，一看卷子，笑了，只好勉强取在榜尾。题目是《周公谓鲁公曰》（《论语·微子》）。考卷中有一段说：“不观周公乎？不观鲁公乎？不观周公谓鲁

公乎？不观周公谓鲁公乎？”出这样的题，无怪乎他编不出什么漂亮废话。中式考卷也未必比这文好多少，不过巧妙些就是了。

以废话传达无信息的信息，仍可有信息。因为语言文字，尤其是汉字，若是属于文学的，就多有歧义，或者说“指他”的意义，不属“能指”“所指”之列。印度古典诗论中八九世纪时兴起“韵”论，认为诗有字面义，内含义和暗示义，诗以有第三种义为高。这种“指他”的意义或说“韵味”、“暗示”还得分析。需要照对话的发出与接收及信息与载体的格式分析其多种多样。例如前面引的“不观周公乎”一段，可谓废话之顶峰，但又可以引人（不是所有的人）发笑。笑什么？笑的就是它所指出的非字面又非内容也不算暗示的另外的其他意义。这可能是说废话过头了，引起发笑。这几句废话一点不错，用词造句都正确，吟诵起来音调也合格，这是通常文体式样共同所有的，必是有什么另外意义引人发笑。因此废话是无意义，又不是全无意义，要看用于何处，对什么人。八股也同样，而且是集中表现。无信息的语言不能说是“表达”什么，但仍给人以“印象”，所以仍起语言对话的特殊功能（欧语中“表达”、“印象”这两词有联系）。

从文学体裁说，兼及形式和功能两面，八股也可以说是集中表现。照现在说法，说理、抒情、叙事三者在八股中都可以有，因为题目来源的《四书》中都有。八股中只是叙事稀少，受字数限制，必须叙也不过是一句或几句。照古代分类法也相仿。直到汉末，“文”并没有独立作为文学或词章。

《论语》中所列的孔门弟子分科，“文学”和“言语”分开，指的是作文字记录的本领。刘向《七略》和班固《汉书·艺文志》都是合举艺文笼统说。汉魏之际曹丕的《典论·论文》才列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不传。最早的文学体裁分类是萧梁时的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二人同时，刘勰还是“东宫舍人”，依附过这位太子，但《文选》的《序》和篇目与刘的书中所列不完全一致。《文选》的编目次序也不全依《序》。刘的排列类似萧，但立论不同，把“文”扩大为包括一切。这扩大也是还原，本来《易经》等古书就这样看。《论语》中孔子说“天之将丧斯文也”的“文”，朱熹说就是“道”。平实的是《文选·序》，奠定了一直到清朝姚鼐的《古文辞类纂》的分类。较晚的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又遵循刘勰的扩大理论。李兆洛的《骈体文钞》自有分类。刘勰的分别体裁和他的文学理论相连，应当另论。单看《文选·序》可以发现特点。首先是提出了文“随时变改”的历史观点，指出了后代对前代“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先说文籍的产生，再说狭义的“文”的发展，然后作体裁分类，同样作历史叙述。排列是赋、骚、诗。随即说诗到“炎汉中叶，厥途渐异”，“各体分兴”。然后细分文的颂、箴、戒、论、铭、诔、赞，随后是诏、诰、教、令、表、奏、笺记及其他，有的只是依题目用字及实际应用分栏目，如碑、碣、志、状。最后说明书中不选的是经、子、策士说客的议论，史书只收赞、论、序、述，原则是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两句话也正是清朝桐城派古文家

姚鼐说的义理和辞章。他说的还有第三是考据,近古才有,《文选》自不会提。这许多文章分类在体裁形式和名称用字上八股文没有,在实际内容上八股文差不多都可以有。原因也是在《四书》中多少都具备,所以随着出题也定了文“体”。从上述各种分类看,文章基本是对话的各种形式。八股集中表现出这一点。

中国古代的对话不仅是你、我、他三种人称,重要的是对话人的身份地位关系,万万错不得。写成文章又有读者和作者的身份关系。在作者中又有自己和代别人的分别。前两方面容易看出来,下对上(奏议、上书等),上对下(诏、令等),大致平等不明分上下(书笺),共有三种。诗、赋、骚都有讽谏意义,所以是对上的居多,后来就自己发牢骚或显才能给同等的人看的多了。这种下对上的对话或陈述,最早在《诗经》、《楚辞》中,汉代越来越多,后来逐渐转移,这是体裁的一变。另一方面,本来代笔只是祭祀时用的诗文,如《诗经》的《大雅》和《颂》,《楚辞》的《九歌》。后来就为长官以至为报酬而作文。司马相如为被冷落的皇后作《长门赋》,可说是最初的卖文,不过不用买者本人口气。到魏晋时书记(秘书)行业大盛。陈琳竟然以此著名。《文选》中收的他代曹洪给魏文帝的信里还说是陈琳有事不能代笔,所以亲自提笔,其实还是陈琳代写的,公然说谎,收入《文选》也算是陈琳的文章。那时已是南朝梁代,早已亡了的魏时王爷管不着了。这一代笔之风是中国汉以后古典文学中一大发展。从“拟”什么人作什么诗起,一直到八股文“代圣人

立言”，都是训练代笔的。最高可以到代皇帝作诏书，代作诗，最低是代人写信，摆“拆字摊”。《文选》中还有代人“赠内”的，即为别人作诗给妻子（陆机《为顾彦先赠妇》）。明朝方孝孺就是因为不肯代永乐皇帝起草即位诏而被灭十族的。这一文风在八股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四书》中各种地位人物关系的对话都可以在八股中表现。

功能和形式相连，为发挥对话功能就要讲究出言的形式。文章用语基于汉字汉文的特点，前面已讲。形式的另一面是文章结构。

《文心雕龙》把“文”的本体和功能吹得很大，但细察一下其中上篇列举的体裁仍是着重在对话。这是秘书的职责，也是文章的能事。用对话观点读古代文章可以发现，八股的结构正是集中了或说凝聚了这一方面。早就有人说过，八股体式《四书》中就有，甚至可以比拟戏曲中的台词（《丛话》）。

八股结构的一种说法是要有“起、承、转、合”。这个格式当然是古已有之，到八股才固定下来。具体说结构，八股规定的是要有“破题”、“小讲”，然后一股和另一股对比，共“八比”成四对。每股短则一两句，长则一大段。还可以拉长分割，大股中夹小股。种种花样只是以对偶分解题意。有的题本为“两扇”或两方面。这既训练文才，又训练思路，注意分两点立论。还有“承题”“起手”之类是连接转换，有的很巧，有的是硬接。从经书到古文、骈体（对偶）、诗（律诗）、词（上下阙）甚至曲子、小说，都可以照八股分析结构，

查出八股发展的来源。明清八股极盛,集中了也就僵化了,于是空空洞洞只剩下形体的骷髅,衰败而灭亡了。坏是坏在定死了。从出题到作文,从形式到内容,全成为无信息的废话,岂有不死亡之理?但不能因此说其中结构全要不得,因而取消了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实际上反而可以用八股为钥匙去打开古代文章的这一方面。不引例不明,一引又太多太长,现在溯源,只举《论语》一篇全文为原始八股结构之例。

《论语·季氏》首章。

八股出题是指出了文章背景也限制了内容。在八股以前除考试外没人出题,题是自取,更古时往往题就在文内。这篇文开头是:

季氏将伐颛臾。

这是背景,也可算题目,以下全文由此引起。

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

这是出题。鲁国的掌权者季孙氏要出兵去吞并鲁的附庸小国颛臾。孔子的门徒冉求(冉有)和仲由(子路、季路)去向孔子禀报,大约是盼望得到老师支持。这句话仍是引子,但也可作为题目。冉有、季路报告孔子一件大事,将发生战争,可是讳言战事,只说“有事”。下面就是师徒对话,主要是孔子的议论。照后来的格式,这就是《鲁季氏伐颛臾论》。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欤?

这正是“破题”,先下断语。“求”是冉有的名字。他是

主要的谈话对手。孔子说的是：“难道这不是你的过错吗？”“这不怪你吗？”以下讲道理，是“小讲”。

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这整个是一句话，内含三句话，三个理由，归结到又一句话，是总纲。照朱熹注说，当时鲁国分为四份，由三“家”掌管。孟孙氏和叔孙氏各得一份，季孙氏最强，独得两份。有个小国颛臾是附庸国，直属鲁国，仿佛“保护国”，不归任何一“家”。季孙氏想去吞并了，出兵讨伐。孔子说了三点。一者，鲁国先王封颛臾于东蒙山下主持祭山，所以不可伐。二者，颛臾在鲁国邦域之内，是鲁国的一部分，所以不必伐。三者，颛臾是“社稷之臣”，即属鲁国全体，是公家的土地，不是季氏一“家”所当伐。由于这三点，“何以伐为？”这句的句法是古语。“何以”就是“以何”，“为什么”。“为”是问话虚词。意思是，为什么要出兵去打它？到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翻译《金刚经》时还用过几次“何以故？”就是“以何故？”梵语原文是，“那是由于什么原故？”也是三个词，后两个词是“何”和“故”，语尾变化译不出来，用“何以”表示出来了。有了“何以”便不需要“故”，有“何故”又不需要“以”，但要照搬原文，所以还得译出来。“以”是译的原文语尾。这是直译，一字不差，词序也一样，又合乎汉文文法，只是“以”字不合习惯，不大通，半通不通，一望而知是佛经。八股中这类有多余字的句子不少，一见即知是八股腔。孔子说的是“颛臾”“何以伐为”？对这个小国为什么要出兵？夹在中间有

三句理由,都以颛臾为主体,成了附属句,连起来好像现代译的外国文长句子。一共二十九个字连成一个句子,分成五个停顿,中间插进一个“矣”字,一个“也”字,意义上不必要的字帮助停顿时拉长音换气。还有个“者”字也是可有可无的虚字,夹在“昔”字和“先王”中间,略略停顿,又可停可不停。“臾”字、“主”字下无虚字,停顿而不拉长音。全句也就是全段,意义丰富,理由充足,音调节奏长短平仄排得和意义配合,有停顿,有不停顿,有拉长,有不拉长。意义是起(夫)、承(矣、也)转、合(为、平声)。音调是抑扬顿挫,可记五线谱。这就是从汉末传到清朝的所谓文“气”。不在口头吟诵是感觉不到的。八股文正是以文的这种“气”作为格式标准的。朱注中说,“一言尽其曲折如此,非圣人不能也”。可见朱子也很欣赏看重这一段。这是汉文书面语中古代文章的精髓。八股以此为标准。在古代书面语文学中,“气”非常重要,不仅是节奏、腔调。可以为“气”而加减颠倒词句,甚至破坏文法。韩愈说过,“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不敢顶撞,不反驳老师,便将罪责推托出去,还拉上子路陪绑。“夫子”在这里是指季孙氏,任用他们两人作“家臣”的主人。当时“夫子”还是通称,不专指孔夫子。“者”是虚词,为了节奏而用,和名字下加“也”字的下文“丘也”的性质一样,但用法不同,不能处处互换。这里的“者”不能换成“也”。这段是承上启下的过渡,是对话中作陪的



一方的发言,引出下面主要发言人的深一层的议论。照八股格式说,下文应当分股对偶了。果然如此。

孔子曰:求!

这是“起手”。

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则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

这是“出比”。

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欤?

这是“对比”。

这两股正好是相对的两方面的意思,不过后来的八股体字数要求整齐,但结构一样。孔子先叫一声对方的名字,“求!”这是“起”或称“领”,以便引起下面两股,好比京戏中的“叫板”,表示“我要唱了”,定下调子。前文一开头叫“求!”与此相同。那是引出“小讲”。这是引出两“比”。下面两股都是开头一句领头,末尾一句问话,中间是各自两小股互相对称。不过前股的字多些,后股的字少些,没有八股要求的整齐。前股引古人的话加上比喻,也是对偶。古人周任说,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列”)要尽自己的力量(“陈力”)。假如一个盲人遇到危险,扶助他的“相”不去扶持他,盲人就要摔倒了。“相”不扶持他,那还用这个“相”作什么?后股加上一层,说,“你的话又说错了”。这一句配上前股第一句引古人的话。两句比喻是,老虎和野牛从笼子里跑出去了,龟甲和玉器在柜子里毁掉了,那是谁的过错呢?下文

没回答,那就是说,看守人不能没有责任。清朝传说,乾隆皇帝听说宫中出了一件错事,随口说出这句“是谁之过欤?”和珅正在旁边侍候,听见了,立刻背诵朱注中的一句下文“典守者不得辞其过”。于是大得皇帝赏识,成为一代宠臣,做高官,发大财。照现在人的看法,季氏是那两个“家臣”的主人,怎么可以当作被看守的野兽,又当作盲人?在孔子眼中却可以。依照《春秋》和《论语》,孔子是尊周天子一统天下的。鲁国之君尚且只是诸侯,季孙等三个“家”掌握了鲁国君主应有的权力,更是孔子所痛恶的。对这两个当“家臣”的门徒和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客气的?用这类比方正表明孔子的怒气,和张口就喊“求”一样。

随后又是两大股。股之前仍有一个过渡,承上启下,还是冉有的辩护辞。他赖不掉了,只好申述理由。这说明他是主谋,子路是他拉来的,在旁边一句话不说。孔子知道内情,所以决不容情,不肯表示同意,而且一再只叫“求”,不叫“由”。

冉有曰:今夫颡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

“今夫”的“夫”同前面“昔者”的“者”一样,是为了文“气”,是节奏需要,文法和意义不需要。“夫”“者”两字不能互换。“今夫”长期是起句套语。

冉有的理由用现在话说就是,出兵不是侵略,是为了自卫。他终于提出了政治原则作理由,于是引出了孔子的内政外交大道理。这才是主题和核心,由前面的对话一层一

层一面一面引过来。冉有的理论是，一个坚固的小国离自己的府城（费是季氏的邑名）很近，今天不拿下来，到后代一定会成为子孙的祸患。古今中外对外打出去的国家差不多都持这种理由。其实就是说，“先下手为强”。这样的两国不和，若不用武力，应当怎么解决？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取之而必为之辞。

还是先有领句，指出对方是强辩。又叫一声冉有的名字，可见孔子的正言厉色，很生气。先指出他是强辞夺理，是“君子”即正派人、上等人所痛恶的。不说心里想得到人家的东西而一定要制造出一种说法来。“疾夫”的“夫”和前面的“者”、“夫”的用法一样。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丘也”的“也”字的用法仍和前文的“者”、“夫”一样。

在八股中，这是中股的“出比”。中股是核心，后面还有“后股”、“束股”。《论语》这一章中，八股不全，还没有后来的定式。这一大股中分两方面，也就是两小股。“国”是周天子一统天下的一个国，如鲁国。“家”是鲁国内部的一个单位，有权就成为自治单位，权再大些就掌握了“国”的权力，如季氏。这同一“国”称霸就不听周天子的话一样。有国有家的掌权者，实际指季氏，应当首先管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要均衡和安定。这就不怕财货少，不怕穷，因为有了均衡，和谐，安定，就没有穷困和危险了。朱子注把“均”讲

成“各得其分(份)”,把“安”讲成“上下均安”,这才合乎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的古代社会的统治要求,和现代的理解不一样。孔和朱也未必一样。这中间比上文加了一个“和”字,一个“倾”字,标明要和睦相处才不会倒坍。前一小股讲对内,后一小股讲对外,中间加上“夫如是”(照这样,这样一来),承上启下,连接又隔离两小股。“夫”字和前面的“夫”字一样。这类“夫”字在句首时,古时读音改为“扶”。对内安定了,对外怎么样?“远人”不仅是邻邦,一切外国都算上。“不服”,不友好,那也不能出兵,要“修文德”使他自己来。来了以后就安顿他,安抚他。“来”和“安”在这上下文里,照现在和欧洲语一致的语法说是及物动词,是使他来,使他安。照梵文文法说,这是“为他”,而且“致使”。这和本章第一句“见于孔子”的“见”字恰成对照。“见”字在那个上下文里不是“及物”和“为他”,而是“不及物”以至“被动”,或称“为自”,不是见到孔子而是被孔子见到,出现在孔子面前,因此必须有“于”字。这些变化在印欧语中都得变音,也是在拼音文字中变形。在汉文中不变形,但读书时应当变音。所以朱子注“见”字读成“贤遍反”(现)。但“来”字“安”字就音形都不变,只能从下文宾语“之”(他)字知道了。汉文(书面语)这时已有发展,不是把口头语记下来,而是独立的写出来的书面上的口头语,是简化的凝缩的语言。这和梵文类似而变化不相同。从《论语》可以看出,汉文这时不仅是独立发展的书面语而且已经在作文章,为文“气”需要又发展出许多词句定式。八股正是继承并固定了这些定

式。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这一大股也分两小股，是前面“出比”的“对比”。前者以“丘也”，“我”，开头。后者以“今由与求也”，“你们两个”，开头。两个“也”字一样。节奏文“气”相等。前股讲理论，后股讲实际，两两相对，正是八股规格。“相夫子”的“夫子”仍同前文指季氏，“相”由前文“彼相”的名词转为动词。孔子将两个门徒合并指责，说他们辅佐季孙氏，既不能和睦邻邦，又不能统一国内的三“家”，反而要在国内打内战，所以危险不在颛臾而在自己的宫墙之内。这是回头答复冉有说的颛臾对季氏后代有威胁的话。一小股说现在，一小股说未来。朱子注说这里的“远人”指颛臾。未必专指，是暗指。前面的当是泛指。朱注还引了两家的说法。有一家说，为什么“伐颛臾”的事“不见于经传”，推测可能是冉有听从了孔子的话，季孙又听从了冉有的话，所以没打起来。他推测这两个门徒凡事都先禀报老师，经过孔子劝阻而少做了不少坏事。他是想夸张孔子的功绩，却使孔子变成了鲁国政治的后台，好像暗中操纵国事了。朱熹引来大约也是赞成的，作八股得跟着讲。这样一讲，显出孔子更像是开“政治咨询公司”的了。孔孟都是经常接受国君“问政”的。《四书》是答“问政”之书。八股同样是答“问政”之文。伐颛臾事应有下文，但文章没有收尾，不知为什么。

《论语》中有很多好文章。这一篇中有的话现在还有人引用。这是结构谨严，层次分明，道理显豁，词句讲究的采用对话形式的言简意赅的文章。有头无尾反见其似有余意未尽。就结构说，还可以就文“气”说，这可以算是原始的八股文。当然不是说，写下这一篇传说的孔门弟子远见到千余年后的八股，而是说八股由此而来。这篇作品若作为文章便是典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八股格式。这说明八股的结构和腔调是继承了两千年的书面汉语的文章发展的。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定下的，即使是皇帝也不成。当它自身达到无可再变而僵死时才会灭亡。（自然还有社会条件，这里只说文体本身。）试看从春秋以下的文章是不是往往多少带有这种兼骈散分层次的结构。至于对话体式，则不仅中国，古希腊柏拉图写的对话，古印度的一些经典，都有。但是在书面语言的文章中这样扩散普及，由对话直到自问自答和无问自答，也许是汉文的一个特色。事实上，还不限于高雅的文学。戏曲中的“自报家门”也不是各国都有的。

杨廷辉，坐官院，自思自叹。

这不是“子曰”式吗？不像“子在川上曰”吗？不像“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吗？

八股的结构要点一是“破题”，二是“比”即对偶，三是“讲”，四是“起”、“领”、“承”以及“转”、“合”之类的连接方式。至于头、尾、中间用或不用虚词则属于腔调。以上这些并非八股独有而是古汉文中同有的，不过八股集中固定下来了。

“破题”即文章开头，常是断案式，或揭背景，或“开门见山”，或“当头棒喝”，要“一语破的”，如“老吏断狱”，都在《四书》中有。前引的《论语》一篇已埋伏下了原始形态。以后类似破题的还不少，是常见的文格。

司马迁《报任安书》开头在说了来信之后（如同冉有报告）立即说：“仆非敢如此也。”下面的长篇大论都是这一句引出来的说明。

班固《两都赋序》：“赋者，古诗之流也。”随后阐发这一句。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类似“小讲”，仍是“破题”，以“夜游”点出“夜宴”，以下是发挥。

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先设对方“世皆称”，然后一句点破：“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这篇不满一百字的名文全篇“起承转合”，不出它以前的《论语》和它以后的八股的格式。“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在明清两代流行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策论式文章格调接近八股。读“古文”有利于作“时文”，选“古文”用的是八股眼光。

这些都是在规定八股格式以前的。

《三国演义》开头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红楼梦》开头有“此开卷第一回也”。

这些小说是有了八股以后的。无怪乎金圣叹评点《水浒》、《西厢》，有人认为他是一副八股眼光了。

不用这类格式，不点题，一上来就是长篇写景或对话，或拦腰一击，无头无脑，突然而来，飘然而去，这在现代文中常见，而在古时便是变格，要批上“起得突兀”或“如奇峰天外飞来”了。究其实，仍未出《四书》之外。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子改为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都是一开头就提出三股“破题”如同三股叉。《论语》也是开头三股，“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孟子》首章的“破题”格式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和前面引的“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章属于一格。那里是孔子的回答，一句“破题”：“求！无乃尔是过欤？”这里是孟子的回答，以“仁义”对“利”，“破题”有力。下文揪住一个“利”字不放，大作文，最后仍归到“仁义”与“利”对立。若用金圣叹的评点法便是：妙在揪住一个“利”字作文章，好像《西厢》的“临去秋波那一转”是妙在一个“转”字。这个“利”字在梁惠王说时不过是普通意思。他当然不会说“亦将有以仁义吾国乎？”可是孟老夫子乘隙而入，不论上下文原意轻重就指出不该说“利”字，一说“利”，那就“而国危矣”。他说的“国危”是由于“上下交征利”，并不是“利”本身之故。若不争利而能平等互利，又有什么危害？并不需要把“利”字从字典里赶出去。孟子辩论往往有暗地转移论点的嫌疑，所以人家



说他“好辩”。他也承认,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就要会辩论,要会作文章。这就是“文以载道”。八股是顶点。

试看唐代古文家韩愈的《原道》,开头四句和《中庸》的格式一样。“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再看骈文家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篇《原道》,开头便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四个虚字表出文“气”。再往上推,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也下定义说:“夫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这都不离《四书》体,也就是八股体,可是在从魏到唐的时期,《四书》还未集合,八股更连影子都没有,所以说八股只是将古来(自春秋以来吧?)汉文文体的发展诸形式集中凝固下来因而僵死了。固定的死板格式对于考试评卷很方便,所以清康熙元年曾经废除八股文,到康熙八年又恢复。一件工具在没有代替它的东西以前,只要仍有用它的工作,它是不会灭亡的。亡了名字和形象,也亡不了精神实质。

《四书》和八股烂熟了,一张口便自然是八股腔“破题”调。有个传说故事。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昀有一次去南书房,进门问:老头子来了没有?不料乾隆已到。皇帝说:何谓“老头子”?有说则生,无说则死。纪昀当即回答:万岁谓之老。元首谓之头。天之子而子万民谓之子。乾隆笑了,免了他的死罪。清朝的纪昀成了汉朝的东方朔。这三句恰恰是《中庸》、《原道》的调子,八股的“破题”。《四书》读得烂

熟时张口便出来。

以上讲的是形体外表结构，还有内部意义结构也可略谈一二。

从上面征引的一篇文章和一些文句就可以看出汉文成篇文章的意义结构常是问答对话式，一分为二、为三、为四式。亦即面面俱到式，或者是一来一去的对比式，还有逐层深入前进式。常见的是“一语破的”的判案式，也就是“破题”式，然后接上“二水分流”对比式。这是汉文的，或说是汉族文人的习惯思维方式吧？从并无八股嫌疑的《易经》的“爻辞”（不算“十翼”）也可以看出来。“乾，元、亨、利、贞。”一卦三爻，重卦六爻，每爻都有判断辞。这和甲骨卜辞的叙事语不大一样，有同有异。这类词句含有“指他”的意义，需要“象曰”等等加以说明，什么者，什么也。八股的意义结构包孕着思维结构的习惯。这也是一固定下来便僵死了。但是如果新的代替物不出来，它还是灭亡不了的。可以“刀没而利存”，“形亡而神在”，“借尸还魂”。

八股限定在《四书》朱注以内作文章，真的是死板得一点生气没有吗？也不见得。不妨说个故事，只讲“破题”。

明清之际的小说《醒世姻缘传》第三十七回到第三十八回里说，有四个小孩子一同赶考。大人叫大的们各替小的作文“枪替”。其中一篇《论语》题目下来是《文不在兹乎？》。一个大孩子想，要作两篇，不能一样，便自己写个正式的，替那个小的作了一个“偏锋”的。（《孟子》题也同样，从略。）考完回家，大人把四个孩子的文稿一看，多认为那“偏锋”文章

一定不会取。偏偏有一个人认为,不但会取,而且“要取第二”。于是打赌。他说,不取算他输,取第三,取第一,也算他输。一发榜,果然取了第二。他赢了。奥妙在哪里?那人自己解释说:“这也易见。童生里面有如此见识,又有才气,待取‘案首’(第一名),终是‘偏锋’。毕竟取一个纯正的冠军。不是第二是什么?况又不是悖谬。”接着说出不是“悖谬”全错的理由。这个“偏锋”、“中锋”的说法正是指的意义结构中要领。“中锋”是全照朱注正面说。“偏锋”是照题意“自出心裁”。这个《论语》题《文不在兹乎?》“偏锋”的“破题”是,“文值其变,圣人亦自疑也”。说不是孔夫子自信,却是孔夫子自疑。照本题说,并不错,照全文的朱注说,就不对了。原来这句题出于《子罕》篇,是说孔“子畏于匡”。照《史记》所说是鲁国的权臣阳虎(阳货)在匡这个地方行过暴政,所以匡人恨他。孔子的相貌很像阳虎,经过匡时被误认为阳虎包围起来,几乎连门人一起遇难。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注说:“文”就是“道”,是礼乐制度,“兹”是指孔子自己,都是“谦辞”。这是说,周文王不在了,难道“文”,文王所行的“道”,不在我身上吗?于是接下去说,“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朱子在注中引马氏说法,认为“后死者”是孔子指自己。说的是,若天要这个“文”(道)灭亡,那么,我这个比文王后死的人就不能参与这个“文”了。天没有要这个“文”(道)灭亡,使我仍然参与了这个“文”(道),那么,我一定会活下去。匡人怎么能违抗天?匡人又能把

我怎么样？照这注解，孔子是自信，可是“文不在兹乎”这一句问话孤立起来出题，确实是不自信，是自疑。所以说“自信”是正面“中锋”，符合朱子的注解。说是自疑，也不是完全错，只是讲这一句话的题意。小说中那人解释为什么是第二，又说：“其实匡人围的甚紧，吉凶未料，夫子且说大话；说自疑，极有理。”这就是把意义结构的里层揭出来了。这句话从本身说，从上下文说，从朱注说，从自己的理解说，可以有不止一种说法，或层次，或方面。题目哪怕是一句，也可以上下左右联系起来再就本身探讨。这是题意内涵结构，就此作了“破题”，然后一分为二，两股两股对照发挥便成为全篇。那题下的两句便是两股，“将丧”、“未丧”，全篇也是八股格式。作八股，有题便有意，甚至有了“股”。立意有了，文章好作，只要熟悉老一套，把各种陈言滥调装进去，念起来铿锵悦耳，一篇八股废话便成功了。《醒世姻缘传》未必是蒲松龄作的。假如真是他的作品，他照这样作八股文，也就难怪他到老考不取，最后才得一名秀才级的贡生了。

八股文“体”说到这里已经接触到“心”了。“体”形虽固定一式，心灵还是可变的。人的“心”（头脑）毕竟不是死的。从这个故事也可看出《四书》题能有种种不同“破”法，文章便因此而可能有种种不同风格。究竟是“代言”还是“自言”？含有自己的意思和气派便含有个性风格。“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虽然格式固定，仍然可以彼此貌同神异。文体学中一面是体裁，另一面是

风格,两者是一事,而又可分。要分别讲,说“体”的到此为止。

## 八股文“心”

文既有形体,也有心灵,同依语言而不为语言所限。照现代说法,“体”应指形式,“心”应指风格。在欧洲语言中这是一词的两义,一事的两面。古时说文“体”是指体裁,即语言的结构形式以及应用功能。文“心”则是陆机《文赋》所说的,“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刘勰《文心雕龙》也说,“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上篇“纲领”是分论体裁,下篇“毛目”仍着重作文的用心,和《文赋》相似。可以说,上篇讲雕出什么样的龙,下篇讲怎么去雕龙。《体性》一篇分别“典雅”等八体,类似现在所说的风格。《风骨》篇依曹丕《典论》说“文以气为主”,分别孔融等三人的文“气”,也可说是指风格。《议对》篇中有风格之语,仿佛文风与人格合一,不是单指体式。此外,《诗品》之类品评高下也并非单论风格。大概可以说,在现代以前,不分中外,体裁和风格并没有明确分列作为两套,到现代也还是统一于一词之下。外国现代探讨文体风格多依语言分析,其实所论的仍是形体。有人分别语言的意义有理性的和感情的,如一声呼唤“啊”可有多重意义,靠音调身势而不靠书面。这样的

分析还未能尽述不同文体中的不同风格,特别是在口头和书面分成两种语言的汉语里。反而是中国古典文论中有一条一贯思路可以参考。这条思考路线由《典论》到《文赋》到《文心雕龙》,越来越明白而系统,是将作者和作品两方面纳入一条线,即创作是由作者主观的“心”达到客观文章的“体”,而研究者是从“体”溯到“心”。“心”从何来?又由于学和才。“体”是风格,又可结合在体裁之中。“体”是体式,如“典雅”是“熔式经诰,方轨儒门”。尊“经”重“儒”,书与人结合,所以是思路一贯。用什么对文“体”“一以贯之”?可分什么层次?

若夫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

乍看用语模糊,线路紊乱,但大意还清楚。如篇题所示,这是由文“体”溯人“性”,由人“性”生文“体”,即由作品观作者,由作者论作品。历来诗文论多半不出这条习惯思路。直到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的“境界”说,仍是将词的“境界”和人的“境界”合一。

这段以下,刘勰就照曹丕的路数一一评论作家。第一提到贾谊。“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第二说司马相如。“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两人都是作赋名家,但两人“体性”、“情性”不同,所以是“气”不同,“文”也不同。这样比曹丕只溯到“气”又深了一层。刘勰时代较晚,所以论的作家比曹丕只论同时几人多,共有十二位,从汉贾谊到

晋陆机。

外国虽曾有布封说过“风格就是人”的话，但不是专作文论，和中国的“体”、“气”、“心”、“性”说是一类想法，但并不相等。

外国人现在已经说，文体(体裁、体式)是社会规定和制约的，风格是个人的。这仿佛是和中国古典文论思路相通而又进一步扩大眼界了。但在由文溯人和由人解文路线上还没有中国人走得远。在我们，这几乎是一般人都有的习惯想法了。

现在说到八股文。问题是：八股是专为考试的，由朝廷规定，由社会制约，命题作文，限制内容，不能稍有增减变动，格式固定，不可改换，这样，还有没有个人伸展“情性”的余地？能不能显出属于个人的风格？从明到清，所崇尚的八股风格有几次变化。这可以说是朝廷官定考试由皇帝任主考而依他的“情性”指示文体的结果。清初就曾下诏矫正明末的文风而提倡所谓“清真雅正”。这仍算是社会制约的文风。八股文中有无个人风格？风格与人格相连是否在八股中也是一样？照说是考试中考生都趋向于同一标准，不能随意作文。八股又是从题目到结构到立意、用词、造句都有死板规定，难以脱出。而且题目有限，不能在《四书》以外，有多少代多少人的考卷，还有“学”中的考课，“塾”中的作业，“社”中的文课(文会、文社、诗社中人集合共作一题)，以及一些自拟的“程文”(范文)，多得无法计算，刻成书的考卷(闹墨)已多，传抄、传观的更众，如此重复，还有什么发挥

个人“情性”的余地？只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了。这是不错的，但也不尽然。除考卷为中式不能立异难以发挥以外，八股作为一种文体，不论怎样僵死，还是扼制不住有突出才、学、情性的人。人格仍旧和风格联系。文体还掩不尽文心。

举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人为例。这只是抽样（老迈不能去图书馆查书，所以例多出自梁章钜的《制艺丛话》，受到他的限制而不照他的标准）。

海瑞是明朝人，著名的清官，在小说戏曲中有类似包公的地位。他的八股文好像没有传下来。《丛话》引了两个人的话，讲他的三首“拟墨”（自己拟的考卷），说是“违俗”，所以选本不收。“文虽怪，然自成一家”。说他“为人绝不识揣摩为何事，故文亦然。倔强不屈，自适己意”。这样的文怎么能考取呢？原来海瑞只考到举人。中秀才以后便去做官，由小官而大官，做了二十年官，名声极大。隆庆年间，他已任巡抚，“会试”进士时，他作了“拟墨”三篇，作为“程文”（范文）。朝廷根据这文章赐了他进士头衔。可算场外考生，得荣誉进士。后来又革职闲居十六年，然后复职。想来他的“时文”合乎文“体”规格，却不合文“心”规格，不合时宜，所以是考不取的。可惜不见他的文。“文如其人”，他是个特例。由此可见文“体”限不住文“心”。考不取，但不能限制他不作自己的文章，然而选本不收，《丛话》不录，还是埋没了。

汤显祖的戏曲和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他是进士，做官



不顺利。他又是八股名家。假如能看到他的全部八股文，可能有所发现。这里只由《丛话》引出一例。题是《不有祝鮀之佞》一句，出于《论语·雍也》。这一章的全文是：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照朱子注说，“祝”是“宗庙之官”，即太庙的司祝。“鮀”是卫国大夫的名字，字（号）子鱼，“有口才”。“朝”是宋国的公子，“有美色”。朱夫子解说道：“言衰世好谀，悦色，非此，难免。盖伤之也。”这个“佞”字在《论语》中出现几次，不仅是“有口才”，能言善辩，而且含有善于吹牛拍马讨人喜欢，“谀”有钱有势的人之意，所以为孔子所嫌恶，几处都当作坏人的特长来说。现在题只有一句，那便要突出“佞”字，于是《牡丹亭》的作者借题发挥了。《丛话》只引了两股。

在朝廷而不佞，难以终宠。即侪党之间，不佞，不足以全其身。

这是前一股，即“出比”。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在朝廷做官，对皇帝和上司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一直受到宠幸，升不了官。二是在平等的同事朋友之间，若不会说话讨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自己不遭祸害。

处怨敌而不佞，难以巧全。即骨肉之际，不佞，不足以全其爱。

这是后一股，和前股相对，是“对比”。也说了两小股，自作对偶。一是对仇敌，若不会讲话，不会拍马，那就很难巧妙保全自己。二是在家庭亲属骨肉之间，若不会说话讨

人好,那就不足以保全彼此的相爱。

这两段完全符合八股格式,“体”一点不差,“心”或风格却是大发牢骚骂世。说得从朝廷到家属,从朋友到敌人,都是爱听好话不爱听坏话,说了不中听的话就难免惹祸。说不定孔子当时讲这话,门人当时记这话,也都是发牢骚,对社会不满意。然而这和通常认为只能板面孔发教训的圣人的“风格”不相符合了。所以梁章钜在引文之后说:“此数语发挥末流情弊痛快极矣,然以代圣言,恐失之过。”八股代圣人立言,可不能只管《论语》里原来怎么讲,还得照顾后来人怎么看,尤其是考官和最后“磨勘”(复查)的皇帝的心意和眼色万万不可不想到。这就证明了处世必须“佞”,连作八股文也这样。梁大人官做得不小,深知八股妙谛,所以不能不说这是“痛快极矣”,承认说得好,又不能不说这在八股里不合格,不能“代圣言”。讲“痛快”话是不是一种文章“风格”?不用说,汤若士的八股不会篇篇都这样,否则他怎么能中进士?

徐文长,即徐渭,明朝人,“狂士”的声名不小,在民间文学中传说着他的一些故事。据说他九岁十岁就会写文章,被认为“句句鬼语,长吉(李贺)之流也”。他曾代一位大官作奏表歌颂朝廷,得到嘉靖皇帝赏识。后来那位大官得罪招祸,徐便发了狂。别人猜想他是为避祸。他自杀不死,入狱又不死。诗文书画都非常出名。他也作过八股。《丛话》中引了他的两段文,一共四股。题目是《今之矜也忿戾》。这是《论语·阳货》里一章中的一句。全章如下:

予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无）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这是孔子发牢骚说今不如借，或者是借古人来骂今人。他说古时人有三种毛病，现在有的人连这三种毛病都没有了。（“是”即这，“亡”即无。）不是改正了，好了，是更坏了，连毛病都赶不上古人了。今人不但好处不如古人，连坏处也不如古人了。三种毛病是狂、矜、愚。“矜”，朱注说是“持守太严。廉，谓棱角峭厉。忿戾，则至于争矣”。《论语·卫灵公》里孔子说过，“君子矜而不争”。朱注说是“庄以持己曰矜，然无乖戾之心，故不争”。这个“矜”字的意义本是“矛头”，现在还留在“骄矜”、“矜持”中。孔子还算它是君子的属性，所以说，虽是毛病，古时还属于君子，今日则属于小人了，变质了。朱注说是“伤俗之益衰也”。古之“矜”不争，不伤人，今之“矜”要和人争斗了。“忿戾”是脾气大。今之“矜”不是古之“矜”了，不仅自大，还要伤人了。且看徐文长如何作这一句的文章。

其视己也常过高，而身心性情之际每怀不平。

其视人也常过卑，而亲疏远近之间鲜能当意。

这两股明白如话，一眼可以看出八股的最简单体式。意思很清楚。看自己过高，总觉得人家对自己不够尊重，所以心中时刻不平，不满意。看别人太低，所以亲近和疏远都很少能合自己的意。

义利之辨未尝不明，但其所见者自以为义，而谓天

下则皆利也。

是非之故亦未尝不悉，但其所执者自以为是，而谓天下则皆非也。

这两股和前两股一样简单明了。义利是孔孟极重视的。“矜”者不是看不清楚，只是自认为是义而认天下之人都是利而不义。是非也分得明白，但总是自以为是，认为别人全都不对。看天下的人都不如自己好，不如自己正确。

然后总结两句。

此非直浑厚惇大之体无所望也，好胜不已，而其势必至于争矣。

前面追溯“忿戾”之来源，现在点明结果，暗示孔子在别处讲的“君子矜而不争”以及朱子在注中也讲到的“争”字。说这样的“矜”不仅是不能“浑厚”，而且“好胜”下去结果必致争斗。这大概是全文的末尾。从结构及语言说是规规矩矩的八股文。从一般所谓风格说是明白朴素。若就文如其人的风格说，一点也不像狂士口气，倒像是客观分析狂士的心理和行为，把“矜”字作为骄矜而处处与人争，满肚皮不合时宜，表述出来，大有圣人之风了。《丛话》在后面作评语说：“按此文直是文长自作小传。可见狂士并不讳疾，特自知其疾而不能自医耳。”这好像是把徐文长当作一般的狂士，但狂士怎么能这么有自知之明呢？所以实际上又是说他并不是真正的狂士。随着便是简略叙述徐的小传，又引别人的话把徐渭和陆游并列为绍兴的著名文士。引袁中郎（宏道）的话称徐文长是“有明以来一人而已”。如此推崇。

小传中又点出他是佯狂避祸,说出身世之惨。结合来看,这评语说的其实是徐不是狂士。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历来是连诗文评也往往和许多诗文一样是半真半假亦真亦假指南道北的。仅仅分析语言是判不明这类风格的。评者是大官,对狂士只能这样表示同情才恰如其分。这也是八股的要求,不能出格。当然决不能说,所有诗文和诗文评都有“指他”意义。只是说诗文要结合作者的人来看,即使是应考的死板的八股,作为文体,也能透露这种情况。

再举一个从语言上也可见风格之异的为例,和前引文对照。这是清初的八股。前引的是明朝晚期的八股。

尤侗是一个著名的有些放荡的文人。他有八股文游戏之作,不用《四书》题而用《西厢记》的戏曲语为题。《临去秋波那一转》一文更为有名。据说这篇文还被康熙皇帝看到,因而和他能做京官有关系。《丛话》中引尤的《西堂全集》卷端“恭载”的一位“国师”记的“语录”,说皇帝同和尚谈过这篇文。皇帝说,状元是尤侗的学生。尤是老师还不是进士。和尚说,你大权在手,要他做官还不容易。这显示皇帝爱才而尤西堂借此保护自己的游戏文章和戏曲。康熙的话中说到尤在“九王摄政时复缘事降调”,透露出皇帝注意察访,这里还有政治气息。康熙也许正因此才把这位顺治时的“拔贡”(秀才级)拉出来参加“博学宏词”,做了官,而不怪罪他的作品不正经。这段皇帝同和尚的对话加上那篇《西厢》八股合起来看,更能显出“指他”的意义。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这位清代苏州文人尤侗的文章被认为“惊才绝艳”,且引两

段来和明代绍兴狂士徐渭的八股对看。这是正经时文，并非游戏之作。题目是《士见危致命》，出于《论语·子张》，本是子张说的话。另一处孔子说过“见危授命”的话（《宪问》）。尤侗发挥读书人“士”在“朝廷”（国家）危急存亡的时候要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致命）。这两股是“起比”，即“小讲”以后八股的头两股。

朝廷廉耻之风半销于肉食。故逢掖之意气直驾公卿。使遭危急存亡之秋而优游养望，则当年草庐歌啸，何取侧弁而哦忠孝之经？

这一股说朝廷的大官（肉食者，见《左传》）多半寡廉鲜耻，所以穿宽袍大袖衣裳（逢掖，见《礼记》）的儒生的意气胜过公卿。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到了国家危亡之秋还悠然自得培养自己的声望，那么当年在草屋里何必洋洋得意衣冠不整而诵读忠孝的经典？（“侧弁”是歪戴帽子，本指醉酒的官僚，见《诗经·宾之初筵》，是讽刺周幽王君臣宴会的诗。）

草野游侠之行或成于笑谈。岂庠序之风流不如闾巷？使处倾侧扰攘之际而隐忍偷生，则他日史册讥评，安能俎豆而入名贤之传？

这一股从另一方面说。草野的游侠之行在笑谈之间就有。难道学校（庠序）里的“风流”人物还不如街巷间的平民？这些读书人（士）假如（使）在国家大乱朝廷倾侧之时还隐忍偷生，那么以后史书上说出坏话，他们又怎么能到文庙里享受祭品而且列入名贤传？

前一股讲不做官的应当胜过做官的。读书人若在国家危亡时仍啸傲山林,当年还何必读书?后一股说街道上还有讲义气的侠客。读书人若在国家危险时还隐忍偷生怕死,岂不是不如文盲老百姓?这想必是尤侗被贬后作的。康熙皇帝不怪罪他,还赏他官做,原因之一可能是尤侗在八股文中还说书生报国而不怨朝廷。当时初平“三藩”,天下还不安定,所以要这样收揽人心。到雍正、乾隆时便认为天下已定,要严惩不轨文人了。到道光时又有了危险,所以梁章钜在《丛话》里(卷八)公然提吕晚村(吕留良)之名而不忌讳了。

这两股都是着重一个“士”字而发挥“见危致命”。文章风格和前面引的一些比较一读即知其不同。这可以从文“体”的语言方面分析出来。例如,作长句子,用典故,用形象词,不避《四书》以后成语,以提问表达正面意思,着重平仄对偶腔调,都可以分别。最后这一点,在从前习惯于“吟哦”诗文的读书人不念出口也知道。每一顿处前后都是平仄相间,两股又是落脚平仄相对。前股是“风、食、气、卿、秋、望、嘯、经”。四对平仄相间。后股是“行(去声)、谈、流、巷、际、生、评(平声)、传(去声)”。也是四对平仄相间。前股平起平收(风、经)。后股仄起仄收(行、传)。这样排比句子和律赋相同,而且用的正是一些四六句中夹虚词。这就是从语言查风格的显而易见的方法。和前面所引一比,徐文明显不是赋体,是骈体散文。汤文虽像四六句,但无铺排,句式类似而调子不同,用形象词也多寡有别。不检全

文,就这一点即可见文章风格不同。对于辞胜于意的文,从语言分析文体就大有用武之地。至于用典故成语乃是古代诗文的通例。春秋战国之文引典是《诗》、《书》、传说,以前的积累不多,本身即成典故。汉代起用典渐多。魏晋六朝便大量运用这一积累。以后的作品,若不熟悉典故成语,很难读出滋味,甚至难懂用意。望文生义往往出错。读文不等于猜谜。这一点比外国作品,尤其是近代现代的,不一样。他们多用今典,但也用古典如《圣经》、莎士比亚的名句之类,不知者也会望文生义。文学语言有继承性,不用典故成语(包括古典、今典)是不可能的。用得太多了,陈词滥调堆砌成篇,当然不好,那就板滞而不能生动了。以上所说,自陆机、沈约、刘勰以来,即为读书人赏识,所以很少有详细说明的(多仗口授)。评文常依此为基础而论列己见。今人读古人文不可不注意古人不说的常识。

若从人格见风格,以上所引当然远远不够。《丛话》是用官方正统眼光口气,所选不能代表作者。可是也可由一斑而作推测。这三位文豪都写戏而且作品的地位很高。这在考卷中未必能看得出来。三人中只汤一人中过进士而官运不通,考卷可能同样不很中规矩。这里引的大约不是考卷,那就更能透露才和“气”。汤的讥讽,徐的冷静,尤的慷慨陈辞,都可见其为人。尤的两股中用词的口吻也有活人气味。如“危急存亡之秋”(《出师表》),“草庐歌啸”,使人想起诸葛亮。“游侠”,“闯巷”,“隐忍偷生”,更是抬举平民。尤的文章不被考官所赏识,屡试不中。因作戏曲《钧天乐》



讥讽考官,顺治十四年丁酉的科场大狱据说即由此而起。可见八股、戏曲和政治都不离文人之手,是不能不相关的。可惜现在不能将三人的八股和戏曲全文对读。

《八股评罪》中引了王渔洋、袁随园两位诗人的八股,本文又引了汤若士、徐文长、尤西堂三位戏曲家的八股,还有林则徐和其他人的八股也很有意思,不多征引了。为了说明我的推想,再举一例。

高鹗是补足《红楼梦》的小说家,又中过进士。他有《兰墅制艺》收八股文二十七篇的抄本,是传观的,上面有许多别人评点和他自己批的意见。全本现已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影印出来。在《高兰墅集》中也选印了三篇。现在从这三篇中摘出一段,以见为应考中式而作的文是什么样\*。

题目是《麻冕礼也今也纯》。题上加了三个圈,可见还是得意之作。作者在文后自记:“此满洲科试题,针对下节须在用笔浅深一重一掩之间。诸生论题,为拟此艺。”可见这是“程文”,即范文,给满洲考生作样板的。

这题出于《论语·子罕》,全章是两股文,一股“从众”,一股“违众”。每股各以古今相对。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这一章讲的问题是应当从古礼还是从今俗。题目只是

---

\* 请参看拙作《高鹗的八股文》,原载《读书》1988年第1期,收入《文化猎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1991年。

前半的一半,所以不好作文。照朱子注说,冕是帽子,从前用麻织成是礼所规定的,现在改用“纯”即纯丝。朱子说,用麻布共需“二千四百缕,细密难成,不如用丝之省约”。所以孔子说的“俭”是指用料,不是指价格。(那时还没有商品市场吧?)孔子“从众”随俗了,不依古礼了。但下文又说,众俗不正确的,“虽违众”,还是不从俗。这个题只有全章的四分之一,要照应下文及全章主旨,又不能明白说出,怕“犯下”,所以“诸生论题”,高进士要出来示范了。“破题”是:

圣人惩废礼者,而先举变古之一端焉。

真是“破”得妙。照顾全章说不废礼而先说废礼,要说不变古而先说变古。这正是古文作法的一诀,从《四书》得来。接下去是“承题”、“小讲”。

夫礼以示别,通古今一也。如之何其废之? 圣人有忧焉。故先举麻冕以纪变云。

这是着重“礼”字。礼是尊卑有别,题的下文就着重这一点。《自记》和评中说的“浅深轻重”就是七个字题中前重后轻,不能说“从众”,也不能说“违众”。这一段语句通顺,虽是文言,如同白话。

今夫立乎后世以观古人,则古人何事而不形其迂拙乎? 然而古人安焉者,非其智力有不足也,其心有所甚谨而不敢如后人之肆耳。

着重古今对照,又为古人回护,完全依照题意。照应全章而说话只限于七字题,仍是用照顾全局声东击西妙诀,揣摩孔圣人的主要用意是不能“从众”废古礼。用今人眼光看

古人，古人有什么事不显得迂拙呢？并不是古人智力不足所以安于迂拙，是古人谨慎于礼的规定，不敢像后来人（今人）这样放肆罢了。

即如一冕也，古者何如，今也何如乎？

点题，说出具体的冕，帽子，古今对照，用三个短句子，又“也”，又“乎”，这就是“起手”，要分股对照古今了。这正是题目的全章两股中每股的结构。

“起比”的前一股（出比）只两句。

且古人非不知麻之不便也，而乃以繁重委曲之致待后世之变更。

“对比”是一个路数。

且古人又非不知有便于麻者，而故以迂拘繁琐之为滋后人之异议。

总之，古人没有不对，也不是不知，那么为什么要那样呢？

然而古人胡为而必麻冕乎？曰：礼也。

归到“礼”上，点出题字。文稿上有眉批说：“礼也二字有千钧之力。”这两个字本是抄的题目，但这里一“乎”一“也”，一问一答，回答只两个字，所以拉腔截止有力。若不是照从前人那样一路吟诵下来而照白话文那样用口语腔调一字一字说，就不能体会到这两个字的“千钧之力”不是指意思而是指声调，即文“气”了。古代书面语诵读起来是另一种语言声调。汉文和汉字密不可分，靠虚字传神，在八股中最突出，比只有一种腔调的骈文更简短集中而强烈。下

文随即承上启下作两句。

吾尝即先王制冕之意重思古人秉礼之心。

“吾”字是代孔圣人说话。这样便开始了文章的中心部分即“中比”和“后比”，共四股。文稿上这四“比”旁加了浓密的连圈，足见重视和欣赏。这里抄起来太长，讲起来太繁，且跳过去抄结束语。

虽然，吾也，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复古亦未敢轻言，而曲求犹尚有可谅。麻而纯也，或者其俭之足取也。至拜下，则岂复可言哉？

“吾”字仍同前文代表孔子。这一结把中间说的古人重视帽子重视头(元首)和今人“是今非古”又“贵今贱古”拐了个弯，以便隐指下句“从众”。末尾点出题中已有之“纯”，又提出题中未出来之“俭”，还提出题中未有的下文“拜下”，隐括全章。大概是那时对“犯下”不那么严禁，所以不算毛病。那两句对偶大约算是“束股”，连前共八股了。文后有条评语中说，“真有限感慨，无限委曲在”。文稿前有封信，称赞作者“代古人立言，设身处地，独得真诠”。这都可算是说八股的风格吧？“设身处地”是说八股需要揣摩圣人。小说戏曲何尝不要这样揣摩书中人物？揣摩的不同便可写出不同的文章，所以题目有限，文体有定，而文章无穷，废话无尽。八股像戏曲，古人已说过(见《丛话》)。戏曲家会作八股，前文已引过。若熟悉了古时人的一套读法，读得进去，就会觉得尽管文体死板，文句往往欠通，文意毫不新鲜，但也往往另有趣味。若读不进去，便是古时书生，也是一辈子

未必写得通,可是倒不一定中不上式。试卷是给官和皇帝看的,塾课、社课是给老师和朋友看的,像尤侗作的“西厢八股”一类则是给自己和知交友人及“同好”(有共同爱好的人)看的,各各不同。这一篇是高鹗作出给满洲学生示范的,是正经之作,所以小说家的笔调不见,小说家的揣摩工夫还有。这里引来作为正宗文章的一例。但这还不是中解元、状元的“元墨”。那些高中的文章还得更加死板和欠通才不致出错。像这篇文尽管歌颂“元首”,恭维帽子戴在头上,但议论今人古人仍然有点不妥,碰巧也说不定还会遭到“磨勘”(复查)。试想,考题一样,考卷千篇一律又不是重抄,考官——看去,岂不头昏脑胀?所以中式别有奥妙,仿佛是命了。故事很多,不必多说了。

风格和人格的关系,在八股中只能是透露,在别类文中就堵不住了。仍举高鹗为例,因为大家对这位“红楼外史”比较熟悉。

《兰墅砚香词》稿本只有四十四首,而且有的涂改得很利害,有些句子加上密圈,有些在首页上端批“改”字,可见确是稿本,不是定本。这些比八股又接近小说。词的体式要求严格不亚于八股,但非供考试,比八股更能露出高君的面目和心境,像是他的词中句子:“青帘遥颺小红楼。”不妨说得多些。似与八股无关,实是有关。

先引一些词牌下注题目或“本事”的。有的是“戏书”,“调(先玩笑)某某”,“遣闷”,还有为别人“悼亡”的,这都不必说。有一首咏“梅花刻底鞋(涂去)”的《菩萨蛮》,说,“红

绦三寸泥金绣。玲珑重底尖儿瘦”。“点点星星地，拖逗人心碎。犹自假殷勤，轻开半幅裙”。虽说“三寸”，未必是“金莲”。鞋底能雕花，应当是满族妇女穿的“花盆底”鞋。满人是不缠足的。高君是汉军旗人，不会咏小脚。但题下五字写上又抹去仍可见字，上端又批“改”字，大概是还有点觉得咏女鞋不妥吧？还有一首《唐多令》，题下注“题畹君画簃”，上边也批“改”字。画扇子的是女人吧？“女元龙便请同舟。”“好共我，赌风流。”关于她，还有首词，下文再说。又有一首《玉蝴蝶》，注“咏蝶”。“欲扑还休，有多少旧恨重牵？”“小垂手画栏凝睇，悄低头绣带频捻。”不会令人想起宝钗扑蝶吗？一曲《满江红》下注：“辛丑中秋。是岁五月丁先府君忧。六月内人病。至是濒危。草土余生，神魂颠倒，援笔制此，亦长歌当哭之意耳。”词中说：“死别生离，怎生过今年今夜？”“这天付两件乍凄凉，谁同话？”“对苍苍，独立复何言，西风下。”可见高君是多情人，补《红楼》也是别有怀抱的。辛丑年(1781)离他戊申年(1788)中举只有七年，正是补《红楼》之时吧？作八股与此并不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有四首词连续成一个故事。现将四首题下分别注的话连起来。因为上批“此叙归一处”，所以也是作者原意，不仅为抄读方便。第一首注“本意四阙，为李氏女作”。以下是：“女十四，从兄人家塾，学执笔，而性极慧，善解人意。(一)”“十九，归鲁氏。婿病消渴，家人不知也。女归，始知之，然亦讳言之。(二)”“及母知婿病，听人言，送女还家，居近百日。婿益病。后乃力疾迎女去，而病始渐

瘥。总计琴瑟之好止此月余耳。(三)”“五月初,婿以误饮剂,竟亡。女绝粒数日,不得死。继以翁姑家人泣劝,乃矢志终老焉。(四)”四首的词牌是:《好女儿》,《锦帐春》,《怨东风》,《酷相思》。末首云:

惭愧春风刚一度,怎犯天公怒?不道你抛人真个去。郎去了,归何处?郎去了,来何路?便是阎君不受赂,也许亲人诉。倘行到阴山谁看顾?郎未到,须先往。郎若到,奴来晤。

这里没有对“薄命司”的同情和“苦绛珠魂归离恨天”的影子吗?

更有意思的是高鹗对尤侗的作品很熟悉。《怨东风》一首下注:“本名醉东风,西堂百末集作怨东风。”从了“尤名”,即尤氏用的词牌名。又有一首《百字令》,题下注为“潘左卿席上”。下面两字涂去,但看得出是“小伶”二字。词尾又有注,中有涂抹,现将抹去字加括弧,录如下:“尤西堂(观剧词云),自笑周郎愁眇眇(句)注:(余)短视,故云。(仆亦短视,两步外不睹也。故戏用西堂句。)”这是说明词中一句“却笑西堂愁眇眇”。不可忘记,古时很少近视眼镜,而且在长辈面前或大庭广众中是不能戴的。戴眼镜被认为不礼貌。所以尤高二人看戏也看不清“秋波那一转”的吧?从这里是不是又可见芳官、琪官(蒋玉函)等红楼伶人的影子呢?这首词涂改得很利害,可想见当年又想写又有顾虑的情状。这难道不是“红楼外史”高君补《红楼梦》时的心情吗?

还有,他为畹君题画扇,这是什么人?在《金缕曲》即

《贺新郎》词题下有注，也是勾勒改动而且有粘盖另纸。但原文还可看出。影印本不全也不清楚。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迳录出来”附在《校记》中，抄录如下：

不见晚君三年矣。戊申秋隽，把晤灯前，浑疑梦幻。归来欲作数语，辄怔忡而止。十月旬日灯下独酌，忍酸制此，不复计工拙也。

共四十八字。涂改粘贴后在影印本中只见一行及四字，可见当时欲写又止欲罢不能情状。戊申是乾隆五十三年(1788)。“隽”是中举人了。辛亥(1791)作《红楼梦》全本序。乙卯(1795)以一篇八股文得“钦取第二名”，中进士了，而且是“榜眼”。《砚香词》题后又一行题《帘存草》。“自甲午迄戊申”(1774—1788)。这首词及另一首《南乡子》均注“戊申秋隽”。中举前十几年正是修补《红楼梦》的年代，与作词同时。高序是辛亥(1791)，程刻出序及书是乙卯(1795)，即高中进士之年，距中举及编词草七年，距词集中初作甲午(1774)已二十年了。中举之后，词也不作了，小说也不补了，只有八股作到中进士以后。

这首《贺新郎》全词如下：

春梦年来惯。问卿卿，今宵可是，故人亲见。试剪银灯携素手，细认梅花妆面。料此夕罗浮□幻。一部相思难说起，尽低鬟默坐空长叹。追往事，寸肠断。

尊前强自柔情按，道从今，新欢有日，旧盟须践。欲笑欲歌还欲哭，刚喜翻悲又怨。把未死蚕丝牵恋。那更眼波留得住，一双双泪滴珍珠串。愁万斛，怎抛



判。

□字是影印本不清楚。“旧盟须践”的“须”字下加圈，因为此处共写了四个字都涂去了，只用三角形勾出这个“须”字。本行中原字看得出是个“重”字。余两字看不出。“旧盟”怎么办？“金玉良缘”乎？“木石前盟”乎？难哪！

这词以后是最后一首未题“本事”的《惜余春慢》，更不可不抄出。

春色阑珊，东风飘泊，忍见名花无主。钗头凤折，镜里鸾孤，谁画小奁眉妩？曾说前生后生，梵呗清禅，共谁挥麈？恰盈盈刚有半窗灯火，照人凄楚。那便向粥鼓钟鱼，妙莲台畔，领取蒲团花雨。兰芽□小，萱草都衰，担尽一身甘苦。漫恨天心不平，从古佳人，总归黄土。更□伊槌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莫怪天心不平，从古红颜，总归黄土。纵凭伊，打破虚空，也只问天无语。）

“共谁”二字原稿圈去，旁边写了三个字，都涂掉了。□字是影印本中辨不出。末尾括弧中字是原稿用纸粘盖，周绍良先生“从灯影中迻录出来”的。

这首“惜春”词还不明白吗？惜春和宝玉非出家不可了。黛玉也活不了。说不定这是高君补足《红楼梦》以后作的。是不是晚君也死了或是做了寡妇或是出家了？

为什么讲八股文“心”到了末尾要抄这些词？正好和八股对照。词是字字句句都要依韵律填好歌唱的，比八股的吟诵腔调还严格。内容多是言情，和八股“代圣贤立言”说

理又针锋相对,都用自己口气而一是“代”自己一是“代”别人。然而高鹗的文和词是一个人作的。两者中间有无通气之处?这是中国古来文人的处境所形成的人格和风格吧?不能说他们都是两面国的人吧?前文引的三位作家,临川汤若士,山阴(绍兴)徐文长,长洲(苏州)尤西堂都是戏曲名家,徐还是书画艺术家。奉天(铁岭)高兰墅是小说家。《八股评罪》中引的新城王渔洋,仁和(杭州)袁随园都是诗人。这些人中,除徐一人外都是进士,做过官,又都会写两种文。看起来还是高比较小心翼翼,词稿改来改去,到中举截止,恐怕也没有刻出来。他补《红楼梦》也是宝玉终于中举,却又出家当和尚,还在序中声明“不谬于名教”。从这最末一首“惜春”词里可以看出一点信息吧?难道不中举不做官的曹雪芹就能放言无忌?也怕不行。“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都是为什么?五百年间,从八股文到戏曲小说,除有些戏曲小说底本是出于艺人以外,都是出于古代大小会作诗文的读书人的笔下。蒲松龄写《聊斋志异》同时赶了一辈子考,能说他是两面国的人或低能吗?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用马二先生的嘴说,“便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做举业”。这句名言,在《丛话》(卷二)中说是朱子(熹)说的。“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亦不免应举,然岂能累我孔子耶?”他认为,“世间非是科举累人,乃是人累科举”。那时有“经义”,还没有八股,可是汉朝有对策,唐朝考诗,宋朝考论,都有八股气。难道孔孟忙于周游列国向“问政”的国君和其他人论道不是八股的前身甚至胚胎吗?

从秦设“博士”又“以吏为师”，以后就科举不断，日益发展，直到清末。甚至波及出家的道士、和尚，难免带点八股气。八股文是应试科目及文体中的最后一个。八股和诗文似截然相反，难道真不通气吗？拟人，代人，揣摩心意，琢磨词句，在枷锁之中自由活动，在下笔之时考虑枷锁，学会一种和口语不同而也能抒情达意的书面语，学会用种种方式表达种种非如此不可的他人及自己的情意，这些不是从前人开口读《四书》时就得到无形传授的吗？八股的致命处可能不是规格严而是出《四书》题限制。八股已经灭亡了。但是，若对八股毫无所知，对古代文学和古时读书作文之人的了解能够全面而深入吗？恐怕至少是会有一点欠缺的吧？文心，文心，由文究竟能不能见心呢？

### 《四书》显“晦”

中国古代文学和外国古代文学，从春秋战国和古希腊罗马起，有一显著不同点，从八股文可以看出来。依对话定诗文体是中外共同的，不论对话双方是否都明显出现于作品中。可是中国作品中大多是对话中的“应”，而且多半是“应试”或“应世”即“应酬”、“应景”，很少自发说自己独有的话如《老子》的，尤其是“代笔”为他人说话更是如此。《文心雕龙》中论的《章表》、《奏启》、《议对》、《书记》都是对话的一

方说话,着重文辞和作法,必须考虑对方的地位和关系,而且常是代笔。越到后来,套话越多,文不从心,辞不达意,往往半吞半吐,半真半假,要言藏于废话之中。这和外国多数作品,不仅是近代的,很不相同。试读《新约》中的《保罗致罗马人书》就可显见差异。中国的“应对”之作,尤其是“应试”的,更加诚惶诚恐,因为所“应对”的是掌生杀之权的皇帝或皇帝的代表,从主考官以至塾师和家长都是。这些人都是像贾政那样代表朝廷(即皇帝)教育子弟的。皇帝是一个,又是无数。对于能读书作文的人,应科举中式与否,能不能做官,是极关重要的,是社会上以及人生中的一大关键。试看高鹗的《兰墅砚香词帘存草》终于戊申(1788),即终于中举之年。其中不止一处提到“戊申秋隽”,“秋隽”。如《荷叶杯》一词是“戏书”,“谈秋隽事”的。词云:

盼断嫦娥佳信,更尽。小玉忽惊人,门外传来一纸新。真么真?真么真!

真是传神之笔。“报单”到门时惊喜之状溢于言表,令人想起“范进中举”。这词不是应试,也不是代笔,所以说了心里话。中举后过了三年到辛亥(1791),他便写出《红楼梦》的《序》,刊出“程甲本”,在《序》中特别声明这部小说“尚不谬于名教”。真险。中举时那么高兴,所以宝玉也无端要中举,若是早中几年,只怕《红楼梦》补不成或者是补成另一个样,宝玉不见得会出家了。因为他中举之后便不作词,自然更不会作小说了。此后不过七年,到乙卯(1795)他便以一篇阐述孔子论“子贡方人”的八股文得到“钦取第二名”

了。又过三年,戊午(1798),他就作八股“程文”给“满洲诸生”示范了。如此得意,致力于八股,还能去写“红楼”的悲剧吗?

“应对”诗文中八股是终结,开始却远在汉代,甚至可上溯到春秋战国。秦始皇帝设国家高等学府“博士官”,宣布“以吏为师”,是承先启后杜绝游学游说的制度化措施。正式的近古八股的制度化则开始于朱熹的《四书》。

《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两部书和两篇文,出于春秋战国,在西汉时不列于《五经》。《大学》、《中庸》在《礼记》中。《礼记》有大戴、小戴两传本,属于“三礼”之一。经书到东汉才经马融、郑玄全部编定,才有注本。到南宋朱熹合编《四书》并且将《大学》改订补充成为新本。所以本来的两书、两文和朱子合编的《四书》不能算是一回事。合成一部《四书》,加上朱子采纳各家而发挥自己的《集注》,这应当算是朱氏的著作。他依照孔子的“述而不作”之说,自己不作书而编书作注,以古圣贤为匾额,让古人替他说话。形式上是朱熹注解孔、孟、曾(《大学》)、子思(孔子之孙,《中庸》),实际上是四家合起来说明并证实朱子的学说。这是中国古典著书传统的一种习惯,让别人替我说话或者是我替别人说话。后者即八股的“代圣人立言”。从元代起,朱熹之学成为朝廷规定的官学,《四书》由汉、唐、宋之隐晦不章而成为第一显学。这同时也可说是“晦学”,即朱熹、朱元晦、朱晦庵之学。这部元明清三朝读书识字人第一熟悉的书还有没有隐晦未曾揭发?

从对话观点看《四书》的文体，显然都是对帝王论政的讲话，即“议对”。从《礼记》摘出来的两篇文中，《中庸》里有“哀公问政”一节，点明是鲁国之君问孔子政治纲领，孔子答复。其他也多半是直接或间接向统治国家的人对答，不过没有点明问的人，或者没有问的人而说话的对方仍是君相或准备去做官的人。《大学》没有提“问政”的人，但是全篇是讲从修身齐家一直到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被治而不能治人的老百姓听了有什么用？两篇文比两部书写定的时期可能晚些。《大学》引了秦穆公，当在秦已得势之后。《中庸》里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朱注说，“言天下一统也”。这像是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的话了。《大学》说的“平天下”不会在这以前很久。《孟子》是战国时期“应帝王”的说客策士之书。梁惠王、梁襄王、齐宣王、滕文公、鲁平公是第一篇中主要和孟子谈话的人物，都称死后谥号，不是当时所记。以下六篇中还出现诸侯和孟子的对话。还有些是孟子和门徒论政的对话。《论语》里的孔子和孟子一样应对诸侯或与门人讨论政事。一在春秋，一在战国，形势有异，问题不同，记录时都已在其末期。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当宾客，住“上宫”，待遇不好便拂袖而去，自己没做过官，架子比官还大。孔子做了一任官也不久，游说外国没有孟子阔气，还厄于陈蔡，“畏”于国人，不大顺利，多半是在鲁国讲学。有门人在鲁为官，还常向老师请教。门人说志愿也多是要做官。不愿做官的如曾点是难得的。用现在话说，孔子是办了一所政治大学，或

者说是一家政治咨询服务公司。孟子好像主要是“行商”。孔子兼“坐商”。总而言之,《四书》本是向帝王诸侯作对策的议论,同时是读书(不限于书本,那时书很少,礼乐不是书本,孔子只讲“为学”)做官的道路。《五经》不是这样。《礼记》是文集。虽还有《大学》、《中庸》以外的同类文章,但主体还是规定礼,和《周礼》、《仪礼》是一类。《易》、《诗》、《书》、《春秋》更不是策问的答卷,一望而知。

这样来看春秋战国的书,《五经》除外,诸子,包括《论》、《孟》,差不多都是对策一类。直接间接多多少少都是“应帝王”的著作,都是当时游说诸侯或讲学受咨询的人所作,或自己出面,或托名他人。陆续辑成定本,都在汉代。诸子大多不像孔孟那样明显列出问答双方而只出现答问者的备咨询的手册。如《老子》、《荀子》,虽仅有答案,而问题自在其中。所有秦以前的“应世”之作都指向一个结果:秦汉的一统天下,即初步的“平天下”。《四书》更加显著,但无人合编,其中说的话,从汉到唐、宋、辽、金,还用不上,靠这个做不了官,朝廷不用。元代达到了更深一层的大统一。南宋时辑成的《四书》可作新解,便走时了。对策起作用了。这是背景,现在只论文体。

这种对策文体可以《论语》、《孟子》为代表。诸侯或宾客或门人提问题,老师答复。像孟子和告子,庄子和惠子,那样的平等讨论很少。孔子的门徒也有反驳老师而进行讨论的,但仍是“不违如愚”的颜回为最好的门人。

汉代开始有了应考的文章了。汉文帝时贾谊的《治安

策》是博士大夫上书陈政事。汉武帝下《求贤良诏》，还是要求州县推荐，即汉代的“选举”。《贤良诏》就是召“贤良”而“策问”了。其中明确提出考题：上古天下大治，“何施而臻此乎？”“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休业洪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受举荐应考的人）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答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这正好是《论》《孟》中的“问政”。于是出来了董仲舒的《贤良策》。两篇诏书都当作文章收在《文选》中。贾、董的两策没有收。但是其他的还有。且看看这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里收的文章中的（不算诗、骚）策问和对策，即君上对臣下和臣下对君上的政治对话。

两篇《贤良诏》以外，还有三篇《策秀才文》（那时“秀才”的地位仿佛明清进士。对策是殿试，仿佛进行答辩）。一是南齐永明五年的策问题五首。一是总题，此外有一题问农，一题问刑，一题问财，一题问历法。问刑题之末说“朕将亲览”。又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总题之外，一题问任官职，一题问任地方官吏，一题问农、武、学、文即内政，一题问遣使即外交。又南朝梁天监三年《策秀才文》三首。一题问财政即民富，一题问风俗即劝学，一题问求言。这第三题最有意思，不免录下。

问：朕立谏鼓，设谤木，于兹三年矣。比虽辐凑阙下，多非政要。日伏青蒲（天天有人伏在青色的地上。典出《汉书》），罕能切直。将齐（南齐）季多讳，风流遂往？将谓朕空然慕古，虚受弗宏？然自君临万寓，介在



民上，何尝以一言失旨，转徙朔方（充军去边地），睚眦有违，论输左校（论罪派去左队劳动），而使直臣杜口，忠谏路绝？将恐宏长之道别有未周。悉意以陈，极言勿隐。

这是梁武帝亲自出的题目吗？不是的。《文选》是当时编定的，标明是会作公文的任昉的文章。话说得很恳切，要臣下“谏”，甚至“谤”，提意见批评可以“极言”，叫人“勿隐”。这里说前一代南齐朝“多讳”，忌讳多，以致“风流”的名士放言高论一去不复返了。可是前面的两篇齐朝的《策秀才文》也说得很恳切，还说是“朕将亲览”，“尔勿面从”，皇帝会亲自看答卷。你不要当面唯唯诺诺随着皇帝说好话。可是那两篇也不是皇帝写的，标明是王融的文章。于是显出了对话文体中除对答外还有代言。不是本人说话，靠不住。

文章都是一种对话。这是不分中外的。中国古代文章的特点不在于有问有答无问自答等体式，而在于答的对方或明或暗往往都是皇帝或朝廷，而且无论问答都可以代笔。代言之风起得极早。从甲骨、金文起，那些卜辞铭文中的神谕和王言恐怕多半是别人的代言。八股达到了极峰。所“代”的是古圣人孔子，所“对”的是今圣人皇帝。这些在《四书》中都有了。孔子自己回答王公大臣的那些“子曰”中恐怕有不少是别人代言。有一次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门人不懂，问曾子。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这就是代老师说话。忠恕是二，又是一，曾子的话成为孔子的话，这里是明白记出了。孔子教门人“洒扫、应对、进

退”。这成为子夏和子游讨论圣人之道的题目(《子张》)。“应对”是日常生活中的事,也成为学习的项目。读《诗》也是为了学讲话。“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若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学的再多也没有用(《子路》)。学《诗》和内政外交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孔门弟子有“言语”一科,以宰我、子贡为首(《先进》)。春秋时,口头上各国语言不同,书面上刻竹简不便,所以着重学讲话,以《诗》为标准语,以后写在竹帛上便成文章。自己说话是应对,同时也要学习代言。八股是代言的应对,应对的代言,所以可以说是传统古代文体的极致。句句是自己说,又句句是替别人说;仿佛是自己说,实在是对别人说,特别是对在上者说;这就是奥妙。至于这样是好是坏,评价如何,那是另一问题。这里只讲文体。

《文选》的开篇是后汉班固的《两都赋》。赋是不是应对?《序》中说得很明白。前汉到武帝、宣帝时期才“崇礼官,考文章”,于是有了一批“言语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大官们也“时时间作”。前者是专业作家,后者是业余作者。这些都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用对话之文体,通“上下”之心意,归结到忠孝。到成帝时集起来,“盖奏御者千有余篇”。不过几代就有这么多献给皇帝看的“大汉之文章”,也可说是当时的八股。班固作《两都赋》,把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相比,是回答那些“盛称长安旧制,有陋雒邑(洛阳)之议”。这篇赋是扬东汉而抑西汉的应时政治文章。赋中列“西都宾”和“东都主

人”的对话。一主一宾，地位有别。全文是班固代言，代他们二位，实际是代朝廷中的两派意见。内容是政治的。文体是代言的对答。《文选》编定时南朝偏安，京城不是中原历代帝王之都，所以也需要扬新都而抑旧都。选此篇为首可能还是昭明太子主编要借班固之文代言己意的。这以下各类的赋差不多都是这样有用意有听话对象的。有些好像是说自己的话给自己听的，但也不见得纯粹。当时人明白，现在事过境迁难以查考。又如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是作为宋玉和楚襄王的问答。曹植的《洛神赋》好像是自己对自己说话，显示文才，可是引言中说是他“感宋玉对（答）楚王神女之事”才作的。为什么作？作给谁看？当时的人大概不难知道，现在不便猜测了。传说故事不足为据。文章是托辞，也就是代言。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本身只是用美丽辞藻描写一位“佳人”，幸亏前面有《序》说了背景。陈皇后被贬入长门宫，“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于是“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这种代言应对之意只挂在题目“长门”上，除当时人外，后人在文章本身中是看不出来的。无数古典作品往往如此。这是最古的卖文记录吧？报酬很高，还是预付，而效果也极好。

《文选》中，赋以下是诗和骚，也可以用代言应对观点考察文体，这里只论文。诗骚以后的文越来越明显，不必一一述说了。开头“七”（《七发》等）还是赋一类。诏令以后便是“策问”，然后是表、上书等。前者是上对下，后者是下对上，

然后是略有平等地位的书信,最后是对死人的祭文。这里的代笔、代言就多了。序、论、铭、碑、祭文,差不多篇篇都可以这样去看。当然不能说那些应对全都是八股文体的对策,但精神面貌体式是对上或对下的代言一脉相传的。

唐宋有了正式科举制度,考诗、赋、策、论之类,到朱熹编出《四书》以后,元明清都用“四书文”考,这是古典文体演变的归宿,以后便趋于衰亡了。

为什么“四书文”能这样长期用于考试?还得钻研一下《四书》的奥妙。只就文体说。在《论语》中有八股文胚胎,结构已具备。在《孟子》中有八股文语言之妙,两股对偶已经成型了。试引几节为例(俱见《梁惠王》篇)。

臣请为王言乐。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箫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这是一大股中二小股对偶,与下文一大股相对称。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箫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鼓乐也?

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

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欤？何以能田猎也？

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然后是一句总结。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去声）矣。

这是地道的八股腔调。两两相对，有起有结，不顾内容逻辑。“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若不改变，要同乐也乐不起来。前面说了，后面略去，彼此会意，单说同乐。作八股，学应对，都得会这一套。会说可以不说的话，又会不说非说不可的话。言与意相掩而互明，好比太极图。这是不以言传的古书诀窍。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这是三股，股内又有股。主旨在第三股。连上总结才见本意。把杀的责任推到国人身上，自己不负责。这样就“可以为民父母”了。他杀了人也不算是他杀的。若是见不可杀焉，怎么办呢？应当还有一股，不提了。八股文体是论题，论体，不论意义，不管说的对不对全不全的。

着重排比意义的在《孟子》中也不是完全没有。

孟子谓齐宣王曰：

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去）楚游者，比（到）其反（返）也，则冻饿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绝交）

曰：士师不能治士（朱注说，士师是狱官，下面有一些士归他管），则如之何？王曰：已之（罢免）。

曰：四境之内（国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段词句对偶不整齐，也是三股。第三股残缺不全，只有一半。三股是三层意思，一层逼一层，最后逼上王爷自己，只好残缺了。结尾很妙，是到今天还为大家所熟悉的一句话。

非常明显，孟子的辩论常用譬喻，用类推法。这法不仅是他一个人会用，中国古往今来人人都会用。作比喻，引同类，这就是推理了。照这样用形象排比推理作出文章来就有声有色了。这正是八股文体，也是《四书》文体。

朱文公晦庵编订《四书》，集别人解说加上自己的意思作注，是“述而不作”的著作。他当然不是为了树立文体榜样，教作文，结果却是立下一种文体延续五百年以上。《四书》出八股之题，又出八股之体。这种“体”无“心”而有“心”，有“心”而无“心”，“心”“体”一致，是“应对”，应皇帝，对策。所以还得回到策问和对策。

对策从汉代以来始终未断，不过只用于殿试。到清末

光绪年间还有。这时内容文字千篇一律。规定不许有空格,所以那些必须提到又必须抬头高一格两格三格的皇帝朝廷等字眼前面一行要刚好写到底不留空白(考卷有行无格)。因此非用固定的四六对句限制字数不可。阅卷的不看内容,因为到殿试时不会有人用违碍字眼了。(“磨勘”的还得看,但后来也流于形式。)看殿试卷只望一眼字迹,所以写字必须极其工整,卷子干干净净。在清代中叶,这种字是中进士点翰林学士的人都会写的,叫做“馆阁体”。从汉代董仲舒起,有的对策也认真提出意见,到后代这是极其稀少的。这种文不会使皇帝和大臣喜欢,所以策论比不上八股文和试帖诗。诗又不如文重要。策论为什么不能认真?怎样作才算好?坏的如上所述只是写字。好的也很简单,作法同八股一样,说中听的废话。可举清初开国时的一道题和文,一看就明白了(《丛话》卷八)。

顺治六年己丑(1649)策问题:

从古帝王以天下为一家。予自入中原以来,满汉曾无异视,而远迩百姓犹未同风。岂满人尚质,汉人尚文,习俗或不同欤?抑音语未通,意见偶殊,畛域尚未化欤?今欲联满汉为一体,使之同心合力欢然无间,何道而可?要言可行,不用四六旧套,予将亲览焉。

这道题可难作了。不比《四书》题可以照朱注敷衍成篇。若是用四六骈体,只堆砌辞藻典故可以含混,又不许。既需“要言”(要言不烦),还要“可行”(切实可行)。这时离甲申(1644)明亡不过五年,南明虽亡,桂王尚在。剃发留

辨,限期十天,杀了多少人,强迫汉人从满俗。这时要求满汉一体,怎么办得到?题中只提“文”、“质”和音声言语不同,岂是要领?满汉关系不仅是民族关系,又是官民和军民关系。对策中若一言不合就会出大问题。出题者心思深,答题者心思必须巧,非精通八股神髓者作不到。《丛话》引了清初“时文”大家刘子壮(克猷)的“廷对”。刘在当年中了状元,入了翰林,当然是受皇帝赏识的。且看他怎么作此难题,上条陈,提对策。文长不能全录。摘录前半及末尾加点评说。

臣闻:人君致治,在力行不在多言。人臣进言,与其文勿宁其质。

这个帽子戴得好,既是八股“破题”,又是两股对偶。妙在就用题中的文字,点出“文”和“质”。既是说我讲直话不拐弯子,不用典故骈体掩饰,响应皇帝提问中的不用“四六”的要求,而且弃汉人所“尚”之“文”,用满人所“尚”之“质”,暗中呈上降表,预示全篇之意是要使汉人服从满人。皇帝看了岂有不喜之理?敷衍题目即顺着皇帝讲,用你的话。这正是八股精神,代圣人讲话,说了半天还是自己一句话没说,把题中的话算作自己的。下文又接得好,是一个路数。

夫帝王以天下为一家,则满汉皆一家也。然朝廷虽无异视,而百姓不能不异也。即满人汉人亦不能不相异也。

这等于八股的“小讲”,是“承、转”。还是没有一句自己的话,只述题而不作。可是再这样下去不行,还得出点实在



的,发挥圣人之意。

其所以异视者何也?

替皇帝发问,依对话体。怎么回答?说是汉人一见满人就害怕,又有仗势欺人的,“挟之为重者以相恐”,实际上说的还是汉人。

边防之外,愚懦之民,见一满人则先惊之矣。又有挟之以以为重者以相恐。其实满人之与汉人未尝不相爱也。处事未尝不明,守法未尝不坚,居身未尝不廉也。而小民预有畏怯之意,虽其极有理之事,常恐不能自直于前,则其势不能以卒(猝)合。而又时当革命(改朝换代,词出于《易经》)之初,民重其生,是以虽有相爱之诚而不敢相信,虽无相陵之意而先以自怯。此百姓之所为异也。

好!满汉相爱而又不能猝然相合,为什么?怪汉人。满人明白事理,又守法,又廉洁,只怪汉人先心里害怕,有理也不敢讲。这些话中一个典故也没有用,入关不久的年轻满族皇帝(事实上是摄政王多尔衮,他即将失势)是看得懂的,不会误解。这是一股,说汉人。还得对上一股,要再讲讲满人。怎么讲?这要费心思,显才华了。

满人有开创之功,其权不得不重。满人有勤劳之绩,其势不得不隆。汉人虽处尊贵之位,其力固不敢相抗,其志固不能必行也。其中(满人)自专者未免轻汉人为善狡,为朋交。其中(汉人)自疑者未免惧满人之多强,之多势。是以有怀而不能相喻,有力而不能自尽

也。此满汉之相为异也。

不愧得中状元。这一股说满人打天下不能不有权有势。还是怪汉人不好。不能尽力,只怪你自己。两股一毕,还必须出点主意才行。

今欲去其异而同之。

臣谓:满人尚质,以文辅之。汉人尚文,以质辅之。

完完全全的八股文体,《四书》腔调。就用你的话,不出题之外。问话是当今圣人即皇帝的。用古圣人即孔子的路数来回答就错不了。对方问政,孔子就论政。对方言利,孟子就抓住利字作文章。要当孔孟之徒,必须遵从朱子编注《四书》之道。这也是“述而不作”,最为稳妥。可是空话之外还得有实际办法。怎么“以文辅之”?

其以文辅之者,设满学焉。或于国子监,或于教习庶吉士,使读《四书》以通其理,观《通鉴纲目》以习其事,限为岁月以考之。

《四书》是朱夫子的,不是孔子的礼、乐、诗。《纲目》也是朱夫子编的,不是司马光的原著。还得考试。这是将千百年来汉人行之有效的方法献计献策。这是一股,讲满人。这段文下还有些细节描述,不抄了。

其以质辅之者,凡在官,以实事责之。

这一股的话很多。对汉人一一指出各种官吏,各种百姓,如何考核,考核什么。也不抄了。两股完了,合起来说,仍是八股文体。

如是,则习俗虽不齐,道德同之也。音语虽未通,

气类习之也。意见虽偶殊，义理达之也。一文，一质，方将变通古今，转移造物，而何所不化之畛域哉？

归结到题中的原话，“习俗”，“音语”，“意见”，“畛域”。文章作到这里已经够好了。但是中进士点状元有余，要打动皇帝圣心，还得显点本事，提出可行的建议，为皇帝着想。

抑臣所祈者：愿复古日御便殿之制。令大臣如唐虞君臣之论道，取章奏面相议订。谏官仍得于伏下封驳。则上下情通，满汉道合，中外权均，宰相不仅以奉行为职，卿贰不仅以署纸为能，则中心隐微皆可告语，而海荒万里如在目前，此古和衷之美也。又何远近百姓之风之不可同欤？

好极了。恢复唐虞古制就是说皇帝成为尧舜。天天和大臣见面就是表示皇帝“乾纲独断”，使大臣不敢相欺。章奏要“面相议订”就是在皇帝监督之下。谏官仍得“封驳”就是加上制约。“上下情通”就可以“中外权均”了。“中外”是指朝里朝外，亦即中央和地方。两边权均，互相配合又互相牵制，最高大权最后决断必归皇帝一手掌握“一言九鼎”了。作为文章，无论内容形式都深得朱夫子晦庵编《四书》的精神要领。无怪乎这位湖北黄冈的刘状元声名显赫得到皇帝宠幸了。然而他的政绩是什么？没有去查考，也不必去查考。清初几件大事中好像都没有他。又说是年纪不大就去世了，没来得及。实际上，顺治皇帝也和他一样短命。以后康雍乾三朝不是实现了他的对策吗？若皇帝采纳了，那位献策的臣子就不会掌权了。曾国藩深通“求阙(缺)”之道，

所以他在翰林院无所作为，只讲理学，作诗文，一组织湘军便显得出众了。现只论文。这篇满清“开国有数文字”确实是好文章。不是八股而又是八股，不是骈文而又是骈文，读一遍是不会吃亏的。但须读原文，是“尚质”的，并不难懂。若只译成白话看，全成了废话。八股对策的神气和意味不免要折扣了。白话好文章译成古文也不行。

这样的对策或“议对”只能在顺治六年有。因为顺治元年清政府入关。二年大军南下在扬州等地屠城，灭南京明弘光朝，下剃发令，限期十天，汉族男子一律剃长发留辮子（到太平天国才留长发，故称“长毛”）。这时用的是镇压政策。以后几年，东南、西南明朝的唐王、鲁王、桂王反抗势力不小，还得依靠吴三桂等汉人降将去打汉人。同时清宫廷内部也有变化。到顺治七年，摄政王多尔衮便失势死去。八年，顺治皇帝十三岁亲政，随即宣布多尔衮罪状。所以顺治六年，皇帝十二岁，正是和孝庄皇太后及部分满洲大臣考虑形势及政策的时候。这篇策问题不知出于什么人之手。也不知是否多尔衮事先同意。总之是适当其时。这样重大政治敏感问题不得皇上旨意谁敢写出来？到康熙削平吴三桂等三藩，雍正兴文字狱，从此再不会有人触及满汉问题了。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林则徐的同乡朋友梁章钜编写《制艺丛话》成书时，可以将这篇对策全文收进去了。八股文这时要第二次让位给策论了。第一次是康熙二年（1663），停止八股文，改用策论。第二次仍由《四书》出题，但要作论，不用八股体，自然也是遵顺治六年（1649）所定的

不用四六对句。当时有人还画了八个盲人名“八瞽图”，嘲笑八股。可是到康熙七年(1688)，康熙杀摄政大臣鳌拜的前一年，下诏恢复八股文。八股只停了六年。由此可见，至少在清代，八股和策论的代兴与政治形势及政策多少有些关系。单就文体论，两者是一类，可为什么议政的对策胜不过不议政的八股呢？从上面所引的汉代及南朝到顺治六年的策问题就可以看出来。这种策论实在是题难出，文难作。作得再好，如刘状元的文章，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能暗用也不能明用。闯祸的可能比得宠的可能大得多。反而不如八股脱离实际，和唐朝的应制诗、清朝的试帖诗一样。诗题是“赋得”现成诗句作诗，等于摘《四书》句为题作文。诗限五言八韵，等于文限八股七百字。看这类诗文固定格式，作诗文的人和阅考卷的人都方便，朝廷也比较省心。一切可作计算机式处理。考试本身的作用不过是“取士”。官做得好不好与诗文何干？所以八股行时五百年以上也是不无道理的。可是为什么元明清三朝都看重《四书》呢？从汉到宋，儒家重的都是《经》即《诗》、《书》、《易》、《礼》、《春秋》啊。

朱晦庵编定《四书》，意义是“对策”，结构也是八股式。《论语》、《孟子》中有八股，也是后来所谓“语录”（就是《论语》）。《大学》、《中庸》里也有八股，也是“语录”。两书对两文。同样，《论》、《孟》相对，《学》、《庸》相对，又各自成两股。《大学》开篇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朱改作新）民，在止于至善”。《中庸》开篇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又是互相以三股对偶的。《大学》排了一个从人

心到“天下”(统一帝国)的程序。《中庸》也最后推到最广阔的“天下”(天地)。《中庸》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自“修身”起。对上《大学》的从“格物”到“修身”到“治国、平天下”的八项。《中庸》是文集。《大学》也是文集,经朱子又编又补变成了统一体。《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所排列的程序中,“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说:“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两两相对,是朱子用以贯串《四书》的纲领。从“修身”到“治人”到“治天下国家”就是晦庵夫子以《四书》作对策的用意,仿佛是八股的“破题”。将他改编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通鉴纲目》联系一看会更明白。《纲目》着重的是“正统”。意思是,南宋虽然偏安,还是“正统”,和刘备的蜀汉一样。南朝偏安,也是“正统”,不算北朝。“统”最重要,不论疆域大小,首先得“一统江山”。《四书》所着重的都是一统天下。孔、孟说得明白,《学》、《庸》更着重天下,所以非选拔出来和《论》、《孟》并列不可。朱子学说在他生前和死后都曾被当时南宋朝廷宣布为邪说,到末期又平反。从蒙族统治的元朝起,历经汉族统治的明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他都被尊为继承孔孟的大儒。他的《集注》和《四书》本文一样受到极端尊重。其中至少有一个原因是这三朝都是一统天下,而且眼光甚至势力远达境外,非南宋可比。西汉尊崇《公羊传》的“大一统”,着重的是“尊王”和“攘夷狄”。唐朝又喜欢口气更大的“佛土”、“转轮王”、“大千世界”,眼光直射西域。《四书》中

虽有些对“蛮”“夷”不敬之词，但都着重“平天下”、“王道”，还是大统一的皇帝所喜欢听的。因此，朝廷所尊崇的总是儒家孔孟及朱子之“道”，而实用的却是道家的老子、韩非之“道”。一是旗号，一是方策，两相配合。从汉到唐、宋，儒家经典主要是《五经》。从宋以后，《四书》超过了《五经》。《春秋·公羊传》虽也重“一统”，但又重“攘夷”，“内中国而外夷狄”，所以蒙元满清就不能提倡，要等到清道光以后才能再起“攘夷”了。《四书》讲一统“天下”，对夷狄并不排斥，孔子还有点“一视同仁”，所以稍有忌讳可以从略，视而不见。《四书》若作为一篇对策，很像是朱熹为忽必烈、永乐、乾隆预备的。说不定他在南宋时已隐约见到并盼望天下大势必归一统，不过没想到统一者会不是汉族，正如《四书》没有想到统一天下的是秦始皇一样。

因此，从文“体”说，《四书》是八股之源。从内容意义的对策文“心”说也是八股之祖。这篇八股文之义归于一句破题，中心是三个字“平天下”。《庄子》的《大宗师》、《应帝王》如同对策之题，虚有其名，不如朱子的《四书集注》，无对策之名而有对策之实，合乎帝王统一天下的口味。

八股文，五七言诗，四六言文，是中国古代文学语言的书面形式中历久不衰屡经考验的文“体”，同时符合“应对”的文“心”。无论是应试，应酬，应景，都可采用。这是汉文体式，古代文心。至于汉语体式，现代文心，是什么样？古代作品恐怕是只能作为参考而不可能成为范本了。汉文换成汉语还能有多少文采？

《四书》和八股大概都已到终点了。回顾一下或许并非多余吧？照八股策论体例还待有个收束，何妨冒昧说几句？

八股有特色。一是命题作文。二是对上说话。三是全部代言。四是体式固定。就体式说，又可有四句。一语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转合。抑扬顿挫。这四句中：一是断案。二是阴阳对偶。三是结构，也是程序。四是腔调，或说节奏，亦即文“气”。《四书》八股，“一以贯之”。从秦至清，“其揆一也”。



## 编辑后记

八股文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在封建时代用于科举考试的时候,它必须“代圣人立言”,在形式上也要遵守一些人为的限定。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止科举考试制度,八股文随之失去它的实际效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它作为封建旧文化的象征之一,受到严厉抨击,数十年来,自然成了无人肯说的冷僻话题。然而,八股文毕竟是在中国生存了几百年、又是旧时文人普遍修习的一种特殊的文章体裁,给予过中国文化很深的影响,对于这种产生在中国独特的文化环境里、唯中国独有的文体,我们似乎不应放弃做一番科学研究和冷静认识的努力,更何况八股文的影响并没有在现代社会绝迹。

本书的编辑过程是这样的:1991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了启功先生的《说八股》一文,张中行先生看后,写了《八股补微》一文,发表在《读书》杂志上,我们此时正有意编一部关于八股文的书稿,便邀请金克木先生再写一篇。启先生、张先生为文在先,金先生为了避免重复,行文时特意绕得远一些。《八股新论》即是金先生专门为本书撰著

的。

八股文消亡了近一个世纪,重头评说,仍有许多难言之处。所谓“难言”,一是如何设立新的标准来看待八股文,本世纪初以来对它的批评自有道理,但若就一种文体在文化与文学方面的存在意义看,如何将历史文化及文学文体的评价统一谐调,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二是八股文对现代人来说已经陌生,它的文化机制与形式内涵都不易为今人体会,至今已极少有人通晓它的写作手法了。所幸启、张、金三位先生均为博学通才,渊深的国学功底使他们游刃有余。他们对八股文都有自己敏锐独到的看法,评价公允而深刻。他们各自所拥有的对八股文的体验与感悟,尤其为晚辈学人所难以具备。三位先生在文中还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八股文的来源、流变及体制格式等基本知识,使读者能对八股文有相当全面的了解。文字的通达晓畅、平易明晰,则又是这本书令人读来轻松愉快的原因之一。

能有机会看到三位学界老前辈共谈一个不太好谈的话题,不失为读书界的一件快事。

征得启功先生、张中行先生同意,我们将他们已发表的文章收入本书,书名则采用启功先生的文章题目。

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

一九九二年九月